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美较量大写真 (下)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中美较量（下）

第三节 扬眉吐气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夜，联合国大会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破产，中国则昂首挺胸、冠冕堂皇地坐进了联合国大厅里那个属于中国的位置……

罗马尼亚大使的女儿大喊：“通过啦！”

1971年10月25日晚，这天是星期四。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的夜生活和往日一样又开始了。普通百姓各找自己的兴趣所在，外交官们则又各自肩负本国政府的委托，开始紧张的外交活动。

此刻，罗马尼亚驻加拿大大使的官邸正灯火通明，那是罗大使在为应邀来此作客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举行便宴。晚餐过后，罗大使又邀黄华大使夫妇喝咖啡聊天。千里之外的纽约联合国总部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自然而然就成了宾主的主要话题。他们就本次联合国大会能否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等23个友好国家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驱逐蒋介石代表的提案被通过，进行了分析。50年代，美国操纵表决机器，蛮横无理地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搁置一边。从1961年起，美国又改变手法，操纵表决机器，硬把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说成是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因而前11次有关中国席位问题的提案表决，都因为美国带头阻挠，对参加投票的国家恩威并用，强迫它们按照美国的意志投票而都未能获得通过。尽管如此，在1970年的第25届联大上，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仍获得了简单多数的支持。鉴于中国力量的增强和影响的迅速扩大，美国看到形势在发生变化，对它已经不利。于是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大上，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和一个“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公开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这样今年就有两套提案交付联合国大会表决，一套是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一套是美国的提案。两位大使虽然了解过去几天的辩论情况，但对两套提案的表决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俩正在作预测时，忽然罗马尼亚大使的16岁的女儿从二楼匆匆跑下来，她一边跑一边大喊：

“通过啦！中国的席位得到三分之二还多的票数！”

罗马尼亚大使立即请黄华大使夫妇上楼去看电视。宾主快步来到电视机前，只见电视机的画面上，联合国大会厅内灯火辉煌，估计主要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些国家的代表激动地站起来，对刚被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决议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了两分多钟。此刻场内沸腾了，有的代表欢呼起来：“我们胜利啦！”“中国万岁！”有的则互相握手、拥抱、欢笑着，以此来表示

祝贺，有的流下了兴奋的眼泪，有的则唱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代表甚至高兴得跳起了舞……

这时电视机的画面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场景：蒋介石集团派往联合国的所谓“外交部长”周书楷，结结巴巴用英语讲了几句话，领着他那一帮子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看到这里，黄华大使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中国多年来奋斗的外交目标现在实现了，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即将坐上本应由她占有的位置。黄华大使在接受了主人的祝贺之后连忙赶回中国大使馆。使馆人员又围在一起收看电视台重播的这一让全世界震动的新闻。这一次，黄华大使看到了今天开会的整个过程：

原来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 23 国提案前表决了美国和日本共同炮制的“两个中国”的提案。为了能说服一些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和日本这一提案，美国还指使某些国家出面要求推迟表决。但是美国和日本的种种阴谋诡计仍然以 56 票反对、53 票支持、19 票弃权被大会拒绝了。接着，美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又以 59 票反对、55 票赞成、15 票弃权也被大会拒绝。随后要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的提案进行表决。这时，只见脸色阴郁的美国代表乔治·布什又跳上讲台发言，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立即驱逐蒋介石代表出联合国一节，但再次遭到代表们的反对。经过大会主席马立克的裁决，布什的这一建议被拒绝。接着就开始对阿尔巴尼亚等 23 国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从而有了那掀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辉煌场景。

这一夜，使馆的全体人员是在极度兴奋中度过的。

而这一夜，中国新华社的编辑们，这些国内最先得知这一消息的人们，兴奋和自豪使他们往日常有的劳顿也顿然无影无踪，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让全国人民共享这一喜悦。

美国的气急败坏与无奈

联大就中国的席位问题进行表决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的实况转播。虽然他早在春天就已知道，美国所控制的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传统投票集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但他仍然寄希望于奇迹的出现，希望通过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使那些举棋不定的国家，在此重要时刻仍然能支持美国的“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实现美国的既接纳中国，也不驱逐台湾蒋介石的代表的“两个中国”的计划。他神情如此专注地盯着电视机的画面，以致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都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这时电视机里正出现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的画面。大厅里十分安静，但显得气氛紧张。当电动记分牌上的标示说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的提案被通过时，尼克松气得火冒三

丈，他脑门青筋暴涨，下巴扭得更歪。他猛地拍打一下沙发的扶手，跳起来，跑过去，狠狠地关掉了电视机。这时，刚才被他赶出去的那个人又走了进来，尼克松正好把他当做出气筒。他恼火地对来人莫名其妙地怒吼起来：

“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表现得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来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默默地听着，战战兢兢地站着，等尼克松发完了火再说事。

美联社则无可奈何地承认，这是美国在联合国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美国政府人士“感到吃惊”和“表示极为失望”。乔治·布什面对表决结果，“感到悲伤”。他懊丧地说：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的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国务卿罗杰斯在次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则对这一表决结果“深表遗憾”，称其“是个非常不幸的先例”，“会对未来产生很多不利影响”。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的欢欣鼓舞场面“极为愤慨”，称其是“毫不掩饰的高兴”和“个人仇恨的惊人表演”。

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开了一个玩笑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来中国访问，以为尼克松总统的正式访问做前期准备工作，并和中国领导人就中美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磋商。这种谈判是紧张而艰苦的。10月26日上午，双方的会谈取得了进展，而基辛格也就要结束北京之行返回美国。在这次基辛格访问期间，正是联合国就中国的代表权进行辩论和表决的关键时候。尽管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此次能否成功仍然是个未知数。然而滚滚的历史潮流，冲决了一切阻拦，中国实现了进入联合国的历史性突破。就在基辛格即将离开钓鱼台国宾馆时，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传到了北京。但周恩来总理来钓鱼台和基辛格告别时，只把这一消息悄悄地告诉了乔冠华副外长，而没有把它告诉给基辛格，以免基辛格难堪。和基辛格话别时，周恩来总理一直笑盈盈的，他把基辛格送到钓鱼台的楼门口就停步了，然后用英语说到：“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基辛格也应承道：“我希望，我不用很久就有此机会。”

一起去机场送行的乔冠华，这几天一直在和基辛格会谈和讨论公报的草稿，两人无疑就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因而讲话也就能随便一些。他和基辛格同乘一辆红旗车。车子开动不久，他俩就开始愉快地聊天。他们聊着聊着就聊起了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间问题。乔冠华故意若无其事地问基辛格：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

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中国席位提案进行表决。”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笑了笑说道：“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说道：“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扶他那大宽边眼镜，说：“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听完仰面大笑，笑声里充满了基辛格根本没有察觉到的自豪：“我看不见得吧？”

汽车鱼贯驶入机场，大家陆续下了车。叶剑英带领下的我方送行人员，此刻一个个都兴高采烈，眉宇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异样喜悦。他们满面笑容，和基辛格一行愉快地握手告别。自信的客人，看到中国人今天如此高兴，也咧开了嘴，乐呵呵地笑着。他们以为中国人所以如此高兴，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架构已经基本上定了下来，公报基本采用了中国的方案。他们何曾料到，中国人是因为此刻进入了联合国才如此高兴的啊！

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很快滑向跑道。望着腾空而起的飞机，叶剑英元帅抑制不住兴奋，忙向快要从视野中消失的飞机望了望，说：“基辛格在飞机上得知联大的消息，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译电员就给他送来一份刚接收到的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吃一惊，他连忙又把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只见电讯稿上打着：

联大刚才以 76 票对 35 票通过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提案。基辛格双手捧着脑袋，好一会儿才抬起来，表情复杂地对助手们说：“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但我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说罢他苦笑了一下。

基辛格的心腹洛德看完电讯稿，心中升腾起莫名的感觉。这时他正望着舷窗外的苍茫云海，他听完基辛格的话，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霍尔德里奇听洛德这么一说，他立即想起了一件事：“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听人说，要是蒋介石得了周恩来，被赶到台湾岛上去的就不是蒋介石了。”

基辛格对他俩的谈话没有去评论，而是在考虑刚刚看过的电讯稿的事。他虽想过事情会变化，但却根本没想到事会来得这么快。此刻他思绪很乱，心情复杂而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宾馆时的欣喜已消失殆尽，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竟然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获得通过，这是大出所料的！美国政府花了那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推销的提案被大会拒绝了，这是美国从没有遭到过的失败！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基辛格认为，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一方面又去讨好强大的中国以为自己获得利益。当美国敌视中国时，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开罪于美国而受到惩罚。现在美国自己要和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

了。基辛格努力寻找美国失败的原因，他凝视着舷窗外一块巨大的乌云，继续沉思。这时译电员又送来电讯，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先在阿拉斯加停留，不要在联合国进行表决的敏感时刻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即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导致了美国在联合国的失败。

在阿拉斯加停留一天后，基辛格一行乘坐的“空军一号”座机终于回到了华盛顿，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与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时相比，这次就太冷落了，那次是尼克松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只是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继续向出口走去。

马上组团去联合国

10月2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顾不得连日来与基辛格谈判的劳累，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负责人以及有关人员开会，讨论与联大的相关问题，而中心问题是到底派不派代表去出席已在纽约开了近40天的第26届联大。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通过后，国民党代表已经悄然收起文件包，灰溜溜地离开了联大会场。此刻，联大中所设的中国席位就空在那儿了。我们应不应该坐上去？而且，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去不去呢？

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左”的迷雾还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因而对联合国的认识也不能不带“左”的色彩。结果在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是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大会。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询问此事，周总理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主席听后很激动，立即说了相反的意见：“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的垮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总理继续汇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主席立即指示说：“不，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毛泽东主席的明确指示和亲自点将，立即使到底去不去联大的问题解决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一事也很快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以代表团的组团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因而组团工作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经毛泽东主席的同意，又派高粱带领一个由五人组

成的先遣队去纽约打前站。

11月8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毛泽东主席满面笑容，在这里接见了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代表。明天，代表团将起程奔赴纽约，到联合国的会议大厅里、那个被非法占据多年、现在又空出来的中国位置上就坐。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他们送行。今天，毛泽东主席显得少有的高兴，在和代表们一一握手之后，他幽默风趣地对大家说：“送我们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了再说。”

11月9日下午，北京机场一片欢腾，4000多名群众敲打着喧天锣鼓，挥舞着花束彩带，热烈欢送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周总理、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机场送行，党、政、军拜界负责人和各国使节也到机场热烈送行。代表团的强大阵容是空前的，欢送的隆重场面是少见的。容光焕发的代表团成员绕场一周，挥臂向前来送行的中央领导和欢乐群众告别，然后登上银白色的飞机，直刺蓝天，飞向大洋彼岸，飞向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

联合国的最强音

乔冠华，这位有着才子之美誉的外交家，在被“钦”定为代表团团长后，立即闭门谢客，赶写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着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连续苦战数夜，终于大功告成，然后将发言稿直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审定。乔冠华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1951年，他曾经跟伍修权一道代表中国去纽约联合国总部，控诉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美国操纵联合国，颠倒黑白，通过决议，诬蔑中国侵略。那时的心情是压抑而愤怒的。这一次，事隔二十年，又要去联合国，却是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全世界去展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骄傲雄姿，让全世界听听她的伟大声音。所以写完讲稿，倍感痛快淋漓。

周恩来总理对这篇宣言式的发言稿仔细地做了修改，重要段落真正做到了字斟句酌。有一段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话，是周恩来总理经过反复推敲后审定的，它至今仍然在放射着灿烂的光芒。我们不妨将之摘录于此：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

家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

果然，这篇讲话在联合国大会上宣读后，取得了轰动效应。路透社记者说，中国代表的发言“震动了联合国大厦”；共同社记者认为，这篇讲话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南斯拉夫报刊评论说：中国对超级大国的谴责成为联合国的最强音，这是一篇真正的中国宣言。

中国人成了媒体的头号新闻

高粱率领的五人先遣小组于11月8日中午抵达纽约时，23个提案国中的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和联合国官员已在机场迎候，还有二百多名记者在警察许可的距离之外等待。先遣组一下飞机就被记者团团围住，人们问这问那。但限于先遣小组的身份，许多话应由代表团正式对外发表，他们除了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情痛快，就是堂堂正正、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尽情享受让其他国家记者照相的甜蜜和骄傲。到达旅馆后，又有大批记者涌上前来，争先恐后地提着各种各样，甚至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当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关于中国先遣组的消息成了各家电视、广播、报刊的头号新闻。它们对先遣组的中国人几点几分由谁陪同去何处，穿着怎样，吃饭时怎样用刀叉，怎样付小费，付的是什么钞票……等等，等等，全都给予详尽报道，就好像他们是来自太空的“外星人”。甚至还有一家大报，用半版的篇幅登载了高粱的穿中山装的照片，并将之称为“毛泽东服”。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来自大陆的中国人是多么感兴趣而又多么不了解，也说明被众所周知的原因所隔绝的两国人民之间是多么迫切需要相互接触和相互了解。

次日，先遣组来到联合国秘书处大厦，由礼宾司司长陪同走访大厦的各个会议厅，又有众多国家在秘书处工作的人员聚集在走廊和楼梯上，向中国先遣组人员热情挥手、鼓掌，有的走过来握手、问候，有的则请他们到休息室喝咖啡和交谈。此刻，他们感到，只有身为中国人才有那种扬眉吐气感，那种豪迈感，才能领略到那种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后获得胜利的喜悦。

“乔老爷”为中国人树立新形象

11月11日，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一行五十多人，在乔冠华团长的率领下顺利到达纽约。23个提案国的一些代表和众多友好国家的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处的代表，还有美国友人和爱国华侨，很早就来到机场等候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为能抢得好新闻，四百多名记者也拥到了这里。12点30分，中国代表团走出机舱，他们一下子成了记者手中相机的焦点。代表们首先与前来欢迎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代表紧紧握手拥抱，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人们纵情欢笑，共享胜利的喜悦。然后乔

冠华团长发表讲话。他说，中国代表团将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他又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浓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乔冠华的讲话虽短，却立即引起了热烈的鼓掌和极好的反响。人们普遍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态度”、“温和调子”，认为中国人“和蔼可亲”。

中国代表团的车队驶出机场，进入纽约市区时，沿途又不断有行人向代表团招手、挥帽和欢呼。代表团来到住地，这里早已围了许多人和等候采访的记者，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地在旅馆外的旗杆上飘扬，旅馆的门口放满了各方朋友送来的用鲜花插成的花篮，房间里堆满了发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电报、贺信。安顿就绪之后，中国代表就开展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乔冠华团长和几位副团长首先拜谢了本届联大主席印度尼西亚外长马立克，并坦率地表示：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当前的情况还不十分熟悉，因此还不能像大家所希望的那样积极活动。这种审慎立场和谦虚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又拜谢了正在医院养病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他递交了出席联大的代表证书。接着又拜会了23个提案国的代表，向他们一一表示了深切的谢意。这种灵活、坦诚和充满协调精神的外交姿态，使得刚刚来到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博得了舆论界的普遍好评，更使国民党集团撤离联大时，诋毁中国代表团“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后来破坏会议的讨论”的谰言，不攻自破，也彻底地暴露了他们自己。

诞生了一个新记录

坐落在纽约东河之滨的联合国大厦，雄伟壮丽，大厦门前的旗杆上，由中国代表团先遣组提供的迎风飘扬着的标准五星红旗，显得格外亮丽。11月15日，美国时间上午10点30分，被联大主席马立克称为“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和副团长黄华、符浩、熊向晖等昂首挺胸走进联合国会议大厅就座。他们一出现，场内立即响起了掌声，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了整个会场。大批记者涌至，拍照采访。友好国家的代表接踵上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代表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和欢迎之意。随后，大会主席马立克首先致词，他以大会主席身份“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接着各国代表纷纷报名，相继走上讲台致欢迎词。

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更以充溢着激动欢快和真诚热情的发言，向中国代表团表达了他们欢迎之热忱，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有的代表还朗诵了毛泽东的诗词来表达对中国的友好和欢迎。他们盛赞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指出多年来把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和从百年屈辱中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最不公正的行为。现在联合国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正义的立场终于胜利。他们强调，中国合法席位

的恢复，使联合国遵循的普遍性原则得到了体现，联合国宪章得以维护，也使这个组织“恢复了活力”，“恢复了威信”，增加了它“缔造和平的力量”。

匈牙利代表用中文致欢迎词，更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事，从来没有中国人以外的人，用中国话发表演说。当时引起了轰动。

西方国家的代表也致词欢迎。法国代表说，“中国在我们当中就座了属于她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态终于结束了。”甚至连炮制“两个中国”提案的美国和日本的代表也致词欢迎。

由于在发言过程中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达到了57个国家之多，原定上午就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只好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当地时间下午6点40分，前后共6个小时，欢迎仪式之长创了当年联合国大会纪录。当天原定的“世界裁军会议”议程，因而也未正常进行，许多代表都把发言集中到欢迎中国代表团上去了。

各国代表致词后，乔冠华团长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健步走上联大的讲坛。这是新中国的代表第一次正式站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向全世界显示正义事业的胜利。一身英武之气的乔冠华，精力充沛、容光焕发、充满着自信和豪情，在讲坛上站定之后，首先向大会主席轻轻点头致意，接着用明亮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单等此刻已响了有半分钟之久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停下，进行历史性的发言。心潮澎湃的他两次高举右手，向大会代表表示谢意，掌声和欢呼声这才停下。于是他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出了气势磅礴、铿锵有力、振奋人心的强音。他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并再次宣布，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乔冠华讲话后，十分安静的会场里又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国家的代表再次来到中国代表团座位前，亲切握手祝贺。这篇被共同社记者称作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的讲话，由于全面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从而引起了世界舆论界的极大反响，被外界看作是进一步了解、研究中国内外政策的钥匙。

布什：“早上好，团长先生！”

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通往联合国的路就一直被美国堵着。美国曾挖空心思，耍尽花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现在美国的阻挠已经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席位已然恢复，特别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在此情况下，美国人终于回到了现实当中，想在联合国里与中国人接触。但是，在此尴尬时刻，这第一步接触该怎么开头呢？

11月14日晚，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科尔莱向中国代表团透露，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很愿意在次日的大会前与乔冠华团长先见一面。科尔

莱同时具体安排了中国代表第二天早晨进入大会会议厅的路线。中国代表团马上发现了科尔莱的良苦用心。 11月15日上午10点，当中国代表在科尔莱的陪同下，按着他所规定的路线走向联合国大会会议厅时，中国代表发现了个中的奥秘。中国代表所走的路线，正好经过美国代表布什要在那儿与别人“随意聊天”的铺着绿色地毯的走廊。当中国代表出现在走廊上时，布什正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打电话。一见中国代表走来，他立即撂下电话，走过来和别人聊天。在中国代表快到聊天的人群时，只见科尔莱向前紧走两步，将乔治·布什介绍给乔冠华团长。布什立即走上前把手伸过来和乔冠华团长握手：“早上好，团长先生！”乔冠华也很有礼貌地伸过手，微笑着说道：“您好，大使先生！”然后，中国代表就跟随科尔莱走进了联合国大会议厅。就在这样的非正式场合，短短的两句问候算是美中两国代表在会前见了面，它使拼命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美国代表感到庆幸和轻松，因为这避开了众目睽睽和尴尬难堪。这一经过巧妙安排的会见立即在会场内外传为趣闻。在随后举行的大会上，布什以东道国身份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欢迎中国代表。他说，中国代表来到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说包括美国在内，大家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第四节 今日之域中， 谁家之天下？

经过基辛格的往返奔忙和其他人的准备，尼克松于 1972 年 2 月 21 日正式开始他的访华之行……

镜头里只应有总统单独一个人

1972 年 2 月 17 日，尼克松在同国会领袖们进行简短的告别会见后，大步来到停在白宫草坪上的直升机前。尽管这天正值隆冬，寒冷刺骨，但尼克松仍感到热乎乎的，他向站在草坪上欢送的人们发表简短讲话，谈到人们对他的祝贺与期待，希望后人会用“阿波罗十一号”宇航员留在月球上的那块纪念碑上的话：“我们为了全人类的和平来到这里”，与他这次历史性的中国之行相类比，从而将之载入史册。他面露微笑，频频挥动双手道别，然后和夫人一起钻进机舱，直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再从那里转飞到北京去。

为了到达北京的这一历史性时刻，尼克松已经计划了好久。他想尽可能取得轰动效应。于是极其重视电视特殊作用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及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反复讨论，最后决定：鉴于北京与华盛顿时差 13 个小时，在中国每天的上午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次日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安排到达北京的时间应是 21 日上午 11 点 30 分，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 10 点 30 分，此刻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这样就可以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为了突出尼克松总统走下舷梯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和握手这个历史性镜头的重要，镜头里美方应该只有总统一个人。此外，他要纠正 1954 年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因而总统走下飞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里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基辛格和罗杰斯这样的要员，都被反复告知，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总统与周恩来握手完毕，才准下机。霍尔德曼还不放心，唯恐有人到时思想溜号，习惯性地走出机舱，又派一名粗壮的副官挡住“空军一号”的通道。

“空军一号”总统座机，2 月 21 日载着尼克松一行飞越太平洋、途经上海市于中午时分飞临北京上空时，正巧太阳钻出云层，从而使尼克松得以透过舷窗，眺望适逢冬季的中国北方的广袤大地，欣赏令他惊奇的异国景象。

11 点 30 分，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的尼克松专机的机舱门打开，穿着大衣的尼克松总统与其穿着红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长长的舷梯只有尼克松与其夫人走下来，让人感到偌大的“空军一号”专机只载着他们俩人。

在停机坪上已站着身穿呢大衣、在瑟瑟的寒风中没有戴帽子的周恩来总理。他滞洒庄重，坚毅而安详，注视着沿舷梯向下走的客人。他旁边站着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氏、姬鹏飞外长等。当尼克松走到舷梯快一半的地方时，周恩来带头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

的习惯鼓掌相还。待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去，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作为主人首先说话：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呵。”

尼克松显得很激动，说道：“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

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还感慨良多地写道：我们的手一接触，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另一个时代宣告开始了。

电视镜头一直对着这个场景，并通过通讯卫星将此实况播放到全世界。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之后，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获准涌出机舱，鱼贯走下舷梯。

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令人兴奋的鲜花彩带，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轰隆作响的礼炮，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只能给以符合这种情况的礼遇，接待这应第一次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只有在军乐队高奏《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客人在主人的陪同下检阅三百五十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时，才烘托出了元首级礼宾的气氛。

尼克松由周恩来陪同，同乘一辆防弹高级红旗轿车驶出机场。不久，车队就来到长安大街和天安门广场。出乎预料的是，街道上空荡荡的，没有人群，更没有鲜花和彩旗。他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想过，要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受到人山人海的欢迎，那盛况将不会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的情景。可是这个希望落空了。尼克松的心头不免掠过一丝凉意。

这时，周恩来将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物一一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地应着，看着车窗外被指着的那些宏伟的建筑，生出了几分黯然。

汽车驶进松柏环绕的钓鱼台国宾馆，在 18 号楼前停下，尼克松就下榻在这座“元首楼”里，基辛格和白宫来的人员也住在这栋楼里。这座楼通体洁白，飞檐绿瓦，门前悬挂着一排大红纱灯，一派非凡气势。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则住在不远处的一栋稍小的 6 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就住在那里。

稍后，全体美方人员被带到 18 号楼的宽敞的会客厅里就座，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在这里迎候他们，在场的还有叶剑英元帅、姬鹏飞外长和乔冠华副外长。周恩来总理招呼着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在寒暄中还经常开几个玩笑。尼克松一行在品味了中国名茶的同时，也领略了周恩来的风度和

中国的外交。

我这里谈哲学问题

午宴后的尼克松，正在房间盥洗，基辛格突然气喘吁吁地走进来告知他：毛泽东想见总统。周恩来已经来到楼下。对基辛格和尼克松来说，毛泽东主席要会见尼克松总统，这是早有所准备的，但是没有想到会安排得那么快，所以他俩内心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充满着神奇。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个截然不同阶级的代表竟然走到了一块。一个是最革命的左派，一个是最反动的右派；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他们彼此之间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攻击，相互敌视，隔绝对峙了二十多年互不往来。他们的意识形态彼此对立，他们的思想信仰互不相容，他们的价值观念绝不一致，他们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是，历史的发展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说明一个旧时代在过去，一个新时代在走来。

高级红旗轿车载着尼克松和基辛格他们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名解放军战士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沿着安静无人的甬道，一直开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住所。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宽的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主席的其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堆放着书籍的书房。

见尼克松一行走进来，毛泽东在秘书的搀扶下吃力地站起来，面露微笑迎接尼克松。他朝尼克松伸出了手，尼克松立即紧走两步，伸出双手和毛泽东的手握在了一起，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两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大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毛泽东首先微笑着说道：“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毫不避讳自己患病的现状，然后两眼又透出一种特有的目光，诙谐地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说完他又开心地笑了。

随后，毛泽东又和基辛格握手，并上下打量着，点头微笑，说道：“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连忙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松开了握着的手，然后众人分宾主坐好。

基辛格又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我的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

毛泽东谦虚地说：“我写的那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指导性。”

尼克松连忙接着毛泽东的话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整个世界。”

“我未能改变中国，我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已。”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气说道。他思维敏捷，只是说话比较缓慢。

毛泽东幽默的谈吐立即使气氛活跃起来。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您叫他什么？”

毛泽东轻声地笑了起来，没有立即回答。但周恩来笑着回答说：“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做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

毛泽东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要长得多。”

当说到美国的总统选举时，毛泽东爽朗地笑着对尼克松说：“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

“当主席说投我的票的时候，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尼克松自谦地回答。

“我喜欢右派，”毛泽东显得很开心，“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尼克松补充了一句。

“戴高乐另当别论，”毛泽东好像是要纠正尼克松。“人家说西德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尼克松说。“我还想说明一点，主席先生，还有总理先生，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就不会信任我。但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尼克松坦陈了自己的作风。

当谈到国际大局，尼克松提出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哪一个威胁更大的时候，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排除法说道：“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你们想撤回一些在国外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不去国外的。”他让听者自己去得出在安全方面他主要担心的对手是谁。

当话题转到这次会晤的来历，毛泽东说：“是巴基斯坦的前任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那时，我们的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与你有何来往。他说尼克松总统比约翰逊总统好不了多少。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指的是约翰逊总统。我不知道怎么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不过，我们对你们的前任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都不太满意。这中间有过八年的共和党总统。在那段时间，你大概也没有把事情想清楚。”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了解到，有多年时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接受的。使我们聚在一起的，是承认世界有了一个新的形势，是我们方面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处理内政的哲学思想，而是它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对我们的政策。”

“在我们国内，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

飞机逃到国外去了。”毛泽东用轻松缓慢的语气说道。

“毛泽东主席这是指林彪一伙，”周恩来适时地插进来解释说，“后来，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坠毁了，”

尼克松听到这里轻轻地地点了点头，似乎理解了许多事情，于是他趁势作进一步的表白：“主席先生，你的一生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你出身于贫苦家庭而登上世界人口最多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人们就不是那么熟悉了。我也出身一个很穷的家庭，也登上了一个很伟大国家的顶峰。历史使我们聚在一起。虽然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观点，但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中间，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作出突破，在今后的岁月里，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全世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的理由。”尼克松一口气说了好多。

毛泽东又转了个话题：“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是吗？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但是尼克松却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毛泽东很客气地说道：“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谈。我谈哲学问题。”

这样一次重大的历史性会晤，进行了65分钟，大大超过了原定的15~20分钟。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如此重要的会晤，竟然是在漫不经心的一种戏谑、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轻松的幽默语言蕴含着深刻的意义，令美国客人琢磨、回味，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的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了出来。半个月之后，当基辛格在他的白宫办公室里细心研究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后来他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含义。

茅台酒和大熊猫

2月21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一行。下午会谈中他交锋此刻暂且放在一边。尼克松夫妇、基辛格等由周恩来陪同坐在主宾席的大圆桌旁。在周恩来和尼克松致完祝酒词后，例行的祝酒开始了。服务员将存放了30多年的小口白陶瓷瓶装茅台酒打开，一股特殊的芳香悠悠外溢，沁精兴神，特别是此酒的浓郁香味不干不焦，历久不散。满杯不饮或敞瓶不盖，其香总是经久不散，即使酒干杯空，也留香不绝。这种纯净透明、醇滚幽郁的液体，将尼克松总统迷住了。

就在尼克松凝神注视酒杯中这一奇异的液体时，周恩来举起面前的斟满了茅台酒的酒杯说道：“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早在1915年的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上就已名扬四海。它的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

尼克松点了点头，突然又面露微笑说：“我听过您讲的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喝茅台酒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点着，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完，翻译还没有译出，自己就先笑了起来。

周恩来听完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杯中的茅台酒，愉快他说道：“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尼克松一直好奇地望着酒杯里的火苗，周恩来则用若有所思的神情看了尼克松一眼，含义无穷地点了点头。尼克松觉得它太神奇了，所以后来回到美国时他也向他的女儿特里西娅依样画葫芦进行表演。他把倒在碗中的茅台酒点燃，谁知那蓝色的火焰竟不熄灭，最后把碗烧炸了，燃烧着蓝火苗的茅台酒流满了桌面。基辛格曾不无幽默他说到此事：“当时美国第一家庭奋力扑救，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更早些。”

待茅台酒烧尽，服务员又给周恩来总理换了一个酒杯，重新斟满酒，周恩来和尼克松举起酒杯，碰了一下，作了一次历史性的干杯。而随着这一连串镜头向全世界播放，茅台酒也就更名扬世界。

祝酒之后，周恩来又举着酒杯，到每一张桌前去向美国官方代表团成员一一敬酒。当他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时，尼克松问周恩来：“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红军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是这样吗？”

周恩来总理听完翻译，眨了眨双眼，言语中立即流露出对往昔的眷恋之情，说道：“长征路上，茅台酒被我们当做包治百病的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尼克松听完此话，似乎有所感触，他连忙举起酒杯说：“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

尼克松首先把一杯茅台喝完，周恩来这次也破例干了杯。

喝完酒周恩来放下酒杯，指着桌子上招待客人的熊猫牌烟盒对尼克松夫人说：“我想送给你们这个。”

尼克松夫人很吃惊，迷惑不解地问：“您说……烟吗？”

周恩来笑了，忙解释说：“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尼克松夫人帕特恍然大悟，惊喜不已，赶紧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组镜头通过通讯卫星直接传到美国，然后在早晨的新闻节目中向美全国作了播放。这样，在那一天，在美国的街头，在百姓家庭，在办公楼内，在企业里，在饭店，人们议论的话题都是周恩来送熊猫。《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更是一语中的，“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长城风光无限

2月23日的北京，突然北风呼啸，彤云密布，然后就纷纷扬扬飞起了大雪。中国人盼下雪，那会带来好的收成。但尼克松和他的随行人员对此却感到很焦急和沮丧，因为他们的登上长城的梦寐以求的愿望也可能会因此而泡汤。但是，中国人仍然按原定计划安排他们去长城游览。开始，他们感到有些不放心，雪路行车会不安全。然而当车队驶出城外，他们吃惊地看到，公路两旁的山上虽然白雪覆盖，但车轮底下的柏油马路却乌黑发亮，像一条黑色的巨蟒，一直蜿蜒向前，直通长城脚下。尼克松和他的随行人员也就放心了。

雪后的八达岭，是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城墙的砖面上全是厚厚的积雪，使逶迤绵延的玉龙似的长城仿佛用雪线勾画而出，风光更加壮丽。

尼克松和他的随员迅速登上长城。望着眼前梦幻般的壮丽景致，极目塞外的无垠雪域，尼克松感到格外舒畅，顿觉心潮澎湃。他想起了这两年多来的苦心操劳和策划，像似经历了一番中国人说的那种长征，如今终于到了长城，果然风光无限。尼克松一行高兴得简直有点不能自已”有的人孩子似地来回跑着，攥起雪球向长城脚下扔去，然后不停地照相，以留下珍贵的纪念。尼克松感慨万千，说：“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

陪同游览的叶剑英元帅指着长城的景色说：“毛主席有一句很有气魄和哲理的诗，叫‘不到长城非好汉’。”

尼克松又赞叹道：“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他望着向远方延伸的长城的城垛城堞，继续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了毛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尼克松因天公未能作美发出了遗憾。

叶帅笑着说：“我们不是已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嘛。”

这时尼克松的夫人帕特笑着说：“为什么毛主席写诗只讲‘好汉’，不讲‘好女’呢？我们妇女不是也到了长城吗？”

叶帅笑罢又说：“我们都要到长城。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东方人西方人，都要共同到达一个人类和平友谊的长城。”

尼克松又说：“我看过卫星拍下的长城照片。它是地球的标志。我觉得也应该是人类和平的标志。”尼克松说完又放眼周围这冰雪世界，更极目向长城以北的方向眺望，好像他想看到那远方的苏联所在。但此时除了皑皑白雪和天野一色的苍茫外，什么也看不见。继而他又转身向长城以南眺望，突然看到了茫茫雪野中有一条黑线在延伸，那正是来时走过的柏油路面。他猛地想到，天呐，一夜之间，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把这几十英里公路上的积雪给扫光的呢？中国人没有扫雪机，怎么扫得那么快？那么干净？当他得知那是北京市政府组织了数十万北京市群众连夜奋战所为时，尼克松简直惊呆了。他觉得这在自由散漫的美国人来说，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它表现出了中国

人的整体性、纪律、献身精神和巨大的潜力，人们对此再不可低估。于是他想到：今后几十年内，要努力搞好与中国的关系，否则美国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的敌手。

乔冠华、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的交手

在尼克松及其随员去参观游览时，基辛格却留在钓鱼台的宾馆里，和乔冠华逐字逐句研究推敲要在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每一句话。在这一过程中，台湾问题是最棘手、最困难的问题，双方花费的时间最多，尽管公报的框架在基辛格上一年10月访华时已同周恩来总理大体商定，有争议问题的措辞也在那次会谈中意见趋于一致，但是台湾问题却没有定酌。如果说5个多月后，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因形势有了一些变化稍加补充就可以解决的话，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的意见则是针锋相对，彼此都不能接受对方现在的方案，双方都认为还需要经过长时间谈判来解决。

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中国说，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说台湾的前途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则只在声明中同意对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美国却坚持声明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具有一项连续性的义务。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美国还坚持，要把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缓和整个亚洲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乔冠华和基辛格这两位博士，在台湾问题上的交手，可以说都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两人旁证博引，针锋相对，展开不失学者风度的激烈争论，甚至争吵，以证明自己更有道理，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基辛格辩证逻辑性强，富于哲理，只是一口德语腔的英语很难翻译；乔冠华则在雄辩中思路清晰，思辨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让对手总是感到处于招架的境地。

乔冠华提出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中国方案的措辞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但基辛格不同意这一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乔冠华则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撤军。”

基辛格也毫不退让地表示：“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是绝不会答应的。”

结果，彼此还是说服不了对方。而每到这种相持不下的时刻，双方就会

把紧绷着的弦放松一下，说两句俏皮话，用轻松友善的态度缓和紧张气氛。于是乔冠华说道：“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讲，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基辛格听完哈哈大笑，针锋相对的紧张气氛立即得到缓解。

2月25日，会谈已进行第四天了，尼克松一行去故宫参观，基辛格和乔冠华仍然留在宾馆商讨公报的问题。直至此时，双方在实质问题上仍然各执一词，尽管时间紧迫，但两人都没有显出着急的样子。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国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则说，美国坚持撤军一定要有某种条件，尤其要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前提。下午，两人在各自向本国领导作了汇报并获得相应的指示后继续进行磋商。

基辛格首先发言：“我们同意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国愿意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而不把它放在一个句子里进行表述。”

乔冠华对基辛格的这一说法表示了兴趣，并进一步表示看法：“我看还可以作这样改班：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用‘前提’，这样写，含义似乎要更积极些，更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像似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听完乔冠华的说明，不无幽默地立即表示：“这样改动对美国更有利，这里含有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义务的意思，而且台湾的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我们同意乔先生的意见。”

就这样，基、乔在台湾问题上终于取得了突破。然后，周恩来又参加了半个小时的定稿谈判，并又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于25日晚近11点时，顺利地解决了台湾问题的表述措辞，从而形成了下面的行文：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申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大功告成后的波澜

2月26日凌晨两点，公报的全部文本落实了，大功随之告成。这几天来，基辛格、乔冠华为了完成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报文本，几乎没有睡什么觉。现在大功告成了，两人觉得如释重负，顿觉轻松愉快，这才突然感到疲倦、劳累和瞌睡。

在白天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飞机起飞前刚打印出来的公报文本。对未让其参加公报起草小组而一直耿耿于怀的国务院专家，一拿到公报就开始挑毛病，他们觉得公报不够完美。刚到杭州，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说现在的这份公报不理想，并交给尼克松一份国务院工作人员认为公报应该加以修改的地方的清单。他们一共列出了15个需要修改的地方。例如，他们认为“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太绝对，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把“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又如，他们建议删去“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等等。

尼克松看着那份清单，一股火气直往脑门顶上冲，他气得简直发疯了。他立即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本来国内保守派对他访华的反应已够使他紧张的了，他怕那些右派会攻击公报，而现在竟是国务院首先发难，挑起经过他批准的这份公报的毛病来了。尼克松穿着睡衣，在杭州漂亮的宾馆里喘着粗气来回走着。他知道，美国方面已经通知了中国人说他已经同意公报，现在又突然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会怎样看待他这个总统呢？而且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无奈之中，他只好在晚宴之前把基辛格找来商量。基辛格看着那份需要修改的清单，阴沉着脸说道：“罗杰斯他们提出了那么多修改的地方，这几乎是等于推倒了重搞……”

“我批准了，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却又要单方面提出修改，中国人将会怎样看我这个总统？”尼克松近乎嚷了起来。

“全世界都在等着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呢。”基辛格也忿忿地说道。

“看我有机会不好好收拾一下国务院！”尼克松简直有点怒不可遏。

尼克松还是不停地来回走着，他突然把手猛地向下一摆，说：“但我也总不能带着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啊？”

基辛格看着尼克松愤怒和为难的样子，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怜悯，于是建议说：“总统，看是不是晚饭后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基辛格说：“亨利，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宴会之后你再去找乔谈谈吧！”

基辛格虽然是主动提此建议，但真的去做也是挺犯难的：“真是难于启齿呵！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来的草案，我们也只得遵守我们的承诺了。”

时间不大，晚宴开始了。这本是基辛格向往已久的一席南方佳肴，但这次他却领略不到它的美味，好好享受一番，他心里老是嘀咕着宴会后要干的

事。

晚上 10 点 20 分，基辛格找到乔冠华，说有要事相商。乔冠华由于解脱了连续几天搞公报的劳累，所以觉得一身轻松，宴席上开怀畅饮，此刻心情极佳。他满面笑容地坐到沙发上说道：“博士这时找我有何见教？”

基辛格笑了笑，没有立即说话，但他已想好了，要用坦率来打动乔冠华，于是他把早已琢磨好的话说了出来：“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的乔冠华听到这里，笑容消失了，他打断基辛格的话说道：“博士先生，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就直说吧！”

基辛格没有立即回话，而是停顿了一下才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是不是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乔冠华说得干脆利索，一针见血。

基辛格苦笑了一下说道：“是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向乔冠华指出了需要修改的 15 个地方。

乔冠华立即正色说道：“博士先生，贵方的要求的确令人遗憾。中美双方已经走得很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中方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天晚上，我们的政治局也批准了公报。现在离发表公报不到 24 小时，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基辛格诚恳地说：“尼克松总统确有为难之处，乔先生。如果公报存在这些连国务院也认为的不妥之处，尼克松总统将有可能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尼克松是否由于这个问题而落选，他的继任者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美方的要求。”他一口气讲了这么多。

乔冠华听完基辛格的话之后说道：“博士先生，修改公报之事我必须请示周总理。”说完就起身离座走出房间。

操劳过度的周恩来总理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接待的安排情况。他放下电话，立即听乔冠华汇报。

于是乔冠华讲了刚才他与基辛格晤谈的情况。

难得抽烟的周总理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将烟放在烟灰缸上，说道：“你说说你的看法。”

“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解决吧！”乔冠华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章含之向我汇报说，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对已达成的公报大发牢骚，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还要闹一番。也难怪，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但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却未能去，他肯定憋着火。而且尼克

松执政后，国务院和白宫一直有矛盾。”周总理向乔冠华介绍着情况。

“总理，那我们同意作出修改？”乔冠华试探着问。

周总理望了望乔冠华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但我们同意修改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于是周恩来总理立即拿起直通毛泽东处的红色电话机，汇报了情况，并得到了指示。然后他转过身来对乔冠华说：“主席指示说：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主席特别强调，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乔冠华得到指示又回来和基辛格磋商，同意对公报中除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进行修改，凌晨两点，另一个“最后”公报草案终于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次日清晨，双方首脑批准认可。星期日中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又在上海花了两个半小时再次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甚至核对了标点符号，并做了一点文体上的改动，这就是后来正式公布的推动了国际关系变化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

周恩来机智喻“13”

2月27日，游览了杭州西子湖、特别是经历了公报的波澜冲击之后，尼克松总统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乘中国的伊尔—18型涡轮螺旋桨飞机又安全抵达上海。这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尼克松一行下榻于上海最现代化的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住在14层，罗杰斯、他的副手和国务院其他官员则住在13层。

到达上海不久，周恩来总理根据自己预先的安排，特地来到锦江饭店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走进电梯，当迅速上升的电梯根据指令在第13层停下时，他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连忙说：“哎呀，怎么安排罗杰斯他们住13层呢？13呀，西方人最忌讳13……”

工作人员这才发现此一疏忽，但已来不及改变了。

电梯上的指示灯灭了，门随即打开，人们无奈地走出了电梯。

由工作人员带路，周恩来总理在翻译陪同下来到了罗杰斯的套间房门前，只听见罗杰斯的手下官员正在里面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13”的事，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他们见中方人员过来，说话戛然而止，但一个个面上的愠色却并未消去。罗杰斯见周恩来总理进来了，连忙向房间里的人示意，他们一个个这才客气地装出极不自然的笑容。

周恩来总理首先向罗杰斯伸出手：“罗杰斯先生，你好！”

罗杰斯见周恩来把手伸了过来，连忙伸手屈身，握住周恩来的手说：“总理先生，你好。”

接着周恩来同国务院的官员逐一握手，并泰然自若地在罗杰斯旁边的沙

发上坐了下来，说道：“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特来看望你和国务院的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的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的大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我们很表赞赏。”

周恩来总理一番得体的言谈一下子把室内的紧张气氛给缓和了，罗杰斯的心情也立即轻松了不少，他连忙接过话头说：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这一步妙棋，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间的多年疏远距离拉近了。”罗杰斯面露得意之色。

周恩来笑着说：“谢谢国务卿先生的评价。有个事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疏忽了，我们很感抱歉，没有考虑到西方风俗对‘13’这个数字的避讳。”

罗杰斯他们听周恩来总理这么一说倒都笑了起来。房间里的气氛也跟着活跃了许多。

于是，周恩来总理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的时候，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他们一起笑。

周恩来总理代表毛泽东主席特地来房间看望他们，使罗杰斯和他的手下官员深受感动。本来他们只是对基辛格不满，对尼克松某些做法有意见，现在他们受到如此礼遇，气一下子消了大半，对周恩来的人格倍感钦佩，或者简直是倾倒，国务院的人员谁也没有兴趣再去搅和。

“路还长哪！”

2月28日，漆着蓝、白、银三种颜色的尼克松的总统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起飞了。它带着尼克松的紧张和兴奋，也带着尼克松完成一件大事时往往伴随产生的隐忧飞回美国。

送走了尼克松，周恩来总理也立即返回了北京。他一到北京，就直接驱车去丰泽园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毛泽东穿着睡衣，正斜靠在左右都堆着书的木板床上养神。

周恩来径直走到毛泽东的床边，问：“主席，你累吗？”

“不累，你说吧。”

于是周恩来坐到旁边的沙发上，把这两天在杭州、上海所发生的一切，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最后，他说：

“尼克松高兴地走了。他说，这是改变了世界的一个星期。”

毛泽东听到这里，精神突然振了一下：“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他习惯性地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吐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那么多年，

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同我们谈判那？”

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还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听到这里，动了动身子：“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啊？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那！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说完他咳了两声，但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周恩来无语地看着毛泽东，没有再继续朝下说。

是啊，公报是发表了，但是那青天白日旗过了六年多才在美国正式落下，我国领导人才有了到美国访问的可能。达到这一天需要走的路的确是漫长的。尼克松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并在1973年的大选中赢得了选举胜利，连任了总统，但谁曾会想到，他又在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呢？这样，他要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打算也就落空了。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不是一位民选总统，所以地位比较软弱，而且，此时美国国内右翼势力在对华政策上多方发难，所以他只是确认了承袭下来的尼克松的政策，而避免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虽然访问了北京，但在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上，很难有啥作为，其立场甚至还有某种后退。他对中国领导人说，如果他能获得连任，就一定把中美关系建立起来，但是福特未能获得连任，所以他也就无法去实践自己向中国领导人作的许诺。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于1976年相继去世，这样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两国领导人终未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一直到六年多以后的1978年底，两国的新领导人，才最终把两国外交关系建立起来。所走过的路是漫长的。

第五节 一波三折

1976年11月，四年一次的政治季风又在太平洋彼岸刮起。第38任美国总统福特在竞选连任时败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手下。新总统卡特上任后，面对苏联的咄咄的进逼之势，应对乏术，他想借重中国的力量，在战略上谋求与苏联抗衡，因此决定按《上海公报》一个中国的原则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在1979年1月1日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墨迹未干，卡特政府又于1979年1月26日，向国会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草案，并于4月10日签署了由国会两院辩论通过、严重违反《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国际法的这一草案的最后文本，成为美国的一项国内法律，从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新的障碍……

万斯无功而返

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1977年1月入主白宫时，苏联及其盟友古巴正进一步在亚洲、非洲节节推进，频频得手，影响越来越大，而卡特却应对乏术，给美国人一副软弱无能的形象。因此，卡特自然而然地想到应踏上由他的前任尼克松打开的通向北京之路，借助中国的力量，谋求在战略上与苏联抗衡。特别是嗅觉敏锐的美国商界，他们早就瞅准了中国这个拥有巨大潜力、尚未开发的市场，跃跃欲试，总想来中国发展。在香港的一些美国大公司的老板甚至联名上书卡特，要求美国下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不要拉在其他国家之后从而被挤出中国市场。而此时的中国虽已粉碎了“四人帮”，举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全党已在准备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科技进步上来，但其国家安全却一直受到部署在两国边界上的虎视眈眈的苏联百万军队的威胁，它也需要建立一条非正式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反抗苏联的霸权。这就使卡特更感到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机正在逼近，于是，卡特总统1977年5月22日在圣母大学的一次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讲话中宣布，中美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中心因素”，表示将按《上海公报》一个中国的原则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了表示自己对中美关系的关心，卡特还特地让其儿子随美国国会议员团于1977年4月访华。

6月，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成形，决定要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却又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国作出几点保证：第一，建立邦交不妨碍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第二，美国人民能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非正式的文化、经济和其他各种关系而不受妨碍；第三；在建交的时候，美国

能就它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这一点单方面发表一项不引起争辩的声明。这样，卡特在7月30日，将国务卿万斯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正式指示说：

“赛，到北京后，你把全盘都托出来。我从来没有因为拖延得到过好处。你要说明白我们的全部立场。”

“总统，您尽可放心，我会把美国的立场全面深入地向中国人作出解释，让中国人准确地了解我们。”万斯满有把握地应承了下来，但随即又改变口气问：“万一中国人拒绝我们的立场，那么我该说些什么呢？”

卡特说：“如果中国人愿意接受我一揽子方案，我准备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如果他们不愿意，那只好算了。我不愿意走得更远。”“万斯听完卡特的话，心中已经有了底。

8月22日，经过认真准备的万斯，随身带着承认中国的公报草案飞抵北京。他一到北京，就与黄华外长进行了紧张的会谈。后来又会见了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

万斯在会谈中首先要求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中国“明确承诺”或“默认”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来达到统一的目标，中国方面理所当然给予拒绝。万斯提出的另一个要求是：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美国在台湾设立一个半外交性质的联络办事处，以提供一个使美国与台湾继续维持关系的途径，处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事务。中国方面对这一想继续维持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明显有制造两个中国嫌疑的要求同样给予拒绝。此外，万斯还提出，中美建交后，由美国发表一项单方面的声明，宣布美国对台湾的未来表示严重关切。中国方面认为，这完全是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也坚决予以拒绝。至于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和供应武器的问题，由于万斯看到了中国的严厉立场，甚至都没有提出来。不难看出，万斯此来谈判，其立场与中国的立场差距是很大的。8月24日，邓小平副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万斯时，快人快语，直接了当地对万斯说：

“如果要解决问题，干干净净就是三条：断交，撤军，废约。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的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

这一会见，使万斯更好地了解了中国的立场，知道哪些事情上中国可以通融，哪些事情上中国会寸步不让。

布热津斯基主动请缨

万斯访华未能就中美建交问题达成协议，但也使卡特政府进一步理解了中国在建交条件上的坚定立场。而就在美国还在那里围绕与中国建交一事挖空心思要维护与台湾的关系、踟躇不前时，苏联却在非洲、中东挺进，在裁

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中给美国出难题，不断向美国提出新的挑战。中国则在万斯访问后的数月中，大开国门，走出去，请进来，全面展开与外国的政治、经济上的交往。特别是与日本签订了一个为期八年的双边贸易协定，与欧洲共同市场签订了一个为期五年的贸易合同，与日本在谈判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这使卡特政府深切感到，早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在此同时，1978年初，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向卡特总统提交了一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和时间选择的重要文件，认为1978年中期选举之后，卡特的政治力量和权力都将趋于最高阶段，是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最佳时间，而且这个时机稍纵即逝。基于此，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会议建议卡特总统立即采取外交上的主动，把1979年1月1日作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预定日期。

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由于对苏态度强硬，经常直率批评苏联在非洲的冒险，因而倍受人们注意。同时，他还极力主张美国应主动接近中国，因此卡特认为，派遣已引起中国人兴趣的布热津斯基去中国谈判关系正常化事宜是极为合适的人选，而布热津斯基自己也在卡特面前不断主动请缨，力陈由他去中国帮助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有利之处。这样，布热津斯基就在1978年5月20日来到了中国。

在与黄华外长的会谈中，布热津斯基首先向中方声明：一美国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共同的利益，是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是源自与寻求建立全球或地区性霸权的任何国家的努力对抗的长期战略观点。卡特总统认为，中国在维护世界均势中发挥中心作用。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同邻国和平相处的中国，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将是和平的力量，将对解决世界的问题起建设性的作用。”

黄华外长对布热津斯基所阐述的美国立场表示赞赏。

在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时，布热津斯基强调：“美国政府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全球政策中具有中心的重要性。卡特总统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决定同你们（中国）一道克服阻碍两国关系按上海公报完成正常化的剩余障碍。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但希望在美方作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确遭到中国的反驳，但这并不是作为条件提出来的。”

布热津斯基告诉中方，美国政府已授权美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为美国代表同中方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

台湾，你有多重要？

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布热津斯基此次来访，会谈中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所传递的信息也是明确的，因而中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7月5

日，中美双方正式在钓鱼台开始建交秘密谈判，中方的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黄华外长在与美国代表、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会谈时首先明确阐述了中国的立场：

1、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美国派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因此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必须采取主动行动，就像中国的二句俗话说的那样：“解铃还需系铃人”；

2、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项原则；

3、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还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美国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4、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此后至9月上旬，又进行了四次会谈，双方更为详尽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在此同时，布热津斯基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也经常举行会谈，沟通情况，加深彼此了解。

卡特总统为推动中美建交谈判，1978年10月中旬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由于此时的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已极为紧张，决定推迟美国同越南关系正常化；二、正式向中国提交一份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公报草稿，以表示美国方面确实具有诚意，准备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伍德科克于9月19日在与黄华外长会谈时提出了一份建交联合公报草案，但是这份草案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作出太多的调整，与中国的要求差距较大。同一天，卡特总统在华盛顿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声称“如果我们对台湾人民未来的福利感到的担忧能够消除的话，我们准备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此微妙时刻，为了促使美国尽快下最后决心，邓小平副总理于10月25日在他的访日期间的东京记者招待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就是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必须做到断交、撤军、废约。11月4日，也就是在苏联与越南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公布后的第二天，伍德科克又提出一份公报草案，立场有了比较大的调整，草案中还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日期是1979年1月1日，但是，在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上仍然几乎是原地踏步。11月29日，邓小平对日本公明党访华团谈话时作出明确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他可以访问美国，并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决断。12月4日，代替生病的黄华外长出任中方谈判代表的韩念龙副外长在与美国谈判代表伍德科克会谈时，提出了一份中国的建交联合公报草案，该份草案包含了同意美国草案中的1979年1月1日或3月1日为正式建交日期的内容，显示出中国推进谈判的积极姿态。伍德科克还被告知，邓小平副总理不久将与他会见。伍德科克马上感到这里面必有重要文章，于是立即把这一重要讯息传递给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

这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要求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抓住时机早下决断。卡特总统在获悉邓小平副总理准备会见伍德科克后，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决定性时刻。他亲自审核和批准了伍德科克将要呈送给邓小平的一份经过

修改的、充分考虑了中国方面意见的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公报草案。继而又派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转达了美国总统希望邓小平在中美签署建交公报后，尽快访问美国的正式的邀请，并强调现在已经到了就中美建交作出最后决断的时候。同时，白宫又立即发了一份指示伍德科克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电报和请邓小平在两国建交后访问美国的邀请书。1978年12月14日，邓小平副总理两次会见伍德科克，第一次，伍德科克告诉邓小平副总理，卡特总统赞成在15日公布建交消息。第二次，伍德科克向邓小平副总理提交了经过修改的建交联合公报草案，两人并对草案进行了认真讨论。双方争论的最大焦点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后邓小平考虑到美国决定按条约规定于1979年底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情况，只要求美国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又爽快地接受了卡特总统请他于1979年1月访问美国的邀请。伍德科克立即把会谈结果电告国内，电报说：“我的天，他们接受了。我想我们终于有了收获。”卡特总统大喜过望，当即建议中美双方在两天之内就提前公布建交公报，以免夜长梦多，再起波折。

中美双方经过历时半年的秘密谈判，终于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达成了如下协议：

- 1、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非官方关系；

- 2、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

- 3、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在这些协议基础上，双方商定于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5日）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美双方尽管达成了这些协议，但是，有些问题由于美方的原因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

首先，美国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中国则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人不能干涉。最后，双方只好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美国在声明中表示它期待台湾人民将有和平的未来，关心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其次，美国坚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中国在宣布中美建交时发表的声明中强调：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而美国则公开表示，它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所谓“防御性”武器，声言“出售武器的数量和性能同北京对台湾问题的

态度联系在一起”。所以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一个潜在的麻烦问题，是中美之间经常发生磨擦的重要根源之一。

《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

美国在与中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起初对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应该说还是积极的，也采取了不少落实联合公报、推动关系发展的实际步骤。面对预料之中的台湾当局的强烈抗议，美方基本上还能按建交联合公报的精神去处理。如它不希望台湾当局驻在美国的外交机构的名称有任何字眼表示他们代表中国；把台湾在美国的 15 个“领事馆”变为驻美民间机构的 8 个分部。美国国务院要台湾驻在美国的代表不得对美国的新政策进行公开的批评或反对，如果违反，就予以驱逐出境，并要减少台湾驻美机构的正规职员的人数。其中有一位台湾的高级代表，由于对美国处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式发表了公开讲话，就被要求离开美国。而对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来访却给予了隆重的礼遇，铺上红地毯，鸣礼炮 19 响，把他作为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首脑来接待。而且随后两年，中美两国的关系依据公报的原则发展很快，两国的政府机构之间签订了 35 个条约、协议和议定书，贸易、旅游和学术交流迅速发展。但是，在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告宣布前后，一些美国右翼势力就已开始对此进行激烈的反对和攻击，有些国会议员竟指责卡特总统的行动是什么违背宪法，背叛盟友，影响美国的历史传统和外交道义精神。这就使得 1979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第 96 届国会的头一天，显得特别热闹。参议院中，议员们一下子提出了 6 项议案，以后几天又提出了 6 项议案，目的都是要打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约束，确保美国与台湾在外交和军事关系方面的某种程度的连续性。在随后的辩论中，一些议员信口雌黄，不顾起码的外交道德，任意干涉中国内政，演出了一幕幕霸权主义的丑剧。他们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发难。一个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的“台湾安全保证”问题。他们认为，在发表建交公报时，没有获得中国不以武力进攻台湾的保证，要求在卡特向国会提交的授权法案中，应明确写上美国承担“保卫台湾免受大陆中国攻击”的义务。有的议员要求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某些条款原样搬进授权法案中；有的议员则主张明文规定，中国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就立即撤消对中国的承认乃至中断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建议在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款中，注明要包括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二是美台断绝“外交”关系后，双方互设的办事机构如何定位，实际上也就是美台关系的性质。在卡特于 1 月 26 日向国会提交的综合法案中提出，美国将在台湾设立一个民间性质的团体机构，名字叫“美国在台湾协会”，以处理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之间的非官方的关系（台湾也在美国有一个类似的机构，名字叫“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但在辩论中，一些议员明目张

胆地要求赋予这个机构以官方性质，主张该机构负责人的任命，应该像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驻外使节的任命一样，征得参议院的同意批准；有的主张“美国在台湾协会”的工作人员，应该列在美国政府正式工作人员的工资花名册上：有的议员主张给予台湾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外交官所享受的全部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有相当多的议员甚至要求在美国和台湾之间互设“联络处”，就如同中美建交前的一段时间美国和中国之间互设的“联络处”那样。

这批议员中表演得最充分者当数共和党右翼保守派参议员戈德华特。早在建交公报宣布前他就发表演说和撰文，警告卡特总统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得片面废弃，如果卡特孤注一掷，为维护美国的所谓“三权分离”的基本原则，他将诉诸法律。果然，在中美宣布建交公报之后，他与其他15名参议员在华盛顿哥伦比亚地方法院控告卡特总统违宪。于是卡特在1978年12月30日发表了一个致各部会与机构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里，他竟然又把台湾说成是类似国家的一个“实体”，声言“美国与台湾现有的国际条约与协定将继续有效”。

但是美国国会里对中美建交的喧嚣远未结束。1979年2月1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等25位参议员和88位众议员又向国会提出一个正式提案，规定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并且指示总统将影响台湾和平、繁荣及福利的任何危险情势，迅速通知国会。2月9日，参议员丘奇等人对卡特总统1月26日向国会提出的“综合法案”提出修正案，声言“对台湾的武装攻击，视为是对台湾人民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的一项共同危险”，将对台湾供应足够的防御武器，协助台湾维持自卫能力。此项修正案于2月22日在参院外委会获得了通过，后参院又经过审查、辩论和修订，定名为《台湾授权法案》，于3月13日通过。在此同时，众院也修订通过了在内容上与参院所通过的《台湾授权法案》大同小异的、名为《美国——台湾关系法》。但该法案在有关台湾问题上的措辞更为露骨，声言“美国将让台湾获得足够数量的现代技术传统防御物资及保养手段，以防御武装攻击。此举无需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而此种军事需要将由总统和国会决定”。由于参众两院的法案有一些不同之处，两院又推举代表举行协商会议，将两院的各自法案合并修订，从而成了后来的《与台湾关系法》，众参两院分别于1979年3月28日和29日予以通过，卡特于4月10日正式签署，成了美国的一项国内法律。

美国国会和政府的这一系列动作完全是对中国内政赤裸裸的粗暴干涉，它理所当然要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早在美国的参众两院通过各自的法案时，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就于3月16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态度。黄华外长指出，中美建交时，美方明确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同时，美方还承认，解决台湾回归祖

国，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可是，美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却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未来关系具有官方性质。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如果这些立法议案按照目前的措辞获得最后通过，并经签署生效，这对中美两国刚建立的新关系是很有害的。

黄华外长最后表示，美国政府有责任运用自己的影响和职权，确保在处理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上不出现任何违反两国建交协议的事情。但是，事实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国的严正立场，美国国会最后仍然以和参、众两院的法案差不多的措辞，制定并通过了新的立法议案《与台湾关系法》，并交卡特总统签署生效，迈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美刚刚建立的新关系的严重的一步，也为美国以后不断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挑起争端埋下了祸根，使中美关系一直无法得以顺利发展。

如此违背建交联合公报和国际法

美国国会所制订的《与台湾关系法》，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它制订此法并不是为了怎样来更好地贯彻落实美国政府刚刚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各项条款和各项基本原则，而是恰恰相反，它要利用这一美国国内立法来部分否定和抵销建交公报所阐述的有关基本原则。有一位参议员在《与台湾关系法》通过后，很得意他说道，美国国会在制订《与台湾关系法》时所追求的就是试图维持现状，同台湾照原样保持关系，好像中美建交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似的。

尽管卡特总统对国会中那些最露骨、最明目张胆地背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一些所谓建议，也表示了反对，甚至还威胁过要使用否决权，但对其他一系列也违反建交公报的所谓“修正案”，却表示同意。他在签署《与台湾关系法》之后，立即发表了一个声明，硬说此法符合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但是我们通读《与台湾关系法》的全部 18 条，却发现此法严重地违背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国际法。

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既然如此，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美国政府也就理所当然地要承认，中国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的统一，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或任何其他外国都无权干涉。

但是，《与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却这样载明：

“美国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基于以和平手段决定台湾前途的期望”；

“认为借和平以外的手段包括封锁或禁运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尝试，乃

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威胁，因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

“维持美国之能力以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形式的强制行动”；

《与台湾关系法》的第3条又规定：

“责成总统，任何对在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威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美国利益的任何威胁，均应迅速通知国会。总统与国会将遵循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对前述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反应措施”。

这些条款的内容显然都违背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前途，它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根本无权在那里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这充分暴露了美国的某些政客的霸道嘴脸。

需要指出的是，《与台湾关系法》所列的这些条款，对台湾的“安全”的所谓关心和所作的保证，比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只说不许危及台湾的“安全”，而《与台湾关系法》竟还规定不许威胁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只反对对台湾使用武力，而《与台湾关系法》更进一步，也反对对台湾使用“其他形式的强制行动”，例如封锁或禁运等。难怪美国前驻台湾的一位大使对《与台湾关系法》的作用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在美国协防台湾司令部和所有美国其他军事人员离开那个岛屿、共同防御条约从1980年1月1日起失效之后，经国会修正的《与台湾关系法》保证台湾的安全和稳定，如同过去通过正式的外交关系和条约做的那样。”台湾的美国商会主席更是喜形于色地认为，《与台湾关系法》中的那些“保障台湾安全”的条款，“甚至比共同防御条约更为有力”。台湾的一些舆论更是得意洋洋，认为从效力方面看，《与台湾关系法》强过《共同防御条约》，后者只着重军事方面的安全与合作，而前者更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贸易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安全与加强合作。美台关系今后会更为密切和友好。

《与台湾关系法》第3条还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御武器和防御服务，以使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是中国内战中的失败一方，早就失去了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这是举世皆知的不争事实。美国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因而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台湾要获得美国的武器，其唯一目的只是为了要对抗被美国庄严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既然如此，美国用军火去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地方当局同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对抗，就是不折不扣的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了。

大家知道，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不允许干涉各国内政和保护各国独立与主权的宣言》，要求“任何国家不得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美国是投票赞成这个宣言的国家。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各国依

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它明确指出，“任何旨在部分或完全破坏一个国家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企图，都不符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每一个国家有责任不组织、煽动、资助或参与另一个国家的内争”，而美国当时还是这一宣言的提案国。美国的中央政府，在南北战争时期，曾坚决反对英国向南方叛军提供武器，认为这违反了国际法。现在，美国却又用行动来反对自己 130 多年前就已做过的符合国际法的事和反对自己曾郑重其事投票赞成或提议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原则，这充分暴露了美国一些政客的不讲信义的伪善心态和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道嘴脸。

其实，他们并非不知道这样做是在违反国际法，一位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参议员就在国会中问道：“在我们已经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政府之后，我们怎么能再卖军事装备和武器给台湾人民呢？我们岂不是出卖武器给一个叛乱的省份吗？”这位参议员先生的话正好从反面证明，卖武器给台湾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承诺是不相容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别的国家也按照美国的逻辑行事，承认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但又支持美国的一个州或“黑人共和国”，鼓励它同美国中央政府对抗，那么美国政府将作何考虑呢？

《与台湾关系法》在美台关系的性质定位上也同样严重违反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国际法。建交联合公报明确写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诺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只在此范围内，保持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的文化、商务和非官方关系。但该法第四条的如下规定：“凡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外国民族、外国国家、外国政府或类似实体时，此等名词应包括台湾，此等法律亦适用于台湾”和该条其他款以及还有一些条款的许多说法，实质上是要继续把台湾当做“国家”，把台湾当局当作一个“国家”的“政府”。美国当时的一位副国务卿则一语道破天机：《与台湾关系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来看待。

《与台湾关系法》第 4 条第 8 款规定，美台之间 197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签订并有效的“一切条约和包括多边公约的其他国际协定仍继续有效”。这就是说，美台之间过去以国家名义签订的各种“条约”和“协定”，将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众所周知，只有国家才有缔结国际条约和协定的权利，地方当局只有得到中央的同意和授权，才可以同外国订立国际协定。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美台间原有的一切“条约”和“协定”，理所当然要被宣告无效，但是该法却让其“继续有效”，这是践踏国际法的又一例证。美国自己的宪法第一条就明文规定：任何州不得同外国缔结条约，都不得未经国会同意同外国订立协定。它要求本国的州不得同外国缔结条约，但又宣称本国与外国的一个省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仍然有效，这叫什么逻辑？有一位美国参议员在国会辩论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不管他出于什么

目的，但却说出了真相。他说：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之后，美国同台湾原有的那些“条约”和“协定”，怎么能够继续有效呢？难道美国不经加拿大政府的同意，就同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保持条约关系吗？

《与台湾关系法》第4条第3款规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举，在任何情形下不得影响台湾治理当局在1978年12月31日以前拥有或持有，或在此之后获得或赚取的有形财产及无形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及利益”。本款又是对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粗暴的践踏。而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美国政府有义务在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之后，把原来被台湾所占有的、中国在美国的官方财产，及时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接收。

《与台湾关系法》在规定美国与台湾断交以后美台关系的处理程序上和对方设立的民间机构中工作人员待遇上，同样严重践踏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国际法准则。该法第12条规定，由“美国在台湾协会”“自己或通过它达成或将要达成的协定和交易，需遵守同样的向国会报告、由国会审查和批准的规定和程序，如同这些协定和交易是由协会所代表行事的美国政府机构自己达成的或通过它达成的一样”。该法第10条又规定，对在对方所设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给予为有效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而后来两个所谓民间机构之间所签订的《特权和豁免协定》几乎包括了全部外交特权和豁免。还是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坦白得可爱，他说，《与台湾关系法》所创立的“美国在台湾协会”，是一个“蹩脚的伪装”，除了名称以外，它“具有美国政府官方机构的一切属性”。

从上述对《与台湾关系法》的部分内容的简单分析中，人们已经看清，该法的根本目的，是要“保证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在实质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下去”，从而达到继续控制台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目标。也充分暴露了美国政界的一些政客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强盗逻辑和霸道行为。

战斗正未有穷期

台湾问题曾经一直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美两国先后在日内瓦和華沙举行了136次会谈，终因美国顽固坚持其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霸道立场，而未能取得任何突破。尼克松总统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顺应形势，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有了进步，接受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还谈不上接受中国的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中国一贯坚持的建交原则。后来尼克松想在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他又因水门事件下台了，继任者福特因地位比较软弱，也未能做到。到了民主党总统卡特上台后，他接受了中国的建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后，中美两国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才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按理说，台湾问题到此已经解决了，但美国又制订了严重背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国际法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一国内法律，使台湾问题重又成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巨大障碍。

美国有那么一些掌握着国家重权的政界人士，迫于变化了的形势，一方面想同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又想继续控制台湾，图谋“鱼和熊掌兼而得之”，因而苦心孤诣，炮制一个又一个方案，什么“两个中国”啦，“一中一台”啦，什么“台湾地位未定”啦，什么“一国两府”啦，等等。在这些如意算盘遭到中国坚决反对而无法得逞时，他们又处心积虑，妄图把台湾搞成某种“独立政治实体”；让其取得某种“国际地位”，把“一中一台”的模式换个包装，摆到世人面前，于是就有了《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他们想通过这一手，让中国接受既成事实。这些人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由于中国在搞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从美国那里获得帮助，因而只要美国态度强硬一些，那么中国就只能会把这杯由美国酿制的台湾问题的苦酒喝下去。但是这帮政客的历史知识和对现实认知的能力可以说是零。三十多年来，中美两国围绕着台湾问题所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从朝鲜战争到炮击金门、马祖到中美两国谈判桌上的斗智斗勇，应该说已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实现祖国统一的立场和决心。中国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任何人对此都不应低估或作出错误判断。

一些美国政客在辩论、修改《与台湾关系法》过程中，还口口声声说他们主张加上“保障台湾安全”的条款，只是“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实际上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在阻挠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只能鼓励台湾当局拒绝和平谈判，反对和平统一。台湾当局正企图对和平解决的愿望进行投机，妄想通过这一步骤长期维持现状，达到分裂的目的。而这也正是台湾当局利用和平，制造分裂的实质所在。君不见，李登辉不是在要求海峡两岸签订百年和平协定吗。仅此一点，就把李登辉集团妄图长期分裂祖国的嘴脸暴露无遗了。所以，这样做的结果最后反而会导致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也就是迫使中国不得不采取本来不愿意采取的非和平方式去解决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

早在美国国会辩论《与台湾关系法》时，中国政府就已向美国政府严正指出，美国国会将要表决通过的那个法案的文本，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了中美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和美方的承诺，对两国刚建立的新关系是有害的。在美国颁布了《与台湾关系法》之后，中国政府又向美国政府郑重指出，如果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建交时的协议，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希望美国政府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切实遵守中美建交协议的原则。

此外，我们还必须指出，《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一部国内法律，它

是不能凌驾于美国与其他国家所签订的国际协议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之上的，也不能用它来规范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的。美国自己也郑重签字的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明文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

但是，尽管中国政府反复向美国政府阐明中国的立场，晓以利害，美国政府特别是国会，却仍然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损害中国的利益，破坏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首先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这一侵犯中国的主权的恶劣行径向为中国政府所坚决反对。然而就在中美关系刚刚开始正常轨道上运转时，1981 年，美国就迫不及待地又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武器的质量还有所升级。为换得中国的默许，美国还煞费苦心声音也向中国出售若干武器。中国对此当然不能同意。中国政府遂于 6 月 10 日发表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内政，售武器给台湾。如美竟然不顾我一再坚决反对，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我势必作出强烈反应。”以后美国政府又变换手法，用租赁的办法向台湾提供军舰和潜艇等军事装备。1992 年，美国布什政府又公然不顾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和抗议，向台湾出售了 150 架 F—16 战斗机，迈出了破坏中美关系的严重的一步。特别严重的是，美国克林顿政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悍然批准李登辉于 1995 年 6 月窜到美国进行所谓“私人访问”，干出了此前六任美国总统想干而不敢干的事，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针对美国政府这种毫无顾忌地践踏《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国际法准则，明目张胆地制造“两个中国”的背信弃义行径，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召回大使，中止两国高层往来。中国的严正反应，也使美国看到，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都会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中国必然会做出强烈反应。

中美关系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现在又处在一个新的关键时刻，是沿着《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各项原则所指明的方向前进呢，还是为《与台湾关系法》所累，在原地打转，或者向后倒退？这就要看美国的决策者们能否认真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正确地估计对方的发展前景，清醒地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作出明智的抉择。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中国决不可存有幻想，自己的命运必须自己掌握。

第四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

时至 80 年代，人渐耳闻世纪末的脚步声。世事变幻、国事沧桑，万千争战转趋平安。

中美两国关系在正常化的基础上日益发展，但却面临重重困难。里根出身反共分子，他的上台原本就是对中国的挑战。果不其然，里根政府利用台湾、人权、经贸等问题，蓄意制造事端，惹出一串串的麻烦。中美关系频频告急，甚至一度走向倒退的边缘。中国政府既念小我，兼顾大局，在捍卫国家主权的同时，也挽救了中美友谊。

生之不息，长则不止。中美关系犹如一棵小树在无尽的风雨中艰难成长。

第一节 里根甫为人君不入套

里根出身平民，古稀之年跃身而为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主，喜悦之情自不待言。再加上长期的演艺生涯，使他练就出来一副言行夸张、善变的风格。未俟坐上九五之尊的位子，他就抑制不住新官烧火的兴奋劲，旁若无人他说唱开了。

殊不知，世事之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莫过于言与行。当今之世，国家民族部族林立，经济政治社会巨变，治国之君无一不要既内顾国计民生、又外念邦道世情，由不得不谨言慎行。

里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初在其位粗谋其政，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说过许多伤害两国人民感情的话，也做了不少妨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事；在位日久，渐入政道，终将中美关系从危机推向和平与发展。

布什“做出一副怪相，但拒绝评论”

1980年夏季的美国，气温比往年都要高，热浪来得似乎也较早。

四年一度的总统竞选正在美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吉米·卡特为争当下届总统，唇枪舌战，相互攻讦，闹得不可开交。里根攻势猛烈、步步进逼，卡特招架不住、节节败退。

为了哗众取宠、广拉选票，里根借台湾问题放厥词，责难卡特总统，以迎合美国反共亲台的保守主义分子。

他一方面指责卡特与中国建交是对“中华民国”的背弃，另一方面公开鼓吹美国与台湾恢复“官方关系”

他起初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给予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代表美国在台湾利益的非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以官方地位。

后来，他又说：

在美中关系变化前，我们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现在随着在北京建立大使馆，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台湾设立一个类似那样的官方联络处，这是没有道理的。

共和党为了给里根竞选呐喊助威，也在党的政治纲领中宣称“对卡特政府对待我们长期盟友台湾的方式深感遗憾”。

里根信口开河，在国内立即遭到了共和党之对手——民主党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改变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方针，那将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警告说“要使时钟倒转是办不到的”！

共和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对里根的讲话也纷纷提出批评或表示不满。他们认为，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原因，美国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密切关系，以遏制苏联。

中国方面迅速作出反应。有关部门对里根关于中美关系的谬论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且警告说，恢复美台之间的官方关系，将违反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中国领导人强调，任何从中美关系现状倒退的言行，都将损害中美关系赖以建立的政治基础。在台湾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绝无妥协退让的余地。

里根的竞选班子知难而退，试图为其出言不智消除不利影响。

里根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理查德·艾伦数次出面向新闻界予以澄清，称里根并无采取损害中美关系之行动的想法，他如果当选总统亦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现状。他提到里根想“研究一下同台湾关系具有一种官方性质的可能性”，但辩解说“这与两个中国的政策不同”，同时告诫记者不要将这位总统候选人在台湾问题上的可能行动夸大其词。

为了排解中国人的不满和忧虑，借机试探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底线，同时争取中国对自己的支持，里根的竞选班子派遣里根的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于8月20~23日前往中国访问。

布什启程前夕，里根参加了欢送仪式。面对众多政要和记者的簇拥，里根情绪亢奋之下嘴无把门，再次弹出他要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的滥调来。难为布什，不得不一遍遍琢磨出面对中国人时的新说辞。

抵达北京后，布什凭着他与中国人的旧情和诚恳态度，赢得了中国的同情和宽容。这位前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向中国领导人解释说，里根最近提到“中华民国”是“出于习惯”，他不打算使中美关系发生逆转。

布什明确保证：“里根州长 如果当选总统，不会开倒车，他不会参与某种两个中国的政策。”

他并且表示：“我们同现政府一样，怀有强烈愿望想加强并继续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遗憾的是，里根本人似乎并没有理会他的顾问和竞选伙伴的良苦用心，对他们设法传递给中国的信息无动于衷。更为严重的是，当布什还在北京向中国方面作保证的时候，里根在国内不识时务地又一次谈到同台湾重建某种官方关系的问题。

布什在北京获悉里根的讲话后，陷于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面对东道主中国人的质疑，他无言以对，只好“做出一副怪相，把一只手放在前额，但拒绝评论”。里根的讲话使布什的保证失去了可信性，他的中国之行显然也就无法完成如期使命。

布什回国后，会同里根竞选班子中的伙伴继续为他们的准主人装点门

里根 1967 年 1 月始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70 年竞选连任直 1974 年任期届满。

面。经由这班谋士反复说明和耐心解释，里根在台湾问题上终于有所退却。

8月25日，里根与布什一起在洛杉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一项关于“对华关系五原则”的声明，试图澄清他以前多次讲话引起的混乱。

声明表示要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他说美中关系“应是全球性的和战略性的合作关系”。

声明放弃了里根过去关于给予“美国在台湾协会”以官方地位的说法，而改称“计划根据美国的法律——《与台湾关系法》发展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并且说不会做诸如禁止在政府官员的办公室里接见台湾代表这类的“小动作”。

但是，他却同时指责卡特政府“作出了尼克松总统与福特总统坚决拒绝作出的让步”，认为那“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

里根最后仍然拖着一条狐狸尾巴，说他如果当总统，将会坚持“使设在台湾的联络处保持与我们先前设在北京的联络处同等的地位”。

这是里根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全面阐述他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不久，里根本人也口改善言，对他过去的言论作了更正。

1980年11月14日，美国大选揭晓，里根以压倒优势取胜，当选为美国第40届总统。

1981年新年刚过，即将就任总统的里根接受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访问。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表现出为人之君的严肃，但仍不脱曾为演员之习的激动，他说道：

我将真诚地谋求改善友好关系，但不能走得过快，以至于有朝一日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来打美国。

里根本人关于未来中美关系的预言含有中伤中国的成份，里根帮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仍然带有明显的亲台疏华色彩，但他们都不再存有恢复同台湾的官方关系的妄想。

对于这一积极转变，中国人了然在胸，并予以充分肯定。中国政府对里根一直礼待有数。

美国总统选举揭晓时，中国总理赵紫阳立即致电里根，衷心祝贺他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

1981年1月20日，里根正式登位就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同时就任美国副总统。

中国总理赵紫阳再次致电里根，祝贺他就任美国总统，并且表示希望在他任期内“中美两国关系将在双方恪守中美建交公报各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中美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日益增进”。同一天，赵紫阳总理也向布什副总统发去了贺电。

当然，里根还是始为人君，他和他的政府今后在中美关系上到底会怎样做，还要拭目以待。正如邓小平说过的那样，“中国对美国新总统的评价，

不是看他的承诺，而要看他的行动”。

毕竟，里根的骨子里流淌着反共亲台的血液。他在竞选时期的言论正是他这一本质的真实流露。

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对里根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的所作所为保持警觉性。

新总统意欲“脚踩两只船”

里根当总统，人升高位未换心。

他头脑中的反共亲台思想根深蒂固，不可能朝令夕改。

里根生于 1911 年 2 月 6 日，母亲是英裔美国人，父亲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且为民主党党员。他上大学时期正赶上美国 30 年代的大萧条，父亲的鞋店倒闭后他不得不勤工俭学以补上学费用，同时还要资助哥哥上大学。父亲失业后，为了生计参加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总统竞选活动。罗斯福当选后，里根的父亲也在当地的救济机构顺利谋得一份工作。里根由于家庭得到罗斯福的好处而数次投票支持罗竞选连任总统，并从此热衷于民主党的各种社会活动。就在这个时期，他加入了拥护罗斯福紧缩政策的民主党自由派，从而消化吸收了其一套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他 1937 年进好莱坞当演员，并很快加入电影演员会，1947~1952 年连续 6 届担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在思想上深受大多数为共和党保守派的工会会员的影响。其间，美国掀起反苏、反共、迫害进步人士的恶浪，他也成为反共干将。1952 年，他转向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1962 年正式脱离民主党加入共和党。1966 年他放弃演员职业专门从政，后竞选连任两届加州州长。1968 年和 1975 年，曾两次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但均未成功。

家庭环境、社会生活和个人经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使里根的思想日趋保守。

他重守成轻变易，对反对者的批评毫不留情，而且往往言词激烈。但在采取行动时，他又比较谨慎，处理问题时有灵活性，必要时能与反对者妥协。有人因此称他为“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他曾经自画自像说道：

我肯定不是一个僵硬的教条主义者。我忠实地信仰某些重大的原则。如果以温和的方式行事意味着更为明智和有效，我肯定也是个温和的人。

言谈之中流露出自以为是的心态。

里根的反共意识正是靠着这种保守思想和自以为是心态作土壤才得以扎下根来。早在 40 年代，他就毫不讳言：

我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不知道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什么，我所知道的只不过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但仅凭我知道的这些，就足以使我憎恨它了。

与他的保守、反共思想一脉相承的是，里根曾经还是美国政界中有名的“支持台湾的人物之一”。他强调台湾起到了美国“反对共产主义战略前哨

的作用”。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里根于 1971 年和 1978 年两度访问台湾。

7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对抗日益加深。出于反对最大的共产主义对手苏联这一战略需要，里根开始“与许多保守派一样，把中国看成是制约苏联的宝贵砝码”。

他在 1976 年初曾建议福特政府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放宽与中国分享战略情报的范围，目的是借以施加影响、防止“比较亲苏的势力有可能在毛泽东去世后占上风”。同时他特别告诫美国人，不能中断与台湾的关系。1978 年 12 月，他明确指责卡特总统准备同台湾断交是对中国的“屈服”，并且质问：“急于现在这么干，究竟有何紧迫性？”对里根来说，无论是这个时期的猴急谩语还是 1980 年的信口开河，均发乎肺腑，可谓言为心声。它们同出一辙，完全是由于里根的反共亲台思想在作怪。上任伊始，新总统里根由于古稀之年始偿宿愿而深感所得来之不易，他的保守主义思想较之过去尤甚。起初，他迫于国内和中国的压力，在中美关系上逐渐说些理智的话、做些有益的事，但很快就又旧调重弹，流露出提升美国对台关系的企图来。就职不到两个月，里根总统与黑格国务卿等高级顾问就在 3 月初内定了对华政策的新方针。3 月 14 日《华盛顿邮报》透露了这一新方针的内容：在对美国同中国和台湾的关系进行一次全面的政策研究以前，暂不对目前的关系作任何改变，但不排除将来作出改变的可能性。4 月 27 日，里根总统提名担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霍尔德里奇在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时，第一次道出了美国新政府对华关系的基本原则。霍尔德里奇说：

美国一方面将保持和加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将按照美中建交公报的规定和《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同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在这种非官方关系的范围内，美国将改进同台湾关系的格式或质量。

美国在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履行责任和义务时，将注意不使其与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关系发生抵触。

霍氏“不打自招”，美国新总统及其政府意欲脚踏两只船，同时发展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

里根仍然看重与台湾的关系，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打算在新的中美关系与传统的美台关系之间实现一种平衡。美国学者称之为“双轨政策”，叫做既与新伙伴讲友谊，又对老朋友尽“义务”。

魔杖既举，趋之若鹜。

美国上层集团内部一批亲台分子瞅准时机，加紧活动，压里根政府加大力度执行《与台湾关系法》。一些人由此滑向怂恿“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泥坑。

以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为代表的一班亲台高官，反对美国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戈德华特、赫尔姆斯等亲台参议员则利用各种听证会、研讨会或秘密会议，对主张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的黑格等人进行攻击和刁

难，同时催促里根政府执行《与台湾关系法》、提升台湾的地位。

他们当中有人不满足于幕后周旋，很快跳到前台公然鼓吹将对台关系升级。

1981年5月12日，首席总统顾问米斯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宣称：

美国将全面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的条款，包括在政府机关接待台湾在美机构的官方来访者和向台湾出售武器。

既然美国政府将对台关系置于“非官方关系”的范围之内，为何又要在政府机构接待台湾的“官方来访者”？这种“非官方关系”岂不成了盖在官方关系上的一块黑抹布！

中国的国家主权岂容如此践踏！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这样的外交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主张与各主权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赞成并鼓励各国与台湾发展非官方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往来。中国对美关系也不例外，但是坚决反对美国在发展对台湾的非官方关系时损害乃至破坏中美关系。基于这一原则立场，中国对美国政府方面破坏中美关系的所谓“双轨政策”言论进行了严厉驳斥。中国官方新闻媒介新华社多次发表专题报道和评论指出，美国一些人图谋提升台湾地位的做法，实是“严重的倒退”，实质上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十亿中国人民坚决不能允许的”。

中国方面同时表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必将遭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的坚决反对。

美国方面似乎早有所料，准备好了托辞。

5月14日，国务院发言人费希尔诡辩说，米斯的讲话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同台湾代表的接触只能在《与台湾关系法》许可的范围内进行。

里根本人对米斯也是赏识有加。5月15日，白宫代理新闻秘书斯皮克斯声称，里根总统支持米斯关于美国将全面实施《与台湾关系法》的讲话，米斯讲话阐述了“标准的美国政策”。

黑格国务卿素来以主张发展对华友好合作关系而闻名，但在这时却成了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忠心卫士。他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采访记者是如此表白的：

我们将要履行按照《与台湾关系法》所承担的义务，这是个法律问题。

我们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关系的战略必要性与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联系这两者之间没有冲突。

没有哪个奴才不是看主子眼色行事的。主子骄纵，奴才们又怎么能不肆无忌惮？

美国国会内部与台湾岛内外台独或有台独倾向的组织、团体及个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少数成员，趁隙滋事，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鼓吹支持“台湾独立”。其中，参议员佩尔在参议院外委会关于美国对中国和台湾政策问题的一次听证会上说得尤其露骨：“台湾应成为一个由台湾人自治的自由国家。”

这虽然不是美国政府现行政策，但我希望最终会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如此倒行逆施，不仅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答应，而且也是违背美国已具雏型的“双轨政策”的，因而是不可能得逞的。

有道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美国朝野上下的某些人如此一致地鼓吹对台亲善，表明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中国方面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且要警惕美国人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兴风作浪，同时尽早制定对策，以绝后患。

“美国为什么总是有如此令人惊讶的事？”

窗户纸一旦捅破，该是当面锣、对面鼓地敲打之时。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迟迟不能实现正常化的症结所在。其中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则是焦点问题，是症结的核心。中美建交谈判曾经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上各执己见而停滞不前。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搁置了这一问题但保留进一步提出解决的权利。

里根政府运转不到半年，朝野上下围绕着对华政策问题的辩论再次把台湾问题摆到了桌面上。美中一番争吵后，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之坚定性，进而敦促里根总统进一步与中国人合作，谋求避免争端的新办法。

里根自己还需要了却一桩心病，让中国人消除对美国人的不信任，达成布什受命访华时未曾达成的愿望。这种不信任是由于他在竞选总统时屡次信口开河而造成的。

中国方面捕捉到了这一信息，随即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电美国国务卿黑格，邀请他访问中国。邓小平在邀请电中表示，随便谈谈是很好的，不一定要事先解决一切问题；中国是有一些问题，但没有必要使人难堪。虽寥寥数语，但却显示出一个中国领导人的诚挚和友善。

里根政府接受了中国方面的访问邀请，但指示黑格要尽最大努力取得中国人对其政策的信任。

1981年6月，中国尚处在春夏交替的过渡季节。

14—16日，肩负里根政府重大使命的美国国务卿黑格，踏着季春的落花流英，略带伤感和愁苦地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期间，黑格与黄华副总理兼外长进行了会谈。邓小平副主席、赵紫阳总理、耿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薄一波副总理等也分别会见了黑格。中国对来自里根政府的第一位贵宾给予了极为友好的礼遇和接待。

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黑格代表里根政府正式提出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建议。他说，美国正在实行一项全面抗衡苏联及其代理人的扩张主义的政策，美国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具有共同利益，因而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

黑格还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决心和诚意。他告诉中国领

领导人，美国打算以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为基础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同时维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他尤其强调，美国将中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不再对中国与苏联集团同等相待，并以此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础；为此，美国准备放宽对华贸易限制、进一步准予向中国出售具有军事性质的设备与技术。

理论是灰色的，但生活之树常青。中国人重言词，但更重守诺和行动。中国领导人对于黑格示好的这席话表示肯定和欢迎，但是也提醒他注意美国人过去一直是有承诺而少行动，开了很多空头支票。

邓小平当着黑格的面非常坦率地批评了里根政府的寡信薄义。

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访华时曾与中国商定向中方提供二十亿美元的进出口银行信用贷款，并表示放宽对华技术转让方面的限制。但是时逾两年，中国既未收到这笔贷款，也没有得到美方提供的任何技术项目和军事设备。美国拟向中国提供大型电脑系统的计划也根本没有兑现，使原定用该项设备进行统计工作的全国人口普查几乎中途搁浅。

黑格轻描淡写地又开了这些话题。他只是辩解说，美国修改法律或拨款都必须有国会的批准。

一位陪同领导人参加会谈的中国官员对此较为生气。他在会谈结束时将黑格拉到一边提及了这件事，并且一语双关地说：

“你们美国人如此擅长通过法律，也许应对（里根的）女儿旅行设一道法律。我相信你去与国会安排一下是不成问题的。”当时里根总统的女儿莫琳·里根正在台湾访问。

黑格碰了一鼻子灰，为了替里根政府护短而承受了一次婉转但却风趣的责难。在他自此往后的数次中国之行里，这是唯一的一次。

台湾问题与从前一样仍然是中美会谈的重头戏。几乎所有的中国领导人在与黑格会谈时都提到了这一问题。

黄华严正指出，由于美国继续对台湾出售武器，中美关系存在着破裂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外长还像话家常般地说道，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如同在南北战争时期（1861—1865年），美国人反对英国向美国南方运送军火一样。在此五个月之前，中国出版的英文时事杂志《北京周报》在批驳美国政府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时曾经打过类似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说：“如果有一个超级大国通过一项立法，规定夏威夷州应实施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以及它应与美国维持什么样的关系，美国人民对此事将如何反应？”中国人不计嫌隙，如此兄弟般推心置腹地对待美国人，这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方面采取如此高姿态为双边会谈营造诚挚友好气氛，颇令黑格为之折服。后来，当谈到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中的态度时，他仍然记忆犹新地承认说“他们不那么咄咄逼人”。

且不管政治立场如何，单就感情而言，将心比心，美国人理应念及道义而在对台政策上修正方向、改邪归正。

遗憾的是，美国人不为所动，仍然固守着他们的强盗逻辑。

黑格对中国领导人所说的还是美国人的老一套，即美国将维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并且遵守《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继续售予台湾防御性武器，但保持在目前每年七亿到八亿美元的价值水平上。这是他代表美方第一次提出美国售台武器的限度问题。临行前，白宫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为黑格访华确定的原则即是如此。如今，他虽然“将在外”，但却是“受君命”而不能不从。正因为如此，黑格内心深处却感到自己所说的这些话与中国人所创造的友好气氛格格不入。所以初次访华时间尽管不太长，他却觉得似度日如年，迫不及待地想尽快了完差事打道回府。

愈是不想惹事上身，愈有麻烦找上门。也许活该黑格领受难堪。

6月16日，黑格在北京的最后一天里与邓小平会谈。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不讲外交辞令，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他强调了中国方面对于台湾问题的关注，但他没有当着黑格的面斥责美国，只是非常恰当而又委婉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邓小平说，中国一直容忍，但也有个限度；如果美国做得太过火，中美关系可能会停滞，甚至倒退。会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黑格一直觉得“很高兴”。

相反，授命黑格的美国政府却不顾及他的面子和感受。就在当天与邓小平会谈之后不久，黑格听到来自美国国内的一则消息。里根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大谈对华关系问题。他在表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又说，他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感情，美国打算履行《与台湾关系法》，这一法律规定美国可以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此时，就连深谙里根思想和作风、掌握着美国外交政策底盘的黑格也说他“感到迷惑不解”。他承认，里根选择这一时刻说出这样不顾道义的话来是“不合时宜”的，它“增大了对中国人的刺激，驱散了我在北京会谈中造成的诚挚友好的气氛”，换句话说也就是使他此次中国之行几乎前功尽弃！

作为一位缔造和平友谊的使节，黑格在谈起这件事的原因时也不愿多加评论以免进一步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他只是说“总统感到我在执行他的指示时，在对华政策上已多少有点出轨了”。即便如此，里根的真正意图也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他将把《与台湾关系法》视为国内法加以执行，并将售台武器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任何人违背他的意志，他都不会给予好果子。作为外交决策人之二的国务卿黑格，也没有被当成例外。

中国人早已习惯里根的这套旧把戏，但由于涉及原则而不能不作出反应。按照外交礼节，黑格返美时，与其职务级别对等的中国外交部长应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但实际前往的只是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在停机坪上陪同候机时，这位中国官员郑重其事地问他：

美国的外交政策由谁制定？

为什么总是有如此令人惊讶的事情？

黑格后来说，这是一个他无法作出漂亮回答的问题。

幸好他有台阶下而未因此丢失面子。

那位中国官员问话时彬彬有礼，而且是将黑格单独喊到一旁提出这一疑问的。对于诸如此类美国人的事，黑格都犯糊涂，中国官员不理解更在情理之中。

入夏，天气一天比一天热。

美国人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也一天比一天大。

7月初，中国政府照会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通报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方针：

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将被迫作出强烈反应，这会上对国际战略形势和中美合作关系产生严重后果。

中国新闻媒体也连续发表报道和评论，谴责美国继续对台湾出售武器。

与此同时，中国由于对外开放而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一些人由于为美国的物质富裕冲昏头脑而日渐效法美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进而公开赞美美国式的所谓“民主”与“自由”，闹得神州大地一时乌烟瘴气。这引起了国内大批有识之士的重视。中国领导层内部不少人对此表示关注，并提醒人们保持警惕。也有人因此对改革开放、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提出异议。

中美两国关系遇到了建交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中美关系向何处去成了摆在两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如果美国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中国政府曾经警示美国人的预言就会变成现实：中美关系必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倒退！

美国人必须改弦更张，并马上拿出实际行动来！

第二节 台湾问题尘埃初落

美中建交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依照“一个中国”的大原则纳入到“非官方关系”的范围之内。但是美国对台武器销售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并在里根政府初期愈演愈烈，从而使这一问题急剧升温。

美国国务卿黑格 1981 年 6 月访华之后，面对中国重提解决办法、要求捍卫主权的强大压力，里根政府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与中国商讨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中美两国由此展开了建交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的重大较量。双方各执一词，但都有意化解矛盾，从而相互妥协，达成了初步解决台湾问题的协议，即世人共知的“8·17 公报”。

从这场大较量的缘起、推展和落定中，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在对华关系上罔顾道义、损人利己的一幅全景画。里根政府初期中美关系危机四伏、困难重重由此亦可一目了然。

美国人企图铸“锚”泊“舰”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将台湾视为对外战略中“不沉的航空母舰”，利用它作为美国在东方实行反苏反共战略的“前哨基地”。里根时期，美国政府继续奉行这一对外战略，并试图通过进一步对台湾出售武器增强这艘“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

台湾在卡特时期曾经提出，希望美国售予火力较强、进攻型的 F—16 战斗机。中美建交后，卡特政府为了表示对中国的诚意，拟定了一个新方案，决定只售台低性能的战斗机，要求这种战斗机比 F—16 火力较弱、航程较短，但未定型号，只是假设为 FX。当然，这一方案迟迟没有付诸实行。里根上台后，这一计划仍然久拖未决。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坚决反对，还有一个知之不多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和国会当中一些有识之士不予首肯。这些有识之士包括尼克松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卡特时期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里根时期的国务卿黑格和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索拉兹等人。如今他们或在国务院供职、或身为国会议员，在里根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享有议决权。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美国全球战略在东方的重点，其中有人甚至将中国称为“北约组织的太平洋之锚”。北约组织是西方主要国家于 1949 年成立的反苏军事同盟，美国在其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并将其作为本国全球战略的基础。美国上层人物称中国为“北约组织的太平洋之锚”，

显示他们在战略上已将中国看成是北约组织的一部分。

他们一致表示支持里根政府放宽对中国出售武器的限制，但一直不赞成扩大售台武器规模，尤其反对提高售台武器的性能。布热津斯基在 1981 年 3 月 16 日说过：“美中关系太重要了，不能冒破坏这种关系的危险。”6 月 18 日，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以索拉兹为首的 8 名议员联名致信里根总统，指出“向台湾出售 FX 或任何其它型号的先进战斗机将是一个错误”。

在他们的推动下，里根政府不得不作出相应的积极表示，借以表白它“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黑格访华期间，里根在华盛顿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到要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售予台湾武器时，也蜻蜓点水似地提及“中国可以得到美国的某些技术和防御性武器”。

只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美国上层主张“铸锚”、支持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有识之士，遇到了一贯主张让“母舰”永远停泊在西太平洋上、鼓吹进一步售台武器者的猛烈攻击。同时，随着里根政府准备对中国出售武器的消息传出国外，台湾当局也趁机大做文章，指责美国把中国当成了“友邦”甚至是没有签订盟约的“盟国”。在意识形态上反共以及害怕中国在军事强大起来的一些国家，对此也公开表示异议。

里根政府顺水推舟，很快就向中国出售武器一事予以公开澄清。

1981 年 6 月 20 日，黑格国务卿在参加东盟外长会议之后，向记者发表谈话称：

事实上，美国并没有作出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决定。

美国政府只是有一项内部决定，改变在出售武器和技术转让这两方面对中国的分类，即把中国归入像南斯拉夫——一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一类。

相反，美国售台武器的具体计划已在暗中定妥。中国方面通过有关渠道获悉到，美将向台湾出售 F—5G 喷气式战斗机。

但是，黑格在 7 月初向记者抛出了售台战斗机问题“未定”说。随后不久，他对采访他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说到，“可以设想”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数量有限，但是现在还没有举行详细谈判讨论这个问题。

只言片语已泄天机，美国“对中国出售武器”还只是镜花水月似的“设想”。美国政府将其炒得如此爆响，并三番五次地将它与售台武器问题扯在一起，肯定另有居心。随着美国政府的底牌一步步摊开，美国人的居心也就暴露无遗。

实际上，美国人早就私下确定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冻结目前售台武器的交货，寻求与中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美方最初的意图是，在谈判售台武器问题时，一并商讨对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为此，他们单方面拟定了对，中国出口武器的项目清单。

中国方面的立场一如既往。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 6 月 10 日发表声明，严辞警告美方：

我们宁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内政，售予台湾武

器。

如美竟然不顾我一再坚决反对，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我势必作出强烈反应。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人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8月25日，美方按原定计划通知中方，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将军访美，就美国对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进行具体商谈。

一星期后，中国外交部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作出答复，中国军方需要更多的时间研究拟定购买美国武器的清单。中国方面“以温和有礼的方式”拒绝了美国的邀请，表明了自己的坚定立场和巨大决心：

中国宁肯放弃购买自己迫切需要的现代化军备的机会，也不愿落入美国人精心设计的圈套，成为其“航空母舰”之锚。

中国人绵里藏针，似软有硬！

美国人碰上了真钉子，倍增担心。他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与中国进行高级会谈，以便为计划中的武器谈判铺好道路。中国方面很快接收到这一消息。

9月22日，美国国务卿黑格在联合国同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关系、赵紫阳总理与里根总统下月在墨西哥会晤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毫无例外地谈到了台湾问题，但分歧依然存在。

中国人进一步显示出推动台湾问题走向和平解决的诚意。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国庆前夕发表了关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声明，提出了关于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九点计划，同时表示希望美国在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方面同时向里根政府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外国没有必要也无权利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理应减少售台武器。

美国方面避不表态，但却借题发挥，宣称美国只关心中国与台湾的关系问题能以和平方式解决。

美国人总是“吊死在一棵树上”，了无新花样！

可以预料，中美高级会晤的道途中也将是荆棘丛生。

1981年10月，墨西哥的旅游胜地坎昆城，爽风习习，秋色沉沉，像是在迎接来自远方的贵宾。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南北对话最高级会议即将在这里隆重举行。

21日上午，中国总理赵紫阳和美国总统先期抵达，准备按原定计划在会议之前举行两国高级会晤。

由于国际会议和其他外交活动的安排一项接着一项，中美两国政府首脑顾不得旅途跋涉的劳累，带着浑身的仆仆风尘，利用共进午餐的时间进行了会晤。美国方面人多势众，来意婆娑。里根总统不仅有国务卿黑格作陪，而且还带着财政部长里甘、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以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艾伦。中国方面直奔外交会晤正题，陪同赵紫阳总理参加会晤的只有副总理兼外长黄华、副外长浦寿昌。两国会晤的范围涉及全球战略、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虽然敏感，但却仍然是双方讨论的焦点。

中方直截了当，义正辞严却又有理有节，美方意存敷衍而且礼数欠周，使得气氛很不和谐。

赵紫阳总理陈述了中国的一贯态度：

中国希望与美国保持长期战略关系，但台湾问题是一个障碍，并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表示严重关注。

但是，里根总统“王顾左右而言他”，吐出来的仍然是令他自己也觉得涩牙的一嘴陈词老调：

美国也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美国长期以来与台湾人民关系密切，美国不能抛弃老朋友，正如不会抛弃中国一样。

供应台湾防御性的武器是美国的义务，美国将继续信守对台湾的义务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里根的话无可辩驳地表明，到目前为止，在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内心深处，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与对台关系相提并论。尤其不可理喻的是，当“对中国出售武器”一直还属“设想”的时候，美国最高决策人竟然念念不忘“信守对台湾的义务”继续售予台湾武器。轻重分别之间，恰好暴露出美国人的险恶用心，即将“对中国出售武器”的兑现系于售台武器的继续之上。

“锚”本无，因美国人之性本善而将有，不期途中为恶所趁。于是就有了“锚”将成而被用作泊“舰”之虞。

在会谈中，赵紫阳还介绍了中国不久前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九点计划”。但里根面无表情，反应迟缓，最后避实就虚说：“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应在没有美国或其他外部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看似行正仗义，“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实则心虚欲避事，以免被人揪住尾巴。在谈到外部力量渗透台湾从而妨碍中国重新统一的问题时，里根似乎出自本能地妄言断非：“台湾人害怕的是共产主义。”

其间，贝克和艾伦频频打岔，催促里根说是“会谈应该结束了”。如此既超出常理、更有违外交礼仪的事，在国际交往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赵紫阳十分镇定地说完之后，又不失礼节地提醒对方，既然时间不够，余下的问题就由黄华外长与黑格国务卿进一步讨论。不卑不亢之中显示出中国人来自礼仪之邦的本色。

会晤无果而终，并非如同随后黑格国务卿在新闻发布会上所称的那样——“非常有成果”。作为里根政府的代言人，黑格这番话意在掩盖美方在会晤中有违礼仪之行的事实真相。当记者问到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时，黑格只好说，因为迄今“尚未作出决定”，里根总统没有谈及。

然而有一点必须承认，两国首脑会晤自中美建交以来还是第一次，它得以举行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中美关系已经有所突破。它显示出两国就双边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面对面对谈判的意愿和精神，为两国今后进一步谋

求谈判解决争议创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艰苦卓绝的讨价还价

按照两国首脑会晤临近结束时的约定，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与美国国务卿黑格在坎昆期间，开始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从而揭开了历时十个月之久的中美售台武器问题谈判的序幕。

首轮中美外长会谈是这次谈判中步履最为艰难、交锋最为激烈的一幕。

会谈一开始，黄华开门见山地指出：为了解决真正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美国必须确切订出它打算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期限，保证今后任何一年的武器销售不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并逐年减少直至停止售台武器。美方再一次知会了中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并没有作出积极反应。黑格使出“缓兵”之计，他建议等待后几日黄华访美时两人再在华盛顿具体磋商售台武器问题。此时的黑格国务卿已为美国政府内部外交决策权之争所累，如若夹缝中人，欲有所为而不能为，故不能拍板定案。在思想深处，黑格还意识到：凭着里根的政治信仰和观念，他和他的政府不会同意中方的条件，他预计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将要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在华盛顿会谈中交锋加剧，10月29日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美方态度蛮横，不仅拒绝中国提出的条件，而且奢谈所谓对台“责任”，并否认它是在干涉中国内政。

会谈开始时，黄华对在坎昆初会黑格时的观点作了重申和简单的补充，明确要求美国向中国保证，对台武器销售在今后的一个具体日期停止。黑格将此视为最后通牒，耳闻之后大为光火，一边气呼呼地用拳头擂着桌子，一边吊着嗓门回答说：

我们从未坚持要有权向台湾无限期出售武器，但只要（中国）重新统一尚未实现，我们就有义务、有必要这么做。

在这种敏感的关系上加上这种新的负担将会引起严重的问题。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必须履行的责任！我们也有一个限度，不能逼迫我们超越这个限度。

认为我们在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如此强辞夺理的讲话出自黑格之口还是第一次，因此着实让黄华大吃一惊。作为美国国务卿，黑格道出了美国以里根为首的当权派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结中美关系制造麻烦的本质原因。

几番唇枪舌战之后，双方都觉得应该有所让步了。

中美关系正常化来之不易，而且两国又无根本利害冲突。双方尽管在售台武器等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但都想避免关系破裂。

美方认识到，美国售台武器和军事装备在数量上不可能超过中美建交初期的水平（每年十亿美元）。有鉴于此，黑格国务卿就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作出让步，同意中国的立场。所以，在他看来，中美会谈取得一定的进展甚至达成解决方案是有可能的。

中国首先表现出了高姿态。黄华建议两国就售台武器问题进行高级别的外交谈判。

1981年12月，中美在北京进入正式外交谈判。中方谈判代表是副外长章文晋。

为了以最小的让步换取最大的果实，美方在谈判代表的人选上费尽心机，最后在北京“就地取材”，让驻华大使恒安石披挂上阵。

恒安石1920年生于中国山西，7岁时随身为传教士的父亲回国，大学时攻读中文并获硕士学位，后成为职业外交家。他于60年代末出任美驻台湾“使团”副团长，担任过美国驻多国外交使节，1981年起任里根政府驻华大使。他“极为能干、学识渊博”，尤其擅长外交谈判，而且作为一位在华夏大地上生活多年且又与中国人交往弥久的“中国通”，他对中国的国情、政情和人情有较深刻的了解。里根政府派他参加谈判，显然有意利用他的专长，以图在与中国人的谈判中捞到好处。

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周之后，当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里根政府非正式地通知国会说，它打算向台湾出售军用零件。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先后在北京和华盛顿对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严厉谴责美国这种自欺欺人的两面派做法。美方谈判代表辩解称，黄华10月29日声明是单方面的“最后通牒”，美国并没有接受。

看来，美国的用意是为了制造声势，给谈判增加筹码，以压中国让步。局势还存在可以挽回的希望。

转眼间已是1982年。在中国，公历新年刚过不到一个月，春节接踵跟进，春回大地的气息且可处处闻见。

春光苦短，去不复返！万千气象似乎都在催人奋发努力，创造和平、友爱和安宁；又像是在向世人兆示中美关系不久将会迎来重大突破。

中美关于售台武器谈判恢复进行。

1月10日，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访问中国，在北京与中国副外长章文晋举行会谈。

就在当天，美国人故态复萌，再次耍出两面派手腕。美国国务院通知台湾当局，美国准备向台出售F—5E战斗机。第二天，美国单方面宣布了这一决定，但表示“不向台湾出售先进的F—16、F—5G战斗机”。

里根政府尽管劣性不改，但却慑于公理和大势而没有走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适逢1972年2月27日中美《上海公报》签署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美国借此机会大造和平友好之象，向中国频频伸出橄榄枝。美方致函中国，建议两国以赵紫阳访美纪念这一重大日子。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在北京也特意对中国强调说，这个日子具有重大意义。他同时通知中国，美国政府已作出重要决定，对中国提供所需大部分军事装备和武器、放宽经济援助和农产

品援助、放松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以及简化对华贷款手续等等，并尽快将这些决定提交国会审议通过以便付诸实施。

霍尔德里奇在与中国副外长章文晋会谈时照着葫芦画瓢通知说，美国已决定向中国出售性能较低的 F—5E 飞机；并且表示，美国对在《上海公报》签署十周年的日子里确定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原则一事寄予希望。

霍氏在会谈中甚至提出要中国将减少售台武器问题同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联系起来，但他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不愿承诺美国要限期停止售台武器。

中国方面自坎昆会谈以来一直坚持合乎公道的原则：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无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所达到的水平，并保证逐步减少直到完全停止售台武器。但是，中国认识到，美国愿意谈判售台武器限度问题这一基本立场可能暗示着一种认错，即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为促使这一积极变化得以落实，中国作出了重大让步，即在承认售台武器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同意美国在一定时期后最终停止售台武器。但是中国不同意改变三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根本立场：不向美国或任何外国承诺永远不以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回归祖国、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或手段进行，都是中国人的事，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任何外国政府和个人均无权干涉。

谈判仍在僵持着。谈判达成协议的阻力显然来自美国方面。

2月27日，《上海公报》签署十周年的日子终于到来。中美两国并未能像世人预想的那样举行访问之类的庆祝活动，双方度过了建交以来最为平淡的一个重大日子。里根总统和赵紫阳总理尽管互致信函以示祝愿，但都一致承认，要发展双边关系，必须努力克服分歧、排除障碍。中美之间磕磕碰碰，争吵不断升级。如此恶性循环，谈判注定休矣！冬去春来，两国关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人历经严冬变得更加意志坚强。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3月1日，中国新华社评论员发表题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美关系“是向好的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文章严正表示：事情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中国方面被逼到了墙角，如果美方坚持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关系就会倒退。中国的立场仍然是争取好的可能，但也不得不准备坏的。不久，北京出版的中文时事周刊《了望》发表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关于中美关系的谈话。邓小平说中国已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作好了降低外交关系的准备。我们没有回旋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自中美建交以来第一次向美国人敲警钟。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倒行逆施，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将会走向破裂。美国人“恶梦醒来是早晨”。美国政府终告悬崖勒马，作出了积极回应。

4月5日，应美方之约，中国驻美大使紫泽民分别会见美国务卿黑格和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双方就售台武器问题进一步会谈。美方透露了保证

不向台提供数量、质量超过现有武器的军事装备。黑格强调，美重视中美战略关系，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其间，黑格转交了里根总统给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信件。里根总统向中国建议派副总统布什5月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就售台武器问题举行高级会谈。

4月7日，美方向我就其准备售台武器零部件进行通报时表示：在中美谈判期间，美国“将不考虑对台进行军品转移”，也不打算就售台武器问题作出任何新的决定。

中国方面对美售台武器零部件提出了抗议，并警告不要让此类事情再次发生，但是接受了美方的高级访谈建议。派遣这样一位高级使者上门会晤，这说明美国在解决售台武器问题上的态度有了新的转变。

台湾当局惟恐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断从中作梗并抱怨美方派布什访华是“一头热”。

里根政府自有打算。蚍蜉撼树谈何容易！

4月24日，布什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美关系时，坦言承认：

美国非常认真地看待美中关系可能降格问题，但相信不会降格；美已下定决心，要加强同中国的关系，美无意向台湾提供先进飞机，也无意推行或者追求“两个中国”的政策。

5月5—9日，布什偕夫人正式访问中国。

中国热情接待了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贵宾。

万里、黄华、赵紫阳、邓小平分别与布什进行了会谈。

邓小平对于布什这次访华在推动美国政府扭转谈判立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寄予明确的希望。他在与布什会谈时坦诚相见：

你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我们衷心欢迎你。

我们希望通过你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一些云雾一扫而光。

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称美国人为“朋友”。

他还提到：“我的儿子正在美国上学，这说明我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是有信心的。”

邓小平最后说：

现在该是解决这一问题（售台武器问题——作者注）的时候了，不应再耽搁了。

假如美国不能为此出力，那么出路何在呢？

美国方面再次领受到中国人对于解决售台武器问题的诚意和决心。

布什回国后，美国上层内部的保守派反对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作任何可能进一步妥协的声音此伏彼起。里根政府因此犹豫不决，迟迟未能向中国交出底牌。

美国国务院一直在为里根总统准备一份有关停止售台武器期限的声明。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使问题有所突破，美国人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

三心二意了。

里根对黑格说“亲爱的艾尔，
我深感遗憾地接受你的辞呈。”

人世之道，光明长存，但也难免短暂的黑暗。前进路上，或正不压邪，出现逆转；或牺牲个人保全整体，留下创伤。1982年6月的美国，天地依旧，岁月悠悠，人像物景一如既往。

美国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向行将完成，中美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成功在即。

忽有意外传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决策班子发生重大变故。

6月25日，黑格国务卿辞职获准、被撵出门。

黑格身为里根总统对外决策的第一臂膀，在美中关系的发展上也作出过重大贡献。他为什么会走出国务院？美国国民不明就里，华夏子孙亦深感痛惜。

小亚历山大·黑格（简称艾尔）原为美国驻欧洲武装部队司令兼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获陆军上将军衔。尼克松政府时期开始涉足外交领域，曾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军事顾问、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1972年曾作为尼克松访华先遣组负责人前往中国做准备工作。里根当选总统后，他被任命为国务卿，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帕西、国防部长温伯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艾伦一起组成新政府的外交决策班子。

里根上任初深为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缠身，加上他自己在外交事务上又是外行，便有心让黑格在对外政策上起核心作用，授权他充当“唯一的发言人”，而仅让文伦起协调整个班子的作用。里根希望借此安排使美国外交决策程序化，确保自己作为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领导权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效果。

但是，里根的外交决策班子从一开始就无法齐心协力地进行合作。究其原因，不光是由于黑格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艾伦、副总统布什等人常因对外事务管理权限上的交叉或越界而发生摩擦。

黑格自己解释说，他的不少白宫同僚在千方百计地抢占他的地盘，“对我在对外事务上的权威发起猛攻，并竭力破坏总统对我的信任”。他还说，总统也曾试图“一笔勾销我的作用”。里根的话从反面印证了黑格所提到的争权问题。里根说，上任仅几个月，“我就发现黑格只想让他自己支配外交政策，在他任国务卿时不让其他任何人包括我插手。”

与此同时，黑格和他领导下的国务院与里根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共同点日益减少，分歧加大。当事双方都承认，在许多对华政策问题尤其是如何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作为一贯赞成发展美中战略关系的有识之士，黑格在对华政策上的主张

积极而又具有前瞻性。正如他在卸职后撰写的回忆录《谨思慎行：现实主义、里根和外交政策》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就美国与西方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战略利益而言，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一大机会。……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正在谨慎地试图沟通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美国也必须谨慎地与他们一道努力。这就是我们的信念，作为国务卿我曾敦促应以此作为美国的政策。”

紧接着，黑格披露了他与里根等人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

我受到了政府内其他人的顽固反对，他们不能使自己相信，……国家利益至少如同意识形态一样，是国家行为的可靠指南，和像中国这样国家的领导人协商有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总统本人和他最亲信的助手们一样，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在我担任国务卿的十八个月内，中国问题比其它任何事情都更令我相信，里振的世界观与我是迥然不同，我不能同时为他和我的信念卖力。

或许黑格的一面之词有些水份，但也不能抹去事实，即黑格国务卿与里根总统和他的顾问们的确在对华关系上有着显著的意见分歧。

里根一度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并与其他许多反共分子一样难以接受美国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这一事实。据黑格说，里根对于这一问题“在感情上陷得很深，甚至在荣誉感上也是这样”，“任何背弃台湾或让台湾受辱的建议都会深深地触犯他的忠诚意识，即老朋友和长期盟邦是要彼此报恩的。”

里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华府政客少有的诚实和率直。他公开承认自己与黑格在许多对外事务上“意见不合”，并特别举出两人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一例。

里根是这样述说此事的：

在台湾问题上，他和我也意见不合。我认为台湾是一个忠实、民主而且长久的盟友，我们应对台湾给予绝对的支持。

鉴于这样的原因，黑格早在1981年就多次表示要辞职不干，但都被里根劝服。当时里根总统在外交决策上少不了要借助黑格为参谋。然而，双方越是合作，分歧便越加不可弥合。

1982年6月14日，黑格来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面见里根总统。他告诉里根：

“我实在不能再干下去了！”

其时，接替艾伦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原副国务卿克拉克，一再越过黑格或上向里根总统汇报情况，下对国务院传达指令。里根总统为诸如此类怪异之事而弄得令难行禁不止，以致常常“情绪忧郁”、满面“愁容”。最后，领受责难的多是身为国务卿的黑格。转任不多久的一天，克拉克阴阳怪气地对黑格说：“艾尔，你在本届政府中打赢了许多仗，但你最好能明白：

从今以后，总统将主管外交政策。”似若幸灾乐祸之中透露出里根的意向。

因此，黑格又一次非正式地提出了口头辞呈。

里根“见多不怪”，加上本人也认识到与黑格的分歧弥合无望，因而，对黑格的辞职的确早有心理准备。

克拉克等人历来善于在主子面前察颜观色，而后有所行动。自从黑格这次提出口头辞呈后，他们也一改往日作为黑格副手时的友好态度，冷漠地不予合作。

6月24日，里根约见黑格。黑格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辞职的事。他同时还向里根面交了一份关于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班子中的问题的详细报告。这是作为里根总统的左右手之一而对他所尽的最后一份力。

里根当时举棋未定，没有对黑格辞职的事作出任何回答。

第二天午饭后，黑格又被请进里根总统的办公室。他进去时，里根正站在办公桌前。

“艾尔，关于我们昨天谈到的那个问题，我已经作出决定。”里根一边说着一边递过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

黑格打开信封，抽出仅有一页打了字的稿纸，其中第一行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艾尔，我深感遗憾地接受你的辞呈。”

里根总统批准了黑格国务卿尚未形成书面函件的辞呈！

黑格惊讶不已。他虽多次提出辞职、也确实想不再干下去，但也仍然有心继续当他的国务卿。他提出口头辞呈的潜意识中，更多的是想以此不同寻常的方式提醒里根关注存在的问题，并采纳他的改进建议。

由于一直对里根抱有希望，黑格始终没有提出正式的书面辞呈。

“美国长期标榜‘讲法律’，政府要员辞职本来有一套繁琐的呈报、审议、批复程序。为何到了自己头上会如此简单？”他理所当然地想不通。得知白头辞呈竟然获准后，他非常恼火地对里根说道：“我将不得不以尽可能减少伤害的方式公开澄清此事。”

他当即回到国务院起草致总统的辞职信，准备随后予以公布。里根却先他一步在白宮的新闻发布室里宣布了这件事。

事后，里根却“郎中吭过病人”！

他在自传体回忆录《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写道：

黑格和国务院的其他人是如此急于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至他们迫使我从支持台湾的保证上逐渐后退。

佛门有句解语叫做“境由心照”。按此道理来说，里根随着时过境迁本该淡忘了那些往事，想不到他对黑格却是如此长久地耿耿于怀！

反而推之，里根对于黑格推进中美关系的思想和行动，必然也就有过极大的限制和阻挠。由此不难理解，黑格初次访华时，为什么里根有意不给他留面子。

即使如此，里根想让中美关系走回头路也只是心余力继，且无“贼胆”！

历史尘埃飘忽有定

黑格辞职后，乔治·舒尔茨继任美国国务卿，同时也就接掌了主持对华事务和美中售台武器问题谈判的权柄。

舒尔茨向以从事谨慎著称，担任国务卿以后尤其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话，必需表态时则往往保持低调。

在对华关系上，由于君命难违，舒尔茨不可能有任何特别示好的举动，但他还是忍不住说到“美国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是很重要的事”。

中美售台武器问题谈判达成协议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7月13日，邓小平副主席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恒安石面转了里根给邓小平的一封信，并递交了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声明，即协议草案。美方正式表示，它并不谋求一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长期政策。这表明，一俟有可能，美国将会最终停止售台武器。

中美双方的立场已经靠近。

邓小平对美方积极配合、致力于解决分歧的态度予以赞许。

飞桥既架，天堑变通途。中美双方相互退让，漫长而艰难的售台武器谈判终于告一段落，有了结果。

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就分步骤直到最后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即著名的“8·17公报”。

至此，历史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宣告初步解决。

8月17日中美签署的联合公报是以美国的声明草案为蓝本的。中方作出了最大让步，美方也在原来的立场上有所后退。

中方认为，根据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所确定的两国关系原则，美国售台武器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由于考虑到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分步骤予以解决”的建议。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

在作此声明同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美方还表示“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继续坚持美中建交公报原则，同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

中美两国在长远考虑的基础上相互妥协，达成了协议，从而使两国之间的重要关系得以维持。正如一位中国外交官所说，“台湾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中美——作者注）战略合作也很重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美关系雨过天晴，走出濒临破裂的危机，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从此相安无事。今后，中美关系能否健康正常地发展，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报所有原则和精神是否能得以切实遵循。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方面对“8·17公报”另有一番说辞。“8·17公报”发表当天，里根总统就此发表了一份别有用心的声明。

里根在声明中不仅把“8·17公报”同《与台湾关系法》相提并论，而且继续无理地把美方逐步停止售台武器问题与中国坚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牵连在一起。

里根在这份声明中还谈到，“8·17公报”将有可能在其“对台湾人民承担义务”的情况下，促进同中国的战略关系。

显然，里根仍在做着他的“两个中国”梦。

中国方面翌日发表声明，针对里根的“梦人呓语”作了客观公正的澄清：

“8·17公报”是以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依据的，与美国单方面制订的《与台湾关系法》毫无关系。《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背了两国建交公报的原则，是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的。任何试图把本公报同《与台湾关系法》相联系的解释，都是违背本公报的精神和实质的，都是不可接受的。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对售台武器的“最后解决”之义作了补充说明，指出其含义为“美国售台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必须完全停止”。

如此反反复复，中美之间由于美国对“8·17公报”妄加曲解而起的争议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停止过。

与此相应的是，美国对台销售武器的实际数额在以后的年份里虽然起伏不大，但比卡特时期有所上升；同时，美方还在不时地制造借口，向台湾提供了一些较为先进的军事设备和制造技术。中国方面对此提出了抗议，并进行过严正交涉。

鉴往知来。只要最后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期限原则没有确定，美国方面售台武器就不会终止，中美两国围绕这一问题的斗争也将持续一段较长的日子。

第三节 八年诉讼隔世案

一桩 70 年前的“湖广铁路债券”案，本因时过境迁而化作历史烟云。谁也没有料到它竟会在 80 年代初重又闹得沸沸扬扬。美国人旧案重诉，欲与中方算旧帐。中国人据理力争终未背上冤枉债。

为了这桩隔世案，美方将中国作为被告打了近八年的官司。恩恩怨怨，几乎贯穿里根时期始终，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初，一直持续到 80 年代后期。诉讼的起始、延程和终结，恰似对里根时期中美关系由危机走向稳定的真实写照。

美国大发中国国难财

本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速了瓜分中国的行动。为了抢占地盘，各国列强将主要目标放在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如采矿和筑路上，其中首先是筑路。因此，各国都迫不及待地与清政府签订合同，以提供贷款帮助修建铁路为条件，攫取特权。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湖广地区（今湖南、湖北）是帝国主义争夺的一个重要场所。

美国在列强角斗场上晚来一步，但它“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甘屈居人下。1909 年 6 月，清政府和英、法、德三国垄断资本组成的银行草签《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美国强烈要求参加，以便向长江流域扩充势力。它在国内网罗了摩根公司、花旗银行和“铁路大王”哈里曼等垄断巨头组成一个大财团，与英、法、德资本家合组“四国银行团”，企图通过垄断对清政府的贷款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1910 年 5 月，四国银行团在巴黎议定，湖广铁路借款由四国平均负担。

时值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到处是反抗的怒吼声，游行、示威乃至起义此伏彼起。

清政府与列强密谋策划“借款筑路”的消息传出后，各地接连爆发“保路”风潮。《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签订前后，湖南、湖北两省绅商民联合行动，掀起了有组织的“拒债”、“集股”运动，要求将筑路权交给国人、交由商办。

湖北绅商学联合会组成的湖北铁路协会还公举代表上京城，与清政府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展开说理斗争，并绝食七天七夜。湖北各界人士为之鼓舞，进一步加强了斗争。

清政府偷梁换柱，玩弄了欺骗阴谋。

在湖北、湖南保路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在明里作出让步，先后允许湖南、湖北境内的铁路商办，但暗中不仅没有废除与各国签订借款合同的协议，反而加快了正式签约、出卖路权的步伐。1911 年 5 月，清王朝“皇

族内阁”悍然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一面任命端方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派他南下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和四川的商办铁路公司，一面逆潮流而动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全称《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它规定：

借款总额为 600 万英镑，九五折付款，年息 5 厘，40 年还清；

以铁路收入和湖南湖北的厘金、盐税、赈崇捐作抵押；

四国银行团享有上述两段铁路的修筑权，如铁路延长，四国银行团有继续修筑的优先权。

不久，清政府以发行“湖广铁路债券”的形式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兑取了 150 万英镑的贷款。

民心不可违！民怨一发而不可收！

“当时一般舆论都认为，外国人掌握着我们的铁路和矿山，就和掌握着我们的生命一样。”因此，清政府一意孤行出卖路权，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于是，湖南、湖北的保路运动进一步发展，并很快蔓延到广东、四川等地，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1911 年 10 月 10 日，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从而揭开辛亥革命的序幕，敲响了腐朽的清王朝的丧钟。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乘着革命胜利的东风，于 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中国改用公历纪年，以当年为民国元年。3 月 11 日，因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1912 年 3 月 1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务部在北京照会各国政府：

所有满清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均由民国政府担任实行上之效力。

根据照会精神，中华民国继承了 1911 年《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所规定的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四国银行团的债务，并继续按《合同》规定逐年予以偿付。

1931 年 7 月 7 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加上国内军阀争权，割据混战，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危机中。因此，偿还美国等国借款的工作到了 30 年代中期即告停止。

实际上，届至此时，清政府亏欠的湖广铁路借款，绝大部分已连本带息偿付给了美、英、法、德四国。保存在美国人手中尚未清偿的债券，仅占湖广铁路债券总额的 5%。

1949 年，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但却从未承认这笔不义之债。

数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几经沧海桑田。美国资本家虽然有心一子不剩地全部索回当年放出的那笔不义之债，但却无从下手。然而，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会就此罢休。

于是，他们将贪婪的目光转向国内，干起了借风使船的交易。因此，尘

封泛黄的债券又被兜售出去，到 70 年代末时，已经分散到 280 多个美国人的手中。帐虽昨日帐，人却今日人。

美国人仍抱着老皇历，愣是将它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头上。

美国地方法院时中国政府的“缺席判决”

1979 年 11 月，距离美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为时仅十个月，人们似乎还沉浸在中美建交这一历史性突破所带来的惊喜和欣慰之中。

美国东南部滨临墨西哥海湾的亚拉巴马州，依然秋风金色，人们感觉不到入冬的气息。

进入中旬，冷风阵阵袭来，气温陡降。冬季飘然而至。

就在这个时候，中美友好关系新生的热面孔第一次遭遇到风寒的袭击。这似乎是天意。

当时；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地区的拉塞尔·杰克逊和另外八位居民联名向州联邦法院上诉，控告中国政府没有偿还中国清朝政府于 1911 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

这九位上诉人称，他们当中没有人是在 68 年前这种债券开始发行时购买到债券的，而是在后来通过美国银行（其中包括纽约的两家银行）买到或换到债券的。

显然，美国政府无论是在这种债券的开始发行，还是后来出售或转让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上诉人并没有指控美国政府或任何一家银行。

代表这九位美国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是律师乔治·斯蒂芬斯。

斯蒂芬斯律师在代表这九位债券持有人提出上诉时，向法院递交了一份很长的诉讼书。

那么，为何美国的这些债券持有人选择这个时间打官司、而且是控告中国政府呢？

斯蒂芬斯律师解释说：

“今年华盛顿与北京互派大使，因而促使我们提出这一诉讼。”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三十年的敌对状况，开辟了两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广阔前景。这本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好事，不期也为庸人所乘，用以打起讨要不义之债的官司来。

“这条铁路（即湖广铁路，今京广铁路武汉至广州段——作者注）现在还在使用，因此，应当向持有这些债券的人还债。”斯蒂芬斯说明了他的当事人要求中国政府还债的理由，“这些债券是无记名债券，任何持有这些债券的人都有权要求偿还。”

诉讼书中有内容表明，这些债券持有人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拥有了债券，他们状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蓄谋已久的。诉讼书中写

道：

“（这些债券）原定到 1951 年 6 月付清本息，但是那时候在大陆中国执政的是美国不承认的新政府。”

“得到美国政府承认的政府的权力和管辖权达不到大陆中国。”这指的是台湾的国民党当局。

按照美国的法律，上述九位美国公民的诉讼是不能成立的。美国 1976 年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在发生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诉讼时，外国享有主权豁免权。

但是美国政府采取暧昧态度，不表明立场。美国国务院声称“自己管不了法院”，以美国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各自独立为借口，表示“不介入纠纷”，从而未能制止这场不应该进行的诉讼案。

1982 年 9 月，设在州府伯明翰的亚拉巴马州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中国政府拒绝出庭陈述，它认为自己对美国司法程序有豁免权。

法官克莱蒙仅听闻一面之词乃不辨是非曲直，但是迫于压力，最后对中国作了“缺席判决”，判决中国政府偿还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的 4130 万美元债务。

美国方面甚至扬言，如果中国不支付这笔款项，原告将要求法院扣押中国政府在美国的财产。问题的严重性显然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力，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

中国方面从全局出发，本着长远的观点，对美方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

当时，“8·17 公报”刚刚签订，中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尘埃初落，两国关系自实现正常化以来第一次显示出稳步发展的希望，双方正积极筹划高级领导人互访和更加广泛的双边合作。因此，中国不愿采取过激的行动，以避免中美关系再次出现倒退的危险。

1983 年 2 月 2—6 日，农历腊月 20—24 日，正值中国的年关之际。中国人双喜临门。北京在喜庆的节日气氛中迎来了里根政府的第二号要员。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应邀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直到此时才就“湖广铁路债券案”对美国提出抗议。为了顾全美国人的形象，中国没有向外公开对美国的抗议，而是由外交部长吴学谦当面向舒尔茨递交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备忘录。数日后始将这份备忘录予以全文播发。

中国外交部在备忘录中明确表示了中国的坚定立场：

根据国际法，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享有主权豁免，不受任何外国法院的管辖。

湖广铁路债券是旧中国反动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维持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斗争而举借的外债，根据“恶债不予偿还”这一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概不承担偿还的义务。

这份备忘录严正指出，亚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国的“缺席判决”，是“将美国国内法强加于中国，损害中国主权、损害中国民族尊严的行为”。

因此，它强烈要求美国国务院从即刻起“采取紧急步骤，制止事态发展，妥善处理此案，不使它给中美关系以及两国之间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造成损害”，从而避免使一件本来很小的、麻烦的诉讼升级为政治对抗。

中国还表示，如果美国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中国将“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然而，美国对中国方面的要求置若罔闻，根本没有采取措施以挽回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甚至对中国的态度表示不屑一顾，称之为“小题大作”。

国务卿舒尔茨访华期间，在接受吴学谦外长递交抗议备忘录时也未作明确评论，只是不痛不痒“有礼貌地对吴学谦外长说，要找一位律师”。

一位美国律师对此持赞同看法，他表示：“中国人本来可以请一位律师，避免问题闹成这个样子，他们现在还可以请一位律师，使关于这个问题的判决无效。”

既然这一诉讼不能成立，中国对此诉讼又不承认，哪里还需要什么法律代表呢？！

这种不识时务的话只是表明，他们无意自负其责，终止一场不该发生的诉讼，反过来却又寄希望于中国“忍气吞声”屈从于美国的法律程序，以避免争端。

此等行径，无异于滑头耍赖！

与此同时，美国人还摇唇鼓舌，公开为自己的立场及其地方法院的无理判决进行辩护。

1983年2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债券问题发表专项声明称：

根据国际法，外国并不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人们可以因其商务方面的行为对其提出诉讼。

根据我国法律，在具体诉讼案中，是否可以为豁免权进行辩护要由法院裁定。

美国方面自上而下无一不都是在逃避对这件事的责任。

国际舆论对美国地方法院无理判决中国一事均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其中，香港地方的《星岛日报》发表题为《美国向中共索要七十年旧债》的社论，明确指出，美国亚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判中国偿还七十年前满清政府为修筑湖广铁路发行债券的债务，是“越权”判决，因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为此，该社论提出如下理由：

第一，照国际公法，一个独立国家不受他国法院的管辖，除非它表示同意。中共于其备忘录中，已表示不受上述控方法院的管辖，则其判决已无法律之根据。

第二，民事债务应受“消灭时效”之限制，因为法院须减少久悬的诉讼案件，例如酒店的帐过了二年，不能追索：

一个很小的诉讼案件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影响如此之大，也是美国方面始料未及的。

且看美国政府如何收拾局面！

舒尔茨说，邓小平“担心这一判决严重影响双边关系”

美国人公开逃避责任，说明他们意识到美国地方法院对债券案的判决已产生严重后果。

这一细微的变化最早开始于 1983 年 2 月，国务卿舒尔茨访华期间。

在访问中，舒尔茨与中国外长吴学谦就台湾问题、科技转让、经济贸易及文化和人员交流等问题举行了 3 轮会谈。此外，总理赵紫阳、国防部长张爱萍、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先后会见了舒尔茨。

在此期间，舒尔茨接受了中国方面递交的对于美判决湖广铁路债券案抗议备忘录，“听取了 中国官员对这个诉讼发出的愤怒的抱怨”。就在当时，舒尔茨向中国提出了请律师出庭辩护的建议。

不久，中国方面为了平息争端采纳了这项建议，并在华盛顿聘请了一位美国律师，“他以技术方面的理由赢得了对原判的上诉权”。

在美国，舒尔茨访华归来后采取了与中国合作的态度。他在争取到里根政府的支持后，亲自干预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审理。

1983 年 8 月 18 日，在生意人看来，这肯定是一个吉利的好日子。对中国人来说，它也是值得高兴的日子。这一天，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向亚拉巴马州联邦法院提出了一份意见书，要求法官驳回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判决，让中国有机会对该案“进行辩护”。

在这份意见书中，舒尔茨提到在他访华期间遇到的一件事：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本人向我转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审理这个案子过程中进行缺席判决感到严重关切，他担心，这一判决已经严重影响并将继续影响双边关系。

舒尔茨最后写道，重新审理这个案件，以便中国出庭辩护“显然符合美国的对外政策利益”。他想做一个不损害中美关系的人，然而更多考虑的还是美国自身的利益。

由于大人物一一出面干预，诉讼事件发生了有助！于解决问题的转变。

1984 年，亚拉巴马州联邦法院法官克莱蒙取消了他本人在 1982 年 9 月对诉讼案的判决。

9 月 15 日，克莱蒙法官在法院举行了专门听证会，质询美国地方初审法院法官对外国政府是否有裁决权的问题。最后，克莱蒙得到的是“ No！”的否定答案。

10 月 26 日，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值得记取的日子。

这一天，亚拉巴马州联邦法院驳回了原告就湖广铁路债券问题对中国提

出的诉讼。

在先后审周了作为证词的国务卿舒尔茨附加司法部意见的意见书，听取了中方律师的辩护词的基础上，亚拉巴马州联邦法院终于作出了明智的抉择。

随后，原告之一的拉塞尔·杰克逊又找到该法院法官克莱蒙，要求他重新审理这项诉讼。

“我对这个案子没有裁决权。”克莱蒙如实拒绝了杰克逊，同时也没有忘记向他作出耐心解释，以此安慰这位直愣愣往前冲、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同胞。

拉塞尔·杰克逊很生气。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杰克逊是一位工程师，一位普通的技术人员，不太关心国事和世界上的事情，因而听不懂也不愿听法官对他说的道理。因此，他改变了对法官的信任，“我想他是被这个案子吓住了。我们将提出上诉，我相信会重新审理这个案子。我有点怀疑这位法官。我想他是希望由别人来作出判决。”

法官被误解了，但他是个知大事识大体的人，他没有与杰克逊斤斤计较。

拉塞尔·杰克逊钻在债券中不谙外界事。

经他动员鼓劲，另外的几位原告也同意将案子继续上诉。

于是，湖广铁路债券案又被上诉到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即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经过多次合议、复核，于 1986 年 7 月 25 日作出裁决：美国债权人无权迫使中国政府偿还 1911 年由满清政府在美国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

与此同时，联邦上诉法院宣布撤消该项诉讼。

拉塞尔·杰克逊等人仍然不服裁决，遂将案件再次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要求复审，从而将诉讼案推入高潮。

1987 年 3 月 9 日，历史性的时刻终于来临。

美国最高法院当天作出裁定，驳回美国的湖广铁路债券持有人提出的复审要求，维持联邦上诉法院 1986 年 7 月 25 日的判决。

至此，经历八年诉讼的隔世案件——湖广铁路债券案有了最终结果。

中国外交部继 1984 年 10 月 26 日之后又一次表示欢迎，同时重申了中国政府对于此案的一贯立场，并且表示相信中美关系会进一步向前发展。

美国方面悬崖勒马，与中国合作，终于使中美关系避免了一次可能由小麻烦升级而来的政治对抗。

第四节 纺织品贸易争端迭起

中美建交尤其是加强战略合作以后,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日趋发展,并一跃而为两国关系的主流。但是,双方在发展经贸关系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发生过无数次利益纠纷。中国在对美出口中既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地区)强烈的市场竞争,也受到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

随着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两国经贸关系中的这一矛盾愈加突出。这在纺织品贸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纺织品及服装是中国的传统产品,在对外出口中占有较大的优势,但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一直遇到阻挠。美国人借口保护国内工业、维持国内市场秩序,对中国纺织品实行进口配额或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限制进口,像他们自己承认的那样,对中国“采取不那么友好的姿态”。因此,两国在纺织品贸易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成为里根时期中美关系另一侧面的缩影。

北京—华盛顿回合

为了解决纺织品贸易中的矛盾,中美双方先后在北京、华盛顿进行了十数轮的艰难谈判。尽管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日增,谈判代表百般设限,谈判终都取得了成功,从而签订了两个纺织品贸易协定,确定了中国纺织品出口美国的大方向和基本原则。

美国从一开始就一再提出各种不公正的苛刻条件,因此谈判屡屡无果而终。仅第一个新的纺织品贸易协议先后就经历了七个回合的谈判。

中美建交初期签署的纺织品贸易协议原定于1982年12月底期满,双方自1982年8月开始谈判签订新的协议。第一轮谈判于1982年8月13—16日在北京举行。

由于美国一直想限制中国纺织品的进口,中国输美纺织品的增长幅度和品种范围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问题来自中国纺织品输美后来居上、对美国压力日益增大的形势。中国纺织品输美数额1972年仅30万美元,1979年中美建交当年已达2.363亿美元。里根上台后中国纺织品进口的增长幅度进一步加大,1981年比1980年增长73%。1982年尽管美国经济不景气,但中国纺织品进口增长幅度仍达25%,进口额达到8亿美元,占美国纺织品进口总额的11.3%,一跃而为美国第四大纺织品进口来源。美国对此颇感震惊。美国纺织业尤其是成衣行业深感不安。

在中国输美纺织品中,成衣份量自1978年首次超过其它纺织品类别之后

日益增加，到 1982 年已占到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 1 / 3；再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业潜力巨大，后劲十足。

美国纺织业特别是成衣业担心，如果听凭中国输美纺织品继续大幅度增长，它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威胁。来自纺织业基地的南、北卡罗来纳两州、代表纺织业界利益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杰西·赫尔姆斯等人，一直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加以严格限制。

鉴于中国纺织品输美基数已达到一定高度，中国在美方对这一形势感到压力的问题上持理解态度。从基本立场出发，中国谈判代表在削减中国对美国纺织品出口的幅度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让步，提出了今后每年出口增长幅度为 6% 的低要求。

但是，美国方面得寸进尺，在谈判之初就提出，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今后每年的增长幅度将不能超过 1.5 ~ 2%。

双方由于立场距离太大，争执一直很激烈。1982 年的三次谈判均不欢而散。但双方都表示了尽早达成新协议的愿望。故而谈判仍在继续进行。

1983 年 1 月 6—13 日，第四轮谈判在北京进行，由于美方缺乏诚意，拒不作出让步，双方仍未达成协议。

随后，美国从 1 月 15 日开始单方面对中国纺织品的进口实行限额，限制范围涉及三十个纺织品品种。

中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

1 月 19 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宣布，中国从即日起停止批准从美国进口棉花、化纤和大豆的新合同，并削减从美国进口小麦等农产品的计划。

中国的对应措施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农场主由于其产品日益依赖中国市场而甚为恐慌。美国农产品中仅上述四个类别对华出口额即高达 15 亿美元左右，其中小麦一项就占约 11 亿美元。如果中美双方长期无法达成纺织品协议，以致中国最终停购美国的哪怕只是小麦这一种农产品，则美国农场主将遭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损失。因此，他们纷纷抱怨美国政府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做法。

美国政府由于利害所系而不敢一错再错。

美方对谈判签署纺织品协议的态度渐趋缓和。

1983 年 3—7 月，中美双方先后又进行了三轮谈判。美方立场松动，中方相应作出了适当让步。几经拉锯式的讨价还价，双方谈判代表于 7 月 30 日在日内瓦就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限额达成最后协议。

8 月 19 日，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郑拓彬代表美中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中美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协议追溯至 198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为期五年。

该协议规定，在今后 5 年内，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每年增长幅度降低为 3.5%；美国对中国出口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的范围由上一协议时的六个扩大到 34 个品种。

协议开始生效后，美国原实行的单方面限制措施自动取消。与此同时，中国也解除了早先关于进口美国棉花、大豆、化纤和小麦等农产品的禁令。

一场行将升级的纺织品贸易争端终于得以消弭。

中国在最初立场上后退了一大步，以削减后五年纺织品出口的数量和品种、牺牲部分纺织品利益为代价，促成了这一协议。

美国人仍不知足。这在美国纺织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协议草签前夕，美国方面在谈判中充当顾问的一些纺织品和服装业经理人员因为不满而提前退出回国。协议签署后，他们又进行公开指责。其中，美国成衣制造商总会常务理事巴纳德甚至杯弓蛇影称：

“这项协议是个灾难。”

他们为此曾一度吵吵嚷嚷，要求里根政府取缔这项来之不易的协议。

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压力，美国方面节外生枝。1983—1986年间，它除了按中美双方协议规定对34个品种的纺织品实行配额外，还单方面宣布对另外50个品种实行配额限制，使中国纺织品遭受配额限制的类别事实上增加到92个。按1982年的年度增长幅度计算，这期间由于美国实行限额，中国对美国纺织品出口净减少10亿美元。

1987年底，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已届期满，中美双方又面临签订新的纺织品贸易协议问题。

为了避免重蹈前一次设限产生不利后果的覆辙，美国这一次表现较为积极而且灵活。两国代表团在华盛顿的谈判很快就达成了新的协议。美国没有再次玩火而对中国纺织品进口施加单方面限制，但却迫使中国作出了更大的让步。

新的协议从1988年1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四年，它将中国输美纺织品和成衣的年度增长幅度从原来的3.5%降为3.3%，将限额范围从原来的34个品种扩大为81个品种，并第一次将丝绸和芒麻包括在内。

中国方面等于接受了美国在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期间单方面实行的限额条件，承认了既成事实。

这一协议使中国对美出口纺织品的85%均受到严格限制。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纺织品的基数已经升高，因而它无疑也就会使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有人估计，中国仅1988年一年就要因此而减少出口创汇收入近7亿美元。

子虚乌有的“政府补贴”说

1983年是中美关系中的多事之秋。

中美之间继湖广铁路债券案引发争端之后，又接连发生胡娜事件、第一宗美国间谍案及泛美航空公司恢复台北航线等风波。

纺织品贸易战新年伊始即告打响，待到入夏新的纺织品贸易协议签署后初步平息。但是，火种并没有熄灭。

美国人还在千方百计地想实现他们在谈判桌上未能达成的愿望，最大限度地限制中国纺织品的进口。

中美纺织品贸易战的战火随时有可能再次爆发。9月12日，被美国进口商斥之为“贪得无厌”的美国纺织业终于又向中国发起了攻击。

这一天，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美国服装厂商协会、美国服装和纺织品联合会、国际妇女服装工会联合向美国商务部投诉，指控中国对所有向美出口纺织品、服装和有关制品实行“政府补贴”制，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纺织品等征收反补贴的“抵消关税”。

他们指证说，中国对纺织品出口实行内部汇价，按1美元兑换2.8元人民币结算，而当时官方人民币汇价是：美元兑换2元人民币，因此出口获得40%的财政补贴。

按照美国的有关法律，如果中国确实给予出口纺织品补贴，美国将对中国的纺织品的进口征收与补贴相同比例即40%的抵消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业。

中国方面及时提出了严正交涉，以防事态再次扩大。

9月27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代表王品清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进行交涉，要求美方采取措施，制止投诉立案。

美方没有作出积极回应，相反继续根据本国“反补贴案”的受理程序，对投诉予以立案审查。

10月4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受理此案。

此后，中国方面加强了对美交涉力度。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人、新闻发言人、有关单位和驻美使馆人员等多次出面，向美方阐明中国的立场，说明中国出口商品不存在政府补贴，不能按美国的法律程序处事。

10月27日，对外经济贸易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

中国既没有对任何出口商品实行补贴，也没有向任何国家倾销产品。

因此，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对我的投诉是无理的。

声明对美国商务部在中方作出交涉后仍受理此案表示遗憾，并提醒美国方面：

如果美国进一步接受投诉提出的要求，必将危及双边贸易。

我们希望美国政府慎重考虑此事可能产生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最后，中国方面在声明中还表示“将根据事态的发展相应作出反应”。

声明无异于是在警告美国人，如果美方恣意妄为，重施单方面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伎俩，中国方面不可避免将作出必要的回击。

美方吸取以前的教训，在随后处理此案的过程中变得慎重了。

11月3—4日，美国商务部就当时纺织品是否征收抵消关税问题举行了2天的听证会。但是由于主张征税的国会议员和反对征税的纺织品进口商各不相让，听证会没有取得结果。

是否征收抵消关税问题从此交由美国商务部自行考虑解决。商务部长鲍

德里奇表示，将按照美国法律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给予补贴情况进行调查取证。

中国方面紧紧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力促美方不要作出使事态失控的事。

11月17日，中美进行技术转让换文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贾石向美驻华大使恒安石重申了中国对所谓“政府补贴”一案的原则立场仍接着，中国发出了可能采取有关对应措施情况的信息。

中国驻美使馆向美国务院和商务部透露，中国准备将对购买美国粮食合同的执行与美国对“反补贴案”的处理挂钩，中国能否继续购买按粮食合同规定尚未买够的200万吨小麦，要视美国裁决此案的结果而定。

11月30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新闻发言人再次就此案发表声明，希望美国政府从两国整个经济贸易关系大局出发，慎重并妥善处理“反补贴案”。

进入12月，气氛骤然紧张。

根据美国的法律程序，美国商业部必须在12月16日前对此案作出初步裁决。届时，如果仍未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除非有关方面通过谈判商定可以延期一次，否则美国纺织业有权重新投诉，而后商务部必须在12月20日前作出最后裁决。

美国国内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商与零售商、农场主倍感压力增大，因而加紧院外游说活动，试图阻止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的新限制。

进口商和零售商担心，自己的利益会由于货源在对中国纺织品进口施加额外限制之后减少而受到损害。农场主则尤其害怕，对中国纺织品增加限制会激怒中国，以致停止进口美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

他们从各自的切身利益出发，一直强烈反对美国政府进一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

美国进出口商协会纺织业和服装业小组律师迈克尔·丹尼尔斯12月14日专门就此事举行记者招待会，代表他的雇主和美国全国零售商协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

对中国的纺织品实行限额或征收惩罚性关税是不明智的，还可能是不合法的。

这会使国际贸易陷于混乱。我们（华盛顿同北京）的贸易关系将遇到巨大的困难。

丹尼尔斯在声明中还对美国纺织业受到中国纺织品进口的损害这一说法予以公开驳斥：事实并没有证明国内的纺织业正在受到中国出口的纺织品的损害。

我们没有陷入衰退。我们享受繁荣。经济一个劲儿回升。

他提到，在美国纺织品进口总额中，中国只占10%左右，而香港、台湾和韩国三家共占了60%。

言外之意是，美国纺织业受害的说法实属无中生有。

鉴于有关各方的强大压力，美国方面终于半途刹车，制止了“反补贴案”的发展。

12月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中止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和有关产品征收抵销关税的调查取证活动，并且说美国纺织业已暂时撤回对中国的投诉。

随后，美国政府与纺织业以十天为限进一步商讨解决问题的其他办法。

12月16日，白宫新闻秘书处公布了新的进口纺织品非配额品种管制计划。这一计划由总统顾问拟定、经总统批准，并得到了纺织业领导人的赞同。

新的管制计划规定：

如果某种纺织品的进口在近一年内增长达30%以上，或这种进口占美国国内产量的20%以上，再或者从某个别供应者进口某种纺织品的数量达到或超过美国产量的1%，则都被认为是“出现了扰乱市场局面或扰乱市场的威胁”。

在上述情况下，美国纺织业即可要求与政府进行协商，以确定控制进口的措施。协商期限九十天，在此时间内，政府对进口水平加以冻结。

新的纺织品进口管制计划涉及从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进口的、目前没有列入配额协议的十五类纺织品。

它的出台显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该计划是美国纺织业与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结果，对美国纺织业让步的成分较多，因而具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因此，这一计划的实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仍然具有不利影响。根据计划提出施加限制的标准，美国纺织业可向中国提出十五次协商限制的要求，从而妨碍了中国对美非配额品种纺织品出口的增长。

白宫纺织品管制计划一出笼，立即得到了美国纺织业的欢迎。

美国纺织品厂商协会和服装厂商协会第二天联合发表一项声明，称赞该计划“是在处理进口品扰乱美国纺织品和服装市场方面向前迈进的一步”，并且表示眼下不会重新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提出关于征收抵销关税的投诉，但是保留重新投诉的权利。

至此，美国纺织品厂商投诉中国对纺织品出口实行“政府补贴”一案获得暂时解决，但仍潜伏着重新引发争端的因素。

中国有关部门和人员居安思危，一直在为对付美国纺织业可能提出的新投诉作准备。

说不定，美国人又会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原产地规定”点燃新战火

中美之间围绕“政府补贴”问题的风波在1983年底之前告一段落，预示着两国关系在即将来临的新年里可望跃上新台阶、获得新发展。

两国人民满怀希望和信心迎来了 1984 年这一两国关系中的丰收年。

继 1 月 10—16 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应邀访问美国之后，美国总统里根旋即于 4 月 26—30 日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最高级互访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自身，在于它极大地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理解和友谊，而且还为发展两国军事关系进一步开辟了道路。时隔不久，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在 6 月 11—23 日应邀访美。其间，里根正式签署文件，宣布允许中国购买美国武器。这是美国政府为实现中美长期军事合作而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从而使中国成为继南斯拉夫之后第二个有资格享受美国对外军售的共产党国家。

迹象似乎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如日中天。

然而，太阳光最亮的时候影子也最黑。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方面又抛出一枚炸弹，点燃了中美纺织品贸易战的新战火。

美国海关 8 月 1 日宣布，将从 9 月 7 日起实行新的进口纺织品原产地规定。

根据这一规定，美国届时将对进口纺织品的来源国家和地区实行严格鉴定和区别，不允许经过他国或地区加工的服装和纺织品计入另一国家或地区得到美国许可的进口配额之中出口到美国。简单地说，在过去，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承担裁剪衣料、制成半成品，而后的钉纽扣和缝制口袋等成品工序由另一国家或地区完成，则仅负责完成成品的国家或地区要被视为原产地或地区，对美国的出口限额即由这个国家或地区执行。如今，新的原产地规定将承担制造半成品的国家或地区也认定为原产地，对美国的出口限额也适用于这个国家或地区。

美国新的原产地规定的限制对象包括所有对美出口纺织品的国家或地区，但就出口数量的大小而言，显然是特别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日益增加，而且在出口纺织品的生产加工过程中一直与香港存在分工协作关系。中国承担制造半成品，出口到香港后再加工为成品。对香港的出口约占中国纺织品出口总量的 1/3。中国每年依靠这种协作关系增加出口收入估计达 3 亿美元左右。

新规定一旦实施，香港将首先遭受损失，对美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将减少一成半以上，价值近 3 亿美元，同时纺织业和服装业也将有约 5 万名工人失业，进而对中国产生连锁反应。

届时，中国现有的纺织品出口配额和生产部署都将完全改变，中国的纺织业生产、工人就业、对外贸易乃至整个经济发展都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人刀架脖子不低头。中国政府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与美国方面进行了坚决斗争。

8 月 17 日，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致信美国政府要求重新考虑它的纺织品进口新规定。章文晋说：

这些规定违反了美中两国去年签署的双边纺织品贸易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将受到不利影响。现在对此还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仅在华南几省，就有数百家工厂和大约 6 万名工人受到影响。

这对我们的工业、就业、贸易和经济发展将是沉重的打击。

章文晋大使在这封信的末尾还写道：我们希望，我们之间的贸易能免遭破坏。但令人遗憾的是，如果美国不履行它在中美贸易协议中对中国的承诺，任何人都不能保证我们之间的贸易不出现倒退的趋势。

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与此同时意味深长地提到，“作为对美国实行纺织品限制的反应，中国很可能减少购买美国谷物”。

美国国内有人就此发表评论称，中国大使的这封信“是一种含蓄的警告，即中国可能以减少进口美国农产品来进行报官”

作为对应措施的前奏，中国已在 8 月中旬取消了一项购买价值 30 万美元的小麦合同。

同一天，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代表在北京约见了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这些拟议中的新规定”。

美国国内的农场主和零售商、进口商趁机向政府发动新一轮的攻势。

8 月 15 日，进出口商协会致函海关署署长威廉·拉比，就纺织品进口新规定提出十六个问题，要求“立即澄清”，称只有这样进口商才能做生意。服装进口商抱怨说，新的限制很可能会造成圣诞节期间零售商店缺货，并使服装价格上涨 20% 之多。

不久，在参议院财政小组委员会一次关于美国纺织业情况的听证会上，工业品零售贸易联合会的代表、一家联号商店公司——泽雷公司总经理马尔科姆·谢尔曼，强烈反对任何进一步保护美国纺织品生产者、使他们免受进口品打击的建议。

这个工业品零售贸易联合会还向参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表达同样意见的声明，声明指出：

阻止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已经并将继续使美国社会付出重大的代价，同时对美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利益产生消极影响。

在参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的会议上，全国玉米种植者联合会、全国小麦种植者协会的代表们都表示，担心中国可能决定不再续订将于年底到期的购买粮食的合同。

全国小麦种植者协会主席厄尔·普赖尔说：

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停止进口美国粮食，那就会使麦农在今年年底前损失 5 亿美元。

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部的几份研究报告分析说，如果进口中国纺织品受到限制，不仅种植小麦的农场主甚至连美国政府都会遇到大麻烦：

如果中国不购买小麦，那么美国小麦价格平均每年每公斤要降低 1.65—2.75 美分。

如果中国不购买小麦，那么美国政府每年不仅要为本来就属缺额支付的

农业补贴计划向农场主多支付约 2.3 亿美元，而且要积压约 320 万吨小麦。

因此，代表农业部门利益或来自农业地区的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反对美国实行纺织品进口新规定的态度尤为强烈。他们一致敦促里根总统取消这些新规定。

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当时也指责说，美国限制纺织品进口引起中国停止购买更多的美国粮食。他呼吁里根政府尽快制止这一事态的发展。

在国内外反对力量的夹击之下，美国政府黔驴技穷，而后只好求诸妥协，故而逐渐放宽了立场。

8 月 20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怕格向记者证实中国对美国新的纺织品进口规定表示关注，同时宣布，美方将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和看法，并将它们交由政府机构考虑，必要时将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

稍后几天，美国政府宣布一项新的决定：

8 月 3 日前订购的、10 月 31 日前运抵美国的服装，可以不按有关进口服装原产地的新规定办理。

这一“例外”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合众国际社称它“消除了中国的部分反对意见”。但是由于美方在 9 月 7 日仍按原计划实行原产地新规定中的其他各项限制措施，中国方面的反对态度虽趋向缓和但仍较坚决。

9 月 14 日，中国对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就美国实施纺织品进口原产地新规定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美方补偿中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9 月 20 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照会美国国务院，重申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美国自 9 月 7 日开始实行的纺织品进口新规定，并对美国这种做法再次表示强烈不满。

面对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美国人的气势与当初相比已成强弩之末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休斯 9 月 21 日在谈到中国的照会一事时，不愿把这次照会说成是一种抗议，而只说美国准备同中国进行磋商，欢迎中国提出有关意见。休斯说：

我们正处在听取意见期间，在这当中，我们准备接受有关各方的意见。

中国的意见将同其他有关政府的意见一起转达给美国海关署和其他机构，供他们考虑，如果必要的话，将对规定作出修改。

休斯的话似乎有气无力，但中听多了。

一个月前的今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第一次作了相同内容的表态，随后美国政府对限制进口的规定进行了有限的修改。现在，美国方面旧话重提，表明今后仍然存在可以进一步修改纺织品原产地新规定的可能性。

围绕非协议配额品种的纺织品进口问题，美中之间你限制进口、我停止购粮，使纺织品贸易再度陷入无声无光的战火中，并且一时不见有消停之兆。

如此针锋相对数月之后，中国未再继续采取减少购买美国粮食的行动。中美第二次纺织品贸易战遂告停火。

此后，中美双方捐弃前嫌，就里根政府拟将限制的中国 9 种主要纺织品和成衣项目的配额问题进行谈判。谈判自 1984 年末开始，断断续续持续几个月，1985 年 3 月初达成协议。协议规定，中国九种纺织品和成衣在今后 3 年内每年平均增长 3—4%，各种类之间可以作 5% 的小幅度调整，这九个品种是被单棉布、斜纹棉布和横贡棉布、棉外衣、棉衬衣、棉工装裤和工作服及类似成衣、其他非规定棉织品、非植物纤维和非编织的人造纤维纺织品、人造纤维编织的男式衬衫和女式罩衣、人造纤维胸衣等。

美国纺织品进口的原产地新规定，尽管还有一部分内容仍在生效，但因国内不少商人和除中国外的国际出口商人抗议之声不绝于耳而执行乏力，形同虚设。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分子眼睁睁看着自己枉费心机，心尤不甘。一桩新的阴谋因而又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着等待见光。

1985 年 3 月 19 日，以埃德·詹金斯为首的一批众议院议员提出了一项“1985 年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实施法案”。该法案要求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纺织品进入美国施加严格限制，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控制在国际多边纤维协定规定的水平内。法案对以中国为首的几个纺织品出口大国（地区）的限制更严，要求它们对美纺织品出口的增长幅度每年平均为 1%，而不是目前实际增长的 19%。但它对来自欧盟和加勒比国家的进口限制较宽，只要求将它的对美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降为 6%。

较之过去的各类限制纺织品进口的计划，这一法案的要求尤为苛刻，保护主义色彩极为浓烈。因此，它一俟抛出，立即遭到了国内外所有有关方面的愤怒声讨和强烈抗议。

该法案尽管先后在国会、众参两院得以通过，但最终仍在 12 月 17 日被里根总统否决。里根总统在给国会的否决信中明确表示：

这项法案将给美国经济和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失，引起外国对美国出口进行报复，对美国贸易造成损失，并且危害美国繁荣赖以实现的世界贸易体系。

这项法案的最早发起人詹金斯事后承认，他无力推翻里根总统的否决。

詹金斯始乱终弃，落得个自讨没趣的下场。

这也是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中一切惹是生非者无一能够逃脱得了的结局。

第五节 “人权问题”始作俑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文化观念也有别。因此，以什么是人的基本权利为核心的“人权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存有争议的问题。里根政府时期，中美交往日渐密切，双方分歧也明显加深，进而在“人权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美国国内的反华反共分子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机大肆活动，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标准和文化观念。为此，里根政府时不时“总想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方面，由于对外战略的调整和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确立，对美政策逐渐改变过去的明显倾斜性，更加强调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在一起。因此，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种种干涉，均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坚决还击，从而在中美关系中触发了一连串的外交风波。

一度势头看好的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再次陷入濒临倒退的危机。

里根曾想亲自收养胡娜

1982年7月中旬的美国，正值盛夏。骄阳似火，热浪袭人。

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郊的圣克拉拉城，联合杯国际网球比赛正热烈而紧张地进行着。

中国女子网球选手胡娜前来参战。

7月21日，忽告胡娜失踪。由于她不辞而别，此前也没有显露丝毫迹象，无人知道她为什么走、去了何方。

一时间，胡娜成了中美舆论关注的“明星”人物。

胡娜1964年4月出生在中国四川成都的一个军人家庭，时年18岁。她的父亲在军队中从事体育工作。她自14岁起就接受专门培训，很快成长为一名颇有发展前途的女子网球运动员。有关各方为培养她倾注了不少心血，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一直对她寄予厚望。

胡娜的失踪，牵动了中国有关各方的心。中国政府和在美的中国网球代表队及时通过适当途径请求美方协助查找，但未得到结果。

不久传来意外消息，胡娜出走是另有蹊跷！

7月26日，胡娜由他人代表正式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政治避难”申请，她的理由是有关方面一直“强迫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方面为之震惊，并迅速着手与美方交涉。7月29日，中国正式要求美国将胡娜安全送回，同时保证，如果胡娜回国，她不会受到迫害或惩罚，并且可以继续参加国际性

的网球比赛。8月2日中国外交部警告美国，如果不交还胡娜，中美关系尤其是体育文化交流关系将受到不利影响。美国方面拒绝了中国的正式要求。美国国务院8月3日称，美方将按照美国的法律处理这一事件。从此，中美双方围绕胡娜返留问题陷入长达八个月的纠葛中。

台湾方面第三者插足增加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并且使它更加复杂和敏感！8月5日，自称代表胡娜的美籍台裔华人女律师刘中原对外声称：

“胡娜是怕遭到迫害才投奔自由的！”妖言惑众，但对于一小撮别有用心之徒来说却是求之不得。

8月14日美国众议院十五名议员联名提交准予胡娜“政治避难”的议案，20日分别在众、参两院获得通过。

忍受骨肉分离、团聚无日之苦的胡娜家人日感伤痛，也日见惟怀。他们日夜盼望着浪子回头！

从9月16日起，胡娜的父亲和其他亲人曾多次给她写信，劝说她回到祖国怀抱。其中有一封信是由中国政府出面托请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转交给胡娜的。舒尔茨是在1983年2月初应邀对中国访问的。

胡娜始终没有反应。其间，她一直住在旧金山的一个美籍台裔华人家中，但拒绝任何性质的公开露面。所有要求“政治避难”事宜均由刘中原律师“义务”代办。

台湾报纸称，刘中原前后为胡娜耗费时间总计约1000小时，按当时律师出工费价格计算约值10万美元。

一个与胡娜素昧平生的台裔华人，为了她不仅舍弃有偿服务案件，牺牲了巨额资金收入，而且还冒着使自己事业信誉受损的巨大风险！

人们不禁要问：

“她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呢？！”

无人解释个中原委！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事件的走向正向人们一层层揭开谜底。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仍在拨拉个不停。

10月13日，美国移民局同意胡娜工作许可。

中国方面于10月24日向美提出抗议，希望其能迷途知返。

美国方面执迷不悟，在背离中美友好大方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国务院于12月7日顶着风头批准胡娜“政治避难”要求，并在1983年元月14日呈送里根总统，履行最后一道行政报批手续。

里根表示，不反对给予胡娜“政治避难”。

此后，案件报送美国司法部核准，以便作出最终决定。

其时，美中双方正在为美国国务卿舒尔兹访华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美国方面由于担心胡娜案件会进一步影响正常外交活动而迟迟未做决定。

这段时间，胡娜仍未露面，也未参加任何网球比赛，但一直在悄悄练球，

并与台湾方面有着频繁联系。

台湾当局给她送来了一副“肯尼士”牌网球拍。这种球拍是由台湾省光男体育用品公司生产的。此前，她一直使用美国制造的，“王子”牌网球拍。

在美国准备给予胡娜“政治避难”的消息传出后，台湾网球协会曾致函胡娜“为她的前途祝福”，并表示如果胡娜需要帮助，他们“愿尽力协助她拓展日后网坛生涯”。

好一副济世救人的菩萨心肠！同样是胡娜，为什么她在出走之前没有遇到？

台湾方面的别有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可怜年纪轻轻的胡娜“拿人手短”、无法抵挡诱惑，以致受骗上当还不胜感激。

1983年2月台湾网协理事长梅长龄在台卧病住院期间，胡娜即托人转达慰问，并捎去一张她的半身彩色照片。身体羸弱、神志恍惚的梅长龄，临终前回光返照，竟然提起笔来在胡娜照片的背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胡小姐，你是中国人的光荣！”

虽令亲者痛、仇者快，但却是他最后一次为台湾当局尽“忠心”！

胡娜的心情并不好。

她思念故乡、牵挂亲友。

她不安宁，但她无奈。

在等待美国方面关于她的最后决定期间，胡娜常常因为“害怕被遣返，彻夜失眠”。

美国当即摆出一副“虎不人”的姿态。一位官员表示，不管决定如何，美国都不会将胡娜遣返的。

不久，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筹募负责人维克多向新闻界宣布，里根总统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使胡娜得以居留美国。

维克多透露，他给里根总统去过电话，表示希望总统能够促成给予胡娜“政治避难”这件事。

里根总统在电话中答称：

“如果有关部门决定将胡娜送回中国，我会在她被送回之前收养她。”

胡娜根本就无退路可走。

1983年3月11日，胡娜忍耐不住过“隐居”日子的寂寞和“政治避难”案的悬而不决，亲自跑到华盛顿拜会美国国会议员及有关官员，请求对其予以支持，但同时表示：

她的事“不牵涉政治”！

这是她第一次为自己的事亲自表态。

4月4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经司法部、移民和归化局同意，准予胡娜在美“政治避难”。

美国司法部的一位发言人说，美国政府是根据“1980年移民法”给予胡

娜“政治庇护”的。依照这部法律规定，凡害怕因种族、宗教、国籍、政治意见或其一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而受到迫害者，申请人若能提出确切证据，即可准予政治庇护。这位发言人说：胡娜的情况合乎这一条件。

胡娜事件终于真相大白！

美国援引本国法律在一件中国运动员变节出逃的小事上大作文章，纯系干涉中国内政！

撇开这一事实不说，胡娜的律师提出她申请“避难”的所谓理由实属无稽之谈！

胡娜是中国培养了多年的年轻运动员，在她身上寄托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发展体育事业的希望，根本不存在她“受到迫害”的情况。同时，胡娜出访美国之前年仅 18 岁，刚达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法定年龄标准。中国方面“强迫她入党”纯属造谣，不攻自破。

中国的反应态度坚决而且严厉，但在行动上又不失谨慎和冷静。

当天，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决定给胡娜“避难”；并称，美国政府这一举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损害两国关系的严重事件，势将影响两国的交往。对此，只能由美国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第三天，中国外交部照会美国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美方蓄意制造胡娜事件。韩叙副外长召见美国大使恒安石，向他递交了抗议照会。

4 月 7 日中国文化部宣布，自即日起，中国政府停止执行 1982 年和 1983 年中美文化交流计划中尚未执行的全部项目。同一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发表谈话，决定停止 1983 年中美体育交往。

台湾当局则幸灾乐祸！

台“外交部”发言人 4 月 5 日对美宣布给胡娜以“政治庇护”“感到高兴”。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说，决定“表明美国是个按法律行事的国家”。

与此同时，台湾一些曾经在幕后活动的个人和组织也纷纷跳到前台，以公开的实际行动对胡娜“表示关心”。

“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经旧金山“台资银行”胡娜奖学金帐户，汇赠胡娜个人 2000 美元。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联络工作委员会”召集人周应龙，以私人身份向胡娜捐赠 500 美元。这笔捐款经由台湾“全国网球协会”总干事王世正代表接受，后转送胡娜本人。

台湾方面在胡娜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至此已一目了然。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各路人马倾巢出动，为其制造胡娜事件辩解。

前副总统蒙代尔在对这一举动表示赞许时还叫嚷：“美国的基本政策是作为全世界的避难所，美国应坚持这一政策。”

国务院发言人休斯否认美国有对胡娜进行胁迫的“蓄意”行为。他声称这件事是根据美国处理这类事件的有关法律和程序处理的，并希望不要对中

美关系造成任何损害。美方对中方临时中断双边文体交往的决定“感到遗憾”，甚至指责为“过分反应”，但仍表示希望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此事件发表谈话说，里根政府的决定“符合美国的法律与传统精神”，他认为这一事件会产生暂时不利影响，但不会使人们忘记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

副总统布什一改昔日的温和形象，态度变得非常强硬，他宣称：

“美国不能因为有人反对就屈服……”

所幸的是他并未全然辜负中国政府和人民昔日对他的善待和礼遇，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美国数得上的当权人物引导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的责任，所以又说：

“美中关系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应该能够渡过胡娜获准政治避难后所出现的紧张关系。”

的确，一个运动员的变节，不管美国在幕后起多大作用或借此作何许文章，对中国的各个方面实际上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方面作出各种各样的反应，无非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是非曲直面前的公正立场，从而维护国人尊严和鼓舞民族精神、推动世界正义和进步事业的发展。中国仍然相信并且将努力促使中美友好关系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胡定一对记者所说的，“美国‘庇护’胡娜是件坏事，但是如果双方都谨慎地、诚实地行事，中美双方的文体交流是可以恢复的。”

理智占了上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美之间围绕胡娜一案爆发的外交风波最后渐趋平息了。

“一对夫妇只生一胎”与美国何干？

20世纪尤其是二次大战以来，世界步入人口大爆炸的时代。人口问题成为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潮流的大问题。

世界人口1947年只有25亿，1987年已达50亿，40年翻了一番。近4/5人口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中的绝大部分又都集中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占了10亿，比40年前增加了近1.5倍！

因此，控制人口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课题。

联合国成立不久即制定《人口行动计划》，确立了各成员国应该共同遵守的原则：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1984年联合国《墨西哥城人口与发展宣言》进一步明确规定：

“凡认定其人口增长妨碍国家发展计划的国家，都应当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和方案。”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是耕地面积却只占

世界总量的 7%。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每年净增人口均在 1500 万左右，相当于荷兰整个国家的人口总数。

根据这一具体国情，并遵照上述联合国的号召和原则，中国制定了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并将其列入宪法作为一项根本国策。自 80 年代中期起，中国加强了推行这一政策的力度。

但是，随着中美摩擦增多和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加强，里根政府开始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妄加评断。

从 1983 年开始，美国报刊连续发表报道，将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说得面目全非。其中有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中国强制控制生育计划，这种情况既涉及政府利用经济和精神奖励来执行生育指标，也涉及强迫进行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

那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体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原则上只生一个孩子。但后来又从实际出发，在农村适当放宽要求，允许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间隔 5 年后生育第 2 胎。在少数民族地区，则允许各民族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生育计划。

在推行过程中，中国政府规定了一整套方针和原则。一是坚持国家指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原则，以宣传教育为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辅之以必要的经济和行政手段；二是坚持以避孕为主，在避孕失败的情况下辅之以人工流产的补救措施，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堕胎；三是严厉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在国家指导、群众自愿和安全有保障的大方针指导下，中国的计划生育得以顺利实施，并日益发展成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行动，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从 1970 年的 3.3% 下降为 80 年代的 2.1%（年平均数，下同），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由 1970 年的 2.5% 下降为 1.4%，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率由 1970 年的 6 下降为 2。

就算中国控制生育的计划真是依靠“强制”办法加以推行的，那也只不过是中国的内政，更何况中国人民自己也不会容许这样做。美国人根本无权加以干涉！

果真如此，中国又怎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计划生育成就！

为何美国人竟会置事实于不顾，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此事说来话长。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再加上家大业大，故而操持不易。美国则不然，相对而言，美国人口较少、资源较充足，仅人均占有耕地和粮食的份量就分别是中国的 1.3 倍、4.5 倍，均居世界较高水平。美国一直没有也不太可能会遇到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增长过快、资源紧张、粮食短缺之类问题的巨大压力。

美国人长期泡在充足、安逸的蜜罐子里，短视而缺乏危机感，浮躁但却

自视优越，由此变得常常盛气凌人。

美国的国情造成了美国人的劣根性。美国人也将这种劣根性不可避免地带进了美中关系里。美中交往越广泛，美国人的这种劣根性就越加暴露无遗。不管中国做什么事、不管这些事与他们有无干系，他们总想拿着自己的尺子比划比划，按照自己的标准衡量衡量；一旦发现差异，便大呼小叫，向中国施加压力，以图促变，从而使中美纷争长期不能平息。

与中国在计划生育问题上遭到诬蔑和中伤的同时，联合国方面也连带蒙受不白之冤。

当时，“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1987年改称联合国人口基金）已经参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活动，并且提供了援助贷款。于是，美国指控该组织积极支持中国的强制性控制生育计划。

里根政府宣称反对任何国家把堕胎当作控制生育的手段，并曾经作出决定不在经济上帮助支持堕胎或强行控制人口的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因此，里根政府迫于压力在1984年和1985年组织其国际开发署对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中国参与计划生育活动情况进行所谓的调查。其间，里根政府扣压了美国向该基金提供捐款的50%，其中1985年的扣压金额为1000万美元，约为美国捐款额的20%，正好相当于当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在中国投入的资金数目。

此后，由于调查未能取得任何关于“中国强制控制生育计划”的真凭实据，美国取消了捐款扣压，但仍坚持这些捐款不得用于中国。

一批别有用心的美国政客轮番上阵，蓄意掌生事端，使事态更形升级。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众议院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之流。他们最早叫嚷通过立法完全禁止美国援助中国的人口计划。1984年5月，众议院通过一项援外法案修正案，禁止资助中国推选人口控制计划或资助在中国推行强迫堕胎的人口控制计划之组织。该法案于1985年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后经里根总统批准而开始生效。这是美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阻挠中国控制生育计划的实施规定为国家政策。蹦得最凶的是美国参议院里的一班人马。他们仍然不思悔改，继续无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情况和巨大成就，指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情况和巨大成就，指责中国“侵犯人权”、“违反人道”。

1984年10月，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在国会讲话时，公然诬蔑中国“推行种族灭绝政策”。这是里根时期，美国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最恶毒的一次攻击。

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以保守派的代表著称，并“长期以来一直忠实地维护台湾，批评同北京保持密切关系”。此人举止迟缓、谈吐不雅，但在参议院向里根政府施压、图谋禁止资助中国生育计划的活动中，却劲头十足，甘当马前卒。他拉拢、组织了参议院的几乎所有保守派议员，采取一致行动推迟了对温斯顿·洛德接替恒安石出任驻华大使提名案的表决，要挟

里根总统在资助中国生育计划问题上作出让步。直到五周后的 11 月 4 日，参议院才表决通过对洛德的提名。

美国人后来承认，美国方面对中国人口政策横加指责，另有它自己的用心：

批评中国实行强制性人口政策的国会议员对制裁北京并不太感兴趣，而主要意在试图利用中国的做法来取消美国对国际人口控制组织的援助，在美国国内发起抵制堕胎运动。

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 1980 年开始将中国列为一个专门部分，从 1985 年起则将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为“违反人权”的例证“纪录在案”。

美国政客为了在国内达到某种目的，竟然“祸水东引”，拿中国人作替罪羊！

当他们捏造出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时，“人口问题”又被扯进“人权问题”，从他们手中的幌子变成了他们对面的“靶子”。

如此一来，事情便无法善了。

当然，是非黑白自有世人评说！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总干事曾就美扣压捐款一事发表声明称“深感失望”，其中就驳斥了美国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攻击。

中国方面只是从中国人民的感情出发作出了较为适当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此发表谈话，对美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并严正指出其完全违反联合国大会有关决定。

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言人曾专门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歪曲和攻击。

后来只是由于美国扣压给予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部分捐款，中国外长吴学谦才就此公开表明立场，表示中国反对美国停止援助国际生育计划。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方面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中国人的头上并大加攻击，并未对中国造成任何实际损失。再加上中国反应较为理智，使关于“中国控制生育计划”的争论并“没有直接或立刻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从而干扰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

美国人岂能“维护西藏的人权”？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通过西藏地方区域民族自治政策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切实执行。

但是，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流亡国外，后多方活动，攻击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鼓吹“西藏独立”，并煽动西藏一小撮地方分裂分子闹事。于是，便有了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西藏问题”。

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发端不久，里根政府继计划生育问题之争后

又插手“西藏问题”，掀起又一股干涉中国内政的逆流，将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性置于脑后。

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关于“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声称：

美国应当敦促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作出的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努力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总统应当指示美国官员更加关注西藏人民的忧虑，以同所有关心西藏侵犯人权的人密切合作，以便寻求美国政府和人民能力之效力的领域。

实际上，所谓“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纯属一小撮流亡国外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美国某些假卫道士精心编撰的谎言。

他们相互配合，攻击中国在西藏违反人权，推行“毁灭宗教”、“迫害喇嘛”等政策，妄图为其分裂中国或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口实。

西藏在1959年以前的约700年间一直实行野蛮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政治与宗教合而为一。贵族头人和寺庙上层僧侣为农奴主，组成统治阶级，享有特权，他们的人口仅占5%。占人口95%的广大农奴和奴隶深受农奴主的剥削和压迫，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任何人权。1959年，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万恶的封建农奴制。从此，西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西藏的人权状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昔日农奴如今成了新社会的主人，第一次享受到人身自由和当家做主的权利。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后，西藏人民进一步享有了民族区域自治权利，从此走上了平等团结、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四十年的建设，尤其是近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各方面也有了重大发展。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西藏人口从278万增加到385万，粮食产量增长了2.6倍，农牧民从一无所有变为每人年平均收入约400元！同时，西藏还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电力、采矿、木材和皮革加工业，各类学校发展到近3000所，在校学生约18万人。另外，中国政府还十分重视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优秀传统文化，既承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拨款帮助兴修寺庙，也鼓励藏族文教卫生事业，兴建藏学研究机构、出版大量藏文书刊、支持藏医藏药的研究与应用等。

西藏新旧社会两个样、两重天！

人们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不是“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而是恰好相反——中国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尤其是藏族人民的各种权利，实现了西藏人民要求获得人权的迫切愿望，从而调动了西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西藏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原为西藏的反动特权阶级，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在既不甘心丧失特权、又不愿改过自新的情况下发动了武装叛乱，失败后极少数漏网流亡国外。由于怀恨在心，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人权卫士”，并物色到美国的假卫道士作为后台老板，伺机挑衅制造出了所谓“西藏人权问

题”。

美国众议院就无端捏造出来的所谓“西藏人权问题”通过专门的法案；是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及其在美国的主子们的一次胜利。但这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一声警报，它表明美国政府开始公开插手“西藏问题”，明目张胆地向中国国家主权挑战！

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国会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而是听凭其为所欲为。

1987年9月，美国政府允许达赖访美，名义是供奉位于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城的一座舍利塔。

中国政府就此提出过交涉，并再次阐述了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但未能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达赖于9月18—28日访美国期间，曾获准在美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达赖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并提出所谓“持久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步“五点计划”，甚至请求美国国会在此“关键时刻”予以支持。该“计划”鼓吹将西藏变为“和平区”，为此，要求中国政府撤出驻军，并“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族自由”、在西藏实行“高度的政治和文化自治”。

该“计划”一出笼，即立刻得到美国右翼政客及御用喉舌的捧场打气和鼓噪助威。

当天晚上，又是那位赫尔姆斯参议员以及他的同伙佩尔在参议院外委会会见了达赖。

《纽约时报》同时发表专题社论，敦促美国国务院“维护西藏的尊严”。

在此期间，佩尔等六名议员竟然无视国际公理和道义，联名致信中国总理赵紫阳，公然支持达赖提出的以“西藏独立”为目标的“五点计划”。

几天后，众议院人权小组兰托斯·波特和罗斯等人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了佩尔一伙人的联名信，更加助长了鼓吹“西藏独立”的这股逆流。

以达赖为首的国外流亡分子煽动之声未消，西藏内部暗藏的分裂主义分子就起而闹事了。1987年10月1日，拉萨突然出现一伙暴徒叫嚷“西藏要独立”的反动口号，四处打砸抢烧杀，制造骚乱事件。中国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及时采取紧急措施，平息了骚乱事件。

美国的假卫道士再次借机发难。

10月6日，佩尔和赫尔姆斯提出的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在参议院获得全票通过。这项修正案歪曲此前在拉萨发生的骚乱事件，抗议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并且声称美国“应该把对待西藏人民的态度作为它处理同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敦促里根总统向中国施加压力使其同达赖喇嘛举行谈判，同时呼请里根会见达赖。

美国政府的立场也开始倾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0月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西藏问题时称：

“美国对同西藏发生示威有关的侵犯人权问题表示关注。”

国务卿舒尔茨一贯谨慎，这次却也栽了跟头。他在10月13日的众议院外委会听证会上谈到“人权问题”时，竟然也为谎言所惑而信其真。他说道：

“西藏是有一些侵犯人权的事情，我们对此感到遗憾。”

作为美国政府人员而在正式场合把“西藏问题”与“人权问题”扯在一块，这还是第一次。

迹象表明，事态还将继续发展。

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人权和亚洲小组委员会紧接着在第二天联合举行所谓“西藏问题”听证会。某些议员胆大妄为鼓吹“西藏独立”。

不多久，众议院人权小组两主席中的一个兰托斯的办公室发布一份新闻公报称，自从达赖9月访美以来，“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西藏人的镇压”。这是赤裸裸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12月3日，美国会两院联席会议通过所谓“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15、16日，该修正案分别在众议院参议院正式通过。

这说明美国承认了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的合法性，并试图将其纳入到美国国家政策的范畴内。

美国这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在事实上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由于它的影响，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颠倒黑白的游行示威。

11月17日，由一小撮美国国会议员和流亡在美的部分西藏人组成的“美国西藏委员会”纠集约200人，在美国会大厦前集会，抗议所谓中国在西藏“违反人权”。美参议院外委会主席佩尔、众议院人权小组两主席之一的兰托斯、助理国务卿帮办罗伊和另外三名众议员到场讲话，鼓吹“西藏独立”。随后，这批人又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前游行示威。

很快，这阵恶浪也波及到了中国。

1988年3月5日拉萨祈祷大法会行将结束之际，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再次制造了一场骚乱事件。时隔不到一年的12月10日，几十名喇嘛、尼姑又在拉萨闹事，鼓吹“西藏独立”，持续到三个月之后并且酿成更为严重的骚乱。

两次骚乱尽管很快得以平息，但却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并对西藏的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产生过不利影响。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就此发表谈话时，撇开问题的实质不说，而只“对发生暴力行动和用枪支对付示威者表示遗憾”，称美就西藏有关人权的情况再次向中国表示它的不安。

问题再也清楚不过了。

对于一小撮鼓吹“人权”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少数鼓吹“西藏独立”的西藏分裂分子，美国始终是持姑息态度，因而事实上扮演了一种助纣为虐的角色。

美国口头上表示关注“西藏的人权”，宣称要“维护西藏的尊严”，但

却从来没有为此做过任何有益的事。相反，美国人总是借口“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对保障西藏人民权利、维护西藏人民尊严的中国政府妄加指责或无端攻击，从而助长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破坏中国统一的反动气焰，在 1987—1988 年西藏的历次骚乱事件中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他们真正从事的却是危害西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破坏西藏社会政治稳定的勾当，无一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坚持原则立场，但一直保持克制态度。

当美国国会 1987 年 6 月第一次在众议院通过关于“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时，中国外交部仅发表简短声明，称：

“美国众议院的行为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愤慨和不满。”

中国驻美使馆临时代办唐树备在代表中国政府向美表示抗议时，还顾全美方的面子，要求它自行“采取措施，消除修正案造成的后果”。

1987 年 9 月达赖访美和 10 月 12 日美参、众两院数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修正案前后，中国政府各有关方面均分别在华盛顿和北京对美国表示了“强烈愤慨和不满”，并提出了“抗议”和“谴责”。

尽管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不断升级，并在事实上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本着维护中美友好关系的善良愿望，也考虑到美国政府和国务院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这些活动，表现出理智的精神，中国方面一直没有采取对抗行动，从而使双方关系没有因此而恶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随后在 1988 年还接受美国方面的提议，批准了美国高级官员对西藏的访问。

第一次是在 4 月，助理国务卿帮办小斯特普尔顿·罗伊之行。第二次是 8 月驻华大使洛德之行。第三次是 9 月帕特里克·莱希等四人参议院代表团之行。其中，除洛德外的几人均曾经打着“人权”的招牌对中国在西藏的政策作过无理指责或无端攻击。

中国允许诬蔑它对西藏政策的外国要人轮番进入西藏访问，这还是第一次。访问之后，美方也不得不承认，西藏比过去有了“惊人的”发展，并称这次访问对美国了解西藏地区的情况“有帮助”，对有关各方都是“有益的”。

这是对“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谬论的最好驳斥，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连续性和以事实说话、以理服人的良好外交风格。

第六节 半明半暗的隐蔽战

中美关系中售台武器问题这一热点降温后，两国之间在其他各个领域里的斗争逐渐突出。其中，发生在隐蔽战线上的情报斗争常常是最为直接、最具、危险的交锋，既有面对面的智勇相斗，也有眼皮底下的机关暗算，并且往往关涉到重大的国家机密，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没有弥漫的硝烟，但却带着浓烈的火药味。

美国方面惹是生非的霸道和中国方面“先礼后兵”的宽宏在此形成鲜明的对照。

1.3 1.3 万米高空的情报战

这是一场发生在 1.3 万米高空的情报战，是一场机舱里的外交战。

1985 年 11 月 25 日早晨 8 点钟，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

在泛美航空公司准备飞往纽约的一架 PA72 班机舱门口，正在登机的中国信使何存峰、杨水长各提一袋外交邮件，相继由漂亮的空姐迎进舱内，分别落座在 C 舱二排的 E 号和 F 号。

8 成 30 分，飞机准时起飞。

金色朝阳透过舷窗，照在人身上，暖在人心里。旅客们或坐或躺在座位上，一边礼貌地享受着漂亮空姐热情而周到的服务，一边随兴所致地干着各自的事情，或读报、听音乐，或轻声聊天并不时发出惬意的笑声……四处洋溢着轻松、安逸与祥和的气氛。

一切都如同往常，没有任何异样。

四十分钟后，舱前落下银幕，开始放映电影。

杨水长称在旧金山两日没睡好觉，将看护邮袋的任务全推给何存峰，独自睡下。

何存峰在看电影，心里记挂着使命，眼睛不时扫向脚下的两只外交邮袋。

过了约二十分钟，何存峰想去洗手间，便推醒杨长水，叮嘱他看着邮袋。

何存峰返回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两只外交邮袋不见了！杨水长也不在了！只有自己的一只航空袋孤零零地放在座位上。

“不对头！”何存峰被自己的第六感觉吓出一身冷汗。

根据 1961 年在联合国维也纳会议上签署的《外交关系公约》（简称《公约》——作者注，下同），外交官和外交代表在从事外交事务和活动时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外交官和外交代表的行李物品出入境时免于检查且免纳关税和捐税。信使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公约》对信使的权利和邮袋运送规范作了明文规定：“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信使“执行任务时，应受接受国保护”；“外交邮袋不可侵犯，他国不得启封检查、扣留或阻碍通过”。

“美国是《公约》签署国，理应不会扣留他国信使和外交邮袋。外交邮袋是信使的生命。人在邮袋在！小杨与邮袋在美国的飞机上突然失踪，肯定是出了问题。”何存峰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会不会是小杨携邮袋叛逃？！”何存峰担心极了，也顿时警觉起来。

苦心找遍座舱的每一个角落，何存峰没有见到丝毫人踪物影。他跨步上梯，准备到飞机上紧连着驾驶室的唯一“阁楼”里去寻找，但是中途即被两名穿制服的保安人员拦住。

由于自己的外语水平有限，何存峰只好请同舱一位英语流利的中国旅客当翻译，协助他与机方人员交涉。但保安人员仍然态度蛮横。这一信息告诉何存峰：

杨水长出事了！两只装有绝密文件的外交邮袋已经遇险！

“冲上楼去，夺回邮袋！”

“不行！这是在美国的飞机上，更何况对方人多势众。不能意气用事，必须智取！”何存峰逐渐冷静下来。他决心据理力争，运用外交手法与美国人一决高低。

“请你们注意外交信使的使命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交出杨水长和外交邮袋，否则你们要承担全部责任。”

“杨先生要求政治避难，带走文件。他不愿再见您。”

“杨先生身为外交信使，执行中国政府特别使命，受到中国政府信任，不能要求政治避难！我要求立即与他面谈。”

何存峰遭到了拒绝，一位空姐转给他一个手提袋，里面是何存峰的护照、机票和他与杨临时准备的零用美钞，并夹着一张显然是杨水长笔迹的字条。

真相已经大白。

“无耻叛徒！”何存峰气愤极了，也伤心透顶。

紧接着，飞机上的广播传出紧急通知：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抱歉，飞机引擎出了故障。为了保证旅客安全，机长决定本次航班临时降落芝加哥奥哈里国际。机场。现在飞机已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改变航线？里面一定有鬼！”何存峰当即提出抗议，但被保安人员推推搡搡地挡回到座位上。

机舱里掠过一阵骚动，旅客们看到保安人员的举动感到吃惊和不安。

至此，何存峰已毫无退缩之意。他暗自发誓，绝不能让国家机密落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手中！舍去卿卿性命也要追回两只外交邮袋！

趁着保安人员不留神，何存峰给那位翻译同胞使了个眼色，两人悄悄起身，再次奔到阁楼楼梯口。

对方碰到了硬钉子。机长不能不露面了。此时，飞机已经降落在芝加哥奥哈里国际机场，时间是下午1点半。

机长 50 来岁，高挑壮实的身材，说话礼貌但却透着狡猾：“我是机长尤金·特纳。很高兴认识你。你忠于职守的精神令人钦佩……”

相互寒暄之后，何存峰直接了当地指出：“我的同事和两只外交邮袋现在都被扣留在贵机的阁楼上。希望机长本着民航客机的服务宗旨，施加影响，将我的同事和两只外交袋送回，并确保顺利抵达目的地。”

“杨先生要求政治避难，并表示要携邮袋去台湾。”

何存峰再次予以义正辞严的驳斥：“他正在执行紧急公务，说明官方是信任他的，不存在所谓的‘政治避难’问题。如果他擅离职守，另有企图，那他已丧失信使资格，外交邮袋当然应该交还给执行任务的信使。”

机长理屈辞穷，神情尴尬，但仍在作最后挣扎：“杨先生要拆包取文件，建议你们一起下飞机。您可以当面监督杨先生拆封，然后换机去纽约。”

叵测居心，昭然若揭！何存峰头脑中的弦绷紧了。他思如电闪，一遍遍筹谋着对策，不久就有了主意。

“外交邮袋他人不得予以拆开或扣留，这是公认的外交关系准则。如果我们的外交邮袋被无理拆封，美国政府和机长先生本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他凛然正义，继续坚持原则立场，“我是贵班机的旅客，我的目的地是纽约，不到纽约决不下飞机。”

机上出现僵持局面，机长无可奈何，一筹莫展。

2 点钟以后，美国移民局及国务院官员先后登机。他们认真听取了何存峰的陈述和解释之后自知理亏，但仍然话不饶人：

“你的朋友不同意把邮袋交给你，他要带走。”

于是，何存峰第三次申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最后郑重提醒美方慎重从事，“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负责。”

在场的人无不为何存峰有理有节的谈判艺术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历折服。旁观的美国人群中也不时传出啧啧称赞的声音。

美国官员无言以答，一阵低声商议之后，其中一人走近何存峰不无遗憾他说：“你胜利了。”

何存峰终于取回了他视若生命的那两只外交邮袋。

杨水长被两名美国警察带走了，临行前他回头仅向何存峰说了一句话：“再见了，老何！”四年后的一天，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外交官在纽约的大街上碰见过他。他孤身一人，步履蹒跚，表情沮丧，精神萎靡，34 岁的人看上去如同年过半百。据了解，他一直住在难民营，终日无所事事。

从旧金山直飞纽约本来只需 5 个小时，结果花去 10 个半小时！直到当晚 7 时，何存峰乘坐的 PA72 班机才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何存峰躲过了一大群本以为可以猎取奇闻的记者们的追踪。

第二天，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发表了一条简短的电讯：

“读者密切关注的那两只外交邮袋，随同旅客行李一同在纽约机场被运下飞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人员在机场的行李输送带末端取走了行

李。他拒绝跟围着他的成群记者和摄影者交谈。”

但是对于飞机上所发生的事情真相，美国官员和西方各大通讯社均作了别有用心的歪曲。

事发当天下午，飞机降落芝加哥后，美联社记者都迫不及待地拨通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的电话：“今天，两名中国信使在飞往纽约途中发生争吵，致使飞机临时降落在芝加哥奥哈里国际机场。”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通知中国驻美使馆参赞：“今天，在从旧金山飞往纽约的班机上，一名中国信使叛变，要求带走外交邮袋，美方不同意，已将全部邮袋交给另一名中国信使。”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希望美方考虑到它的后果，绝对保证邮袋安全地抵达目的地。”中国参赞严肃而坚决地表明了态度。

美方作出了保证：“全部邮袋一定会安全抵达纽约。”

第二天，合众国际社、法新社作了同样报道：

“泛美”民航客机的工程人员尤金·特纳先生说，中国一名外交信使要把外交邮袋“卖给台湾政府”，两名中国信使为了争夺外交邮袋在机上大声争吵……

机长于下午1点30分奉联邦民航署的命令，将客机降落在芝加哥。

事情果然有后台老板在操纵，正如驻华盛顿的外交分析家所推断的那样，扣留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邮袋，临时改变航线，泛美航空公司绝对没有这个胆量！

事发之后，中国有关各方就这一事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26日上午，外交部部长助理朱启桢在北京紧急约见美驻华大使恒安石。朱启桢指出：“根据维也纳公约，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不受任何方式逮捕或拘留。在执行任务期间，信使本人和邮袋还受到有关国家的保护。发生此次意外事件，美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恒安石表示：“美国政府始终非常小心地保护外交人员和他们的财产的安全，美方会按照国际关系准则处理此事的。”

27日下午，中国驻美大使馆冀参赞约见泛美航空公司高级副总裁马谢斯：

“贵航PA72班机故意改变航线，公然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扣留我外交邮袋达四小时之久，阻挠我信使何存峰执行公务，并向记者提供歪曲事实的消息。对此，中国方面感到十分吃惊和不满。请马谢斯先生作出解释。”

这位马谢斯先生避实就虚，一番高论相向：

“我不理解PA72班机为什么那样做。我将立即向总裁报告，并向参赞先生作出解释。”

28日上午，中国驻美大使馆张参赞约见美国国务院官员指出：

“据报道，‘泛美’以两名信使‘发生争吵’影响旅客安全为由，改变

航线降落芝加哥是没有道理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杨水长下飞机离开座位时，何存峰去了洗手间，杨水长下飞机前机组人员一直蛮横阻拦何存峰去见杨水长。两人不在一起，争吵由何而来？”

那位美国官员也承认何杨二人未发争吵，但辩解说二人情绪紧张、激动，令人担心会影响安全，从而使机组人员决定改变航线。

“杨水长、何存峰没有发生争吵，根本不可能影响飞机和乘客的安全，机长决定改变航线降落芝加哥的行动，显然是得到美国有关部门的认可。”

最后，这位美国官员不得不表示，“我将进一步调查这件事，尽一切努力使它不致于发展成两国之间的问题。”

冀参赞不久又约见这位美国官员，就美方扣留我外交邮袋一事正式提出强烈抗议，并再次要求作出满意答复。

对方心虚气短，除了作出一番辩解和对中国抗议表示“失望”之外，唯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有了口头保证，难道就会不出事吗？

1985年11月6日上午10点，美国休斯敦机场约莫四十平方米的一间头等舱候机室。张、王两信使在中国驻休城总领事馆李领事和司机赵师傅陪同下正在等候登机。

由于口渴，其中三人分头去弄饮料，留下张一人看邮袋。为了保险起见，张把邮袋拉到了腿边。

两分钟后，取饮料的三人回到座位。正在这个时候，走过两男一女三个美国人，其中一男一女与他们搭话。赵师傅不懂外语，没有接腔，当他与张递接饮料之后，突然发现邮袋不知去向。三个美国人即刻也无影无踪。

四位公务在身的中国人挨门挨角地找了个遍，但均无所获。他们只好一边向机场方面报警，一边打电话向总领事作了报告。

经过交涉，机场当局和警方又四处找寻了一遍，依然不见邮袋。

案件上报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但直到二十一天之后，邮袋才有着落。

但中国总领事馆领取到的邮袋，却是遍袋泥土，袋口拆封！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一次遭到了美国鬼子的暗算！“好在中国人“吃一堑，长一智”。中国信使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邮袋事件了！

这只是后话。

信使何存峰遇险不惊，智勇应变，不辱使命的事迹传回国内，受到普遍欢迎和赞赏。有关部门给予他通报嘉奖，并记大功一次，晋升两级工资。

“西方人的的确确是魔鬼”

随着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窃听与反窃听已成为现代情报战的重要手段和内容之一。

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相左，美国对中国在发展正常合作关系的背后一直潜伏着深度的不信任。

伴随着双方交往增加，人员互访尤其是政界高级人士互访接连不断，中美之间的情报战也在不断升级。美国人不时流露出对自己的“秘密”被中国人获取的担心。

曾几何时”在华盛顿的白宫里，即流传着一种十分肯定的说法，称美国人到中国后私下所谈的一切都会被窃听。

1983年9月入秋，北方正值收获季节，到处泛着金黄，洋溢着成熟与安详。中美关系的发展合着自然的节拍逐渐向更高层次迈进。北京第四次迎来了里根政府的贵宾。

应中国方面邀请，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于25—29日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双方拟就相互最关心的军事合作和美国对华军事技术转让问题进行具体磋商。

温伯格偕夫人同行，并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其中包括国防部负责太平洋事务的助理部长、总法律顾问、负责技术转让程序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帮办和数位将军，以及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人把这次访问看得非常重要，但认为要使这次访问成功地促成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还有很大的困难。

美国一直把对抗苏联的威胁作为促进与中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动力。在他们看来，中国“对共产主义思想和教条的遵从没有丝毫的松懈”，而且，“中国人非常自傲，并从内心深处把其他国家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年轻国家看成是暴发户。在他们实际要求某种东西之前，很可能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美国代表团虽然人在中国，但却心存异念，对中国方面怀有明显的防范之意。

为了防止臆想中的中国人“窃听”，温伯格的军事代表团携带了一批使用方便的专门声音“保护器”。据说，这种保护器有点像从前医院里施行麻醉手术时用来输送乙醚的面罩，所以，美国人自己称它为“乙醚面罩”。当事人在罩里谈话，彼此能听到对方在说什么，但外面窃听的人却听不见丝毫声音。

抵达北京后，中国方面为美国人在钓鱼台国宾馆安排了舒适的住处，一个美国代表团共住了三幢小楼，楼里有宽敞的过道和高大的门廊。三幢楼与其他楼相距均不大近。但是，美国人仍然怀疑他们在房间里的说话会有人窃听或偷听。因此，他们常常关起房门钻在从美国带来的“乙醚面罩”里谈话。到此地步，美国人还不罢休。中央情报局居然还帮他们在房间里安装了噪音机。噪音机固定在桌子或其他家具的底部，每当受到谈话声音的震动，便不断发出刺耳的嘈杂声。

有一次，温伯格正在房内与自己的同僚戴着“乙醚面罩”谈话。一位中国女服务员来到走廊上，准备清扫房间。当她听到室内传出神秘的咕哦声时，

便很有礼貌地匆匆离开了。温伯格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他一贯想要在中国人面前树立良好形象。不曾想，这一次却因小失大！他担心，这位中国女服务员一定会将她所经历的这件事传扬出去，从此，就会有许多中国人确信：

“西方人的的确是魔鬼！”

1984年4月26—30日，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西方的魔鬼”又一次在中国出现。里根就连在与工作人员进餐时，也念念不忘“让一架录放机大放嘈杂的音乐以预防暗藏的窃听”。

事实与美国人的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中国对与美国发展军事合作关系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

美国代表团刚下飞机，中国方面就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官员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随后，中国又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前举行了盛大的正式欢迎仪式。为了照顾美国人的感情，中国人搬走了过去长期摆在博物馆前显著位置上展览的一架美国旧飞机，这架飞机是在越南战争期间被越南共产党军队击落的。

中国人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场面壮观的欢迎宴会”，“至少有十八道菜”。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本来就非常喜爱中国菜，后来他承认这一次“得到了极大的享受。”

从此开始，“东道主越来越热情”。后来，温伯格还与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友情”。温伯格感到，张爱萍将军“对我的热情和体贴是我在访问世界其他地方时所从未遇到过的”。

不久，中国总理赵紫阳和军委主席邓小平也先后会见了温伯格一行。

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赵紫阳总理提到台湾问题，他申明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并郑重指出这一问题未来中美良好关系的障碍。

温伯格除了重弹美国政府的老调，称美方愿意遵守“8·17公报”，同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不做任何违反公报和加强台湾军事能力的事情之外，每次总是迫不及待地“转移话题”，并“显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后来，温伯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辩解说，他当时“正在仔细琢磨赵紫阳的话”！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有关军事技术转让等关键性问题的谈判中，美国代表团一直坚持按其自己条件拟定的方案，确定他们愿意转让的特定项目，进而在政府间开展合作，而中国方面需要的则是附合本国实际的技术转让项目，这些项目合作的进一步实施也要求直接与美国的公司甚至生产厂家进行谈判，因此，谈判陷入了僵局，直到最后仍未达成实质性协议。

温伯格后来供认，美国对华军事技术转让早有底盘：一是项目限制，一是以中国承诺保护美国提供的技术为条件。“我们的许多项目是受限制的；我们又没有一种跟踪记录方式可以确定中国人愿意保护我们所提供的技术。”

美国名义上宣布把中国列“友好的非盟国”，但在暗地里，美国国防部直到1988年仍然把中国排在敌对国家的名单里。

1988年1月25日《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机密文件称，国防部已经裁定，中国“过去一直、现在仍然被看作是一个与美国有着相反利益的国家”。这与美国多年来公开表示的立场是根本矛盾的。

一语道破真谛。这正是美中军事合作关系谈得广而多、做得少而慢的症结所在。

只是美国人并不想将真相公之于众。所以，一俟《纽约时报》作此报道，美国有关各方接踵表态，力图为自己洗刷名声。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克里斯·鲍曼当天就向记者宣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我们谋求与之建立长期军事关系的友好的非盟国”。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克利谈到中美关系时也表示，美国“仍然认为中国是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仍然相信改善美中关系有助于两国的利益”。

温伯格首次访华时，两国开始商谈发展军事合作关系，但直到九个月后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回访时，中美才正式签署第一个军事技术合作备忘录。此后，美国虽然公开里一再表示放松对中国转让武器和制造技术的限制，同时一直在与中国谈判促进中国国防现代化、加强中国防御能力问题，但实际做到的只是向中国提供少量的武器零部件和装备。

在两国军方高级领导人不断互访的推动下，双方在一些存有严重分歧的问题上达成了谅解。

但是1986年以后，由于美国借中国向沙特出售中程导弹和所谓的中国对伊朗转让“蚕”式导弹问题，中美关系再度出现波折。美国于1986年10月单方面宣布停止审议向中国转让高技术，直到1988年3月吴学谦外长访美后始又恢复审议，同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访华时双方才就这一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到此为止，漫漫六年，美国对华军事技术出口项目累计仅三十个，包括军备生产合作项目在内的对华军事装备和武器零部件销售额总计仅约十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对台军售数额历年均在五亿美元以上。

对华技术转让，尤其是涉及到军事的高技术转让，是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美国国内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美国国内尤其是军方赞同扩大对华技术转让的人心中有数。温伯格1987年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后，曾经不无遗憾地断言，“（美中）两国要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实现军事关系的根本性突破仍需要时间和耐心”。

揪住一只只黑手

里根时期，为了配合美国政府对外实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加紧活动，四处网罗代理人，攫取机密情报。

中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次大规模间谍活动中的重要一环。中央情报局

委派东亚问题专家约翰·吉尔胡利出山专门负责向中国派遣特务(谍报人员)或在中国就地招募特务,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中国活动期间,采用了各种能够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如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海上救生艇,美国人后来承认其中“大部分高技术装备都是直接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

据中央情报局日后透露,约翰·吉尔胡利在中国进行的间谍活动获得了“极好的成功”。这种“成功”的突出表现就是,美国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上建立起系统的情报网络。1989年春夏之交,中央情报局正是通过这一网络与中国国内的极端分子相勾结,不仅在“6·4风波”中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而且事后又策划并组织了代号为“黄雀行动”的所谓“民运”人士大出逃。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央情报局在中国招募特务、窃取中国机密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一桩桩阴谋败露之后,一只只黑手被牢牢地揪住。

新华社1983年5月15日报道,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已于4月29日判处为美国充当间谍的罗承勋十年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罗本人则于5月14日认罪并放弃上诉。

这是自1979年建交以来,在中国受到处理并同时被曝光的第一宗美国间谍案。

罗承勋又名罗孚,时年62岁,中国公民,案发前为香港中文日报《新晚报》的总编辑。

作为中国一名高级知识分子,罗承勋长期恩承中国党和政府,但他却浑忘国家大义早有年数。这是一出悲剧。它的发生无疑给中国人敲响了一记警钟。

罗早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在1981年就已当选为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和重用。

在香港任职期间,罗结交了许多外国人,并且同许多有头面的台湾人物过从甚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罗迷失了方向,为网罗所乘,被美国间谍人员拉下了水。据查证,他在数年前就开始为美国提供有关中国政治、外交和军事情况的重要机密情报,并定期领取间谍活动经费。凭着这些不义之财,再加上积攒下来的收藏品售卖收入,他在英国购置了房产。

案发后,罗承勋坦然认罪,不提出上诉,显露出悔悟服法的态度,虽不能以此脱罪,但着实不在众多善良人士对他不幸堕落的痛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对间谍罪的处罚通常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鉴于罗认罪服法的良好态度,中国政府对他从宽处罚,从轻判刑。

时值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和胡娜事件发生不久,中美关系正处低潮。

中国方面在处理这一间谍案件时采取的是低调子、高姿态的做法。

中国人就事论事,只是经由新华社公布了罗承勋因为充当美国情报机构

的间谍并向美国提供有关中国的机密情报而被判处徒刑的事实，含蓄地指责了美国。

中国政府方面始终没有就此案件发表任何声明，从未正面或直接地谈及美国在这一间谍案件中所起的作用问题。

中国“没有理由对这件事不作声张”，之所以低调处理是为了不使本来就紧张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美国人心虚气短，乐得来个息事宁人。

国务院一直拒绝就这一案件发表评论。

合众国际社在报道该案时也较为如实客观，并且还借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作为评论，称中国对这一案件的处理“不过是时代的趋势”。

其他有关方面一改往日良遇事时的谩骂或吵嚷，均是作壁上观。

看得出来，美国方面从它的切身利益出发也不想使已经降温的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不几年，第二件美国间谍大案又发生了。

1986年7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约翰·伯恩斯被中国警方拘留。据新华社报道，中方拘留伯恩斯是因为他此前不久到四川省旅行采访时擅自进入一个“不准外国人进入的地区，并进行了搜集情报的活动”。

伯恩斯时年41岁，他出生在英国，持英国护照。早年当过《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和约翰内斯堡分社社长。1984年11月开始，任该报驻北京分社社长，在此之前曾于1971—1975年作为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的记者在中国工作过。《纽约时报》总编辑罗森塔尔称赞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记者，尤其对中国的情况有着“杰出的了解”。

伯恩斯被拘留后，中国方面及时通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并且表明了“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即作出处理”的立场。

因此，美国政府的反应较为谨慎。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只是较有分寸地表示美方正在“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并称已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馆“表示了它的不安”。

《纽约时报》总部曾在事发前夕与伯恩斯通过电传、电话取得联系，事后双双一口咬定：

伯恩斯这次外出旅行“纯属记者性质的活动”。

第二天，该报总编辑罗森塔尔和国际部主编沃伦·霍格匆匆飞抵北京与伯恩斯会面，要求中国方面尽快解除拘留。

罗森塔尔甚至还危言耸听地威胁说：

“中国拘留伯恩斯对中美关系不是一件好事。拘留时间越长，情况就会越糟。”

中国公安机关用了短短五天的时间就查清了伯恩斯严重违反中国法律的事实：伯恩斯在旅行采访时进入了军事禁区并拍摄了大量照片，这种行为实

际上构成了收集情报和间谍活动。

7月23日，中国方面发表声明公开了上述事实，并宣布将伯恩斯驱逐出境。

当即，伯恩斯由中国方面送上中国民航班机经香港离境。

尽管伯恩斯一案性质严重，但中国方面从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始终采取了克制态度。

案发时，中国有关部门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根据伯恩斯的违法行为迹象，依法将其拘留，并收缴他的记录本和摄影胶卷予以审查。

在拘留期间，伯恩斯受到良好待遇。他被允许会见所有的人。凡是会见过他的人都说他“非常健康、精神很好”，他的妻子甚至称他“就像是一名拥有特权的犯人”。

案情查清后，中国方面坚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宽处理此案，尽量减少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本着这一原则精神，中国有关部门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追究伯恩斯的刑，事责任，而是决定将他驱逐出境，并提前向美方作了通报。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始终未就此案对外作出任何公开报道。执行这一决定时，中方仅发布了一则简短消息，说明他进行了与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而被驱逐出境，但未公布案情的任何细节。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显示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极大诚意和善良愿望。

国际社会对此普遍表示欢迎。有关方面及个人对中国方面迅速而宽大地处理伯恩斯案件均“感到高兴”。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中国驱逐伯恩斯的当天发表评论，称：

“我们对这一事件得到解决感到满意。”

“我们对他的获释感到高兴。”

就连事主本人伯恩斯也承认中国是“理智地处理了这件事”，并且表示这件事不会影响他对中国的美好印象。

抵达香港时，刚下飞机的伯恩斯遇到一大群记者的包围。情急之中，他来不及思索就脱口而出，承认自己在中国“可能无意中进入了军事秘密区”。

稍作镇定之后，他意识到了发生的事，于是又为自己作了一番辩解。

他说他是带着“最良好的意图”去旅行的，但是由于“把中国的容忍限度估计错了”而陷入困境。

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自责，细品之下即可发现其中暗藏玄机：“可能无意”或许就是多多少少的“用心”了吧！

狐狸尾巴刚一露头就被机敏的猎人逮个正着！

记者们接着追问：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记者，你是不是知道或至少是应该知道进行旅行必须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特别批准？”

伯恩斯先是躲躲闪闪地不肯明确回答，只是含糊其辞说道：

“中国方面认为我们提供的证明不充分。”

他强调不愿意就此作出详细说明。

随后，伯恩斯推说大疲劳，拒绝了香港新闻界提出的安排他在机场记者室接受采访的要求。

据悉伯恩斯“在机场上只说了数分钟的话”，步出机场时，“精神良好，未有疲倦”。

然而，世间人物与事象总是良莠不齐。

在伯恩斯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国际上仍有人制造舆论，攻击中国。

在西方，极少数惟恐天下不乱的人趁机挑拨离间，诬称中国是故意将“间谍”罪名强加于伯恩斯头上，是“杀鸡做猴”，目的是想通过“对外国人及中国人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划出一道界线”，以给不时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的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公道自在人心！

一些正直的西方外交官就此发表评论时十分肯定地指出：

“这个案件不可能是试图向华盛顿施加压力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这对中美关系不会有任何长期的影响。”

他们同时预言，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政策今后也“不会超出常轨。”

至此，是非黑白终于见了分晓。

时隔不到一个月，中国再次传出爆炸性新闻：

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桩新的间谍案，案犯是67岁的美国公民卢顺序。

1986年8月23日新华社报道，美国公民卢顺序由于从事间谍活动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十二年的徒刑。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就此事发表谈话，矢口否认美国政府与此案有关。

毕竟人有一张脸、树有一张皮。屡屡浸身丑闻的美国佬，这一次为了自己的颜面索性使出了一招“金蝉脱壳”之计！

1987年1月30日，美国公民、受雇担任法新社记者的麦乐仁因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事发后，美国政府不仅不表示感到“遗憾”；而且反咬中国采取这一措施是“鲁莽行动”。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只要美国政府不放弃它的称霸世界的强权政治立场，美国情报局的老车卒子们就不会停止在世界各地刺探、窃取机密情报，破坏他国安全的间谍勾当。

这里只是从美国情报机关间谍卷宗中摘取的些微片断，但却是美国境外间谍活动的完整缩影。

不管美国“老板”在幕后苦心煞费多久、黑手伸出多长，他们的境外情报网点终都逃脱不了被摧毁的必然命运！他们“栽培”起来的贩夫走卒，不管伪装得多么巧妙、高攀到什么样的位置上，终都难逃法网，受到应有的惩罚。

罚。

从此以后，正是由于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美国情报机关在中国的情报活动尽管没有停止，但却变得更为收敛，并因此更加具有隐蔽性。

由此来说，中国的反间谍任务与过去相比显然也就变得更为繁重而艰巨。

第五章 风云变幻

由于原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90年代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强烈冲击着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加之“六·四事件”使中美之间的隔阂与疑忌与日俱增。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使美国人感到既恨又怕，为了对抗所谓的“中国威胁”，他们不断打出“人权牌”、“西藏牌”和“台湾牌”，企图通过施压使中国屈服，进而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昨天的“东亚病夫”，美国的任何侵犯都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猛烈反击。中美两国就是在这种对峙与缓和，压迫与反抗的气氛下走过了一程又一程……

第一节 风云突变

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布什是有名的“中国通”。他在1974年作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曾亲眼目睹了中美关系发展的转变过程。在中国度过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使他对中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无论从政治利益，还是从个人情感上讲，他都强调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性。但由于“六·四事件”及随后出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中美关系已经不可避免要发生，逆转。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实在太快……

“我们又回来了”

2月25日下午4时许，一架波音747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舱门开处，从飞机里走出一对满面笑容，频频挥手的60多岁老人。原来他们就是刚刚就任美国第41任总统的乔治·布什及其夫人芭芭拉·布什。这时，站在舷梯旁专程来迎接布什夫妇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迅速走上前去与布什热烈握手，然后，他们乘坐一辆加长的奔驰轿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下榻。

布什此行可谓是故地重游。1974年9月，布什偕夫人芭芭拉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北京。布什当时受福特总统的委派，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因为他一直在争取这个“富有挑战性的职位”。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布什夫妇不仅认识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而且也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中国秀丽的山水和纯朴的人民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汽车在飞速行驶。一路上，布什夫妇不停地与吴副总理谈天说地，显得异常激动。在他的谈兴正浓的时候，他们的车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布什向窗外望了一望，只见广场上站着许多围观的群众，这些人看到布什一行从天安门经过，都非常友好地向他们挥手。

“ 副总理先生，我想下车走一走，您不介意吧？” 布什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执意要下来步行。

“ 这…… ” 面对着布什突如其来的要求，吴学谦也有些为难。由于事先没有准备，万一安全方面出了什么差错，这又如何是好呢？但看到布什诚恳的样子，吴学谦也就不好拒绝，“ 您请便吧！”

布什的请求得到吴学谦的同意后，马上打开车门，随即走向欢迎的人群。

“ 这个人我早就认识，” 布什指着一位高个子中年男子，“ 十几年前我们就见过面。”

“ 您的面孔也很熟悉，我好像在那里见过您。” 布什握着另一位老年人的手，“ 看上去您还和十几年前一模一样，”

就这样，布什从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走到了中山公园附近。此时的布什已经完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以致在数分钟后，当他回到车里直接去钓鱼台国宾馆与李鹏总理会见时，他嘴里仍不停地叨唠“ 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布什这次“ 回北京”，当然不仅仅是“ 回来” 与街头上的平民百姓叙旧聊天，他此行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便是赶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赴京之前，摸清中苏关系的发展脉络，看看中苏关系发展是否会对美国利益构成新的威胁。果然，在此后的历次会谈中，除中美关系之外，两国领导人更多地谈论了中苏关系。在 2 月 26—27 日两天时间内，布什先后同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李鹏、赵紫阳等人进行了几轮会晤。27 日上午，他又到人民大会堂拜会了中国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邓小平，从而把这次访问推向了新的高潮。被国外新闻舆论称为“ 最高级会谈” 的邓小平与布什的会晤果然不同凡响，先从双方出场的人员便可以看出这是一个“ 超豪华” 阵营：中国方面除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之外，还有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外交部长钱其琛等，而美国方面参加会见的也有国务卿贝克、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等。

当天上午，邓小平作为东道主，早早就等候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11 时许，布什一行来到大厅门口，随即快步走上前去，与邓小平紧紧握手。由于两人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认识，因此，会谈气氛特别轻松，随便。

“ 你这一趟亚洲之行真是相当辛苦，但看得出来，你的身体好得很嘛。” 邓小平抬头看了看布什，亲切他说。

布什看了看眼前这位饱经沧桑而至今仍精神矍铄的老人，心里充满着敬畏，但他也不愿意在比他年长整整一轮的邓小平面前显示出自己的疲惫和倦意，他说：“ 我们虽然经过长途跋涉，但丝毫感觉不到疲劳。”

“ 看得出来，你的身体很好嘛。” 邓小平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向布什说道：

“ 我每天都骑自行车，这种活动方式对我的健康很有帮助。” 布什挥动了一下他的胳膊，做了一个很有力的手势。

“噢，这种活动方式很激烈，我个人却比较喜欢打桥牌。”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听说您的桥牌打得很好，比我好多了。我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打桥牌。桥牌太难，太复杂。当然，我知道，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现在你当了美国总统，打桥牌当然就更困难了。我知道，你们美国的总统可不好当，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当的‘世界冠军’了。”邓小平又开始发挥他的幽默才能。果然，这句话一出口，在场的中外嘉宾也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看到今天邓小平精神这么好，布什也更加活跃起来。

“我的工作是比较忙一些，不过这份工作还比较有意思。”布什说到这里，也有意识将谈话切入正题。“我这次访华时间虽然很短暂，但你们的安排都很周到。刚才我和李鹏总理进行了极为有益和有意义的会谈。”

“你这次工作访问，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但比正式访问还重要。”邓小平说，“希望你今后在适当的时候正式访问中国。”

布什环顾了一下会见大厅，然后若有所思他说，“现在世界局势变化很大，这给我们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

接着，他话锋一转，便提出了戈尔巴乔夫的北京之行。“我个人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感到高兴，我认为这是件好事，相信他能从你们这里学到很多东西。”

布什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有点漫不经心，但他那种强作镇定的脸部表情依然掩饰不住他内心的焦灼与疑虑。作为美国总统，他眼看着近年来中苏关系的一步一步改善，他能够无动于衷吗？要知道，中苏两国关系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他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下来，并用眼角余光看了看邓小平，试探一下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反应。

对于布什的提问，邓小平显然也是有备而来。他从布什的眼神里分明看到了美国人对中苏关系的极大关注，只见他微微欠了欠身子，开始向布什说明中国对改善中苏关系的考虑，以及中苏关系改善对世界局势产生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15日到达北京，我们还不清楚他将带来的礼物有多少，甚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个事情会怎么样，我们都不了解。”

邓小平的意思分明是告诉布什等人，中苏关系还充满了未知数，美国人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而现在最为关键的是要解决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他就这样谈了几句中苏关系之后，马上又将话题切入中美关系：

“我个人希望在你的总统任期内，中美关系能在一种新的格局下向前发展，我不是讲战略关系，我是讲两国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尽量减少我们之间的麻烦。麻烦总会有，但可以减少。”

布什好不容易将话题扯到中苏关系，而经验丰富的邓小平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个话题，这使得布什再次着急起来。他在座位上不停地移动着自己的身子，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再次将话题引入中苏关系。

“新闻界有人说，我之所以访华，是由于戈尔巴乔夫要到中国来的缘故。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来华访问，是因为同意你对我们两国关系的看法，美中两国关系应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说到这里，布什显得有些激动，他两眼直视着邓小平，并向他表示：“我向你保证，在我的四年任期届满时，中美关系一定会比现在更牢固、更好。”

看到布什激动的样子，邓小平知道，这次不向他谈谈中苏关系恐怕是说不过去了。再说布什已经亮出了美国政府对华关系的底牌，无论如何也必须向他解释一下中苏关系的变化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特别是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不会有任何背着美国达成的交易。

“中苏关系由于经历了历史上的许多风风雨雨，不仅积累的问题很多，而且这些经历对中国人民的心理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

邓小平开始向布什等人讲述了中国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指出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凌辱，其中给中国造成伤害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则是俄国。“日本人屠杀了我国数千万同胞，而俄国人则占领了我们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要我们完全忘却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但两国关系如何发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特别是苏联还没有从阿富汗和蒙古撤兵，也没有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之前，中苏关系便会大打折扣。”

说到这里，邓小平有意停顿了一会，然后神情庄重地向布什说：“中国要求改善中苏关系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来作出这样的战略抉择。这不是打什么牌，也不是权宜之计。”

真是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到邓小平的这番话，布什等人心中的疑虑也就开始冰消雪化了。

“你和我谈话的这一个小时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十分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了解这一背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不久之后，我们将要就苏联问题作出重大决定。”布什非常激动地对邓小平说。

随后，布什将目光投向邓小平，并做了一个非常坚定的手势，“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不管是战略武器的，还是常规武器或其他问题的决定都不会只对西方有利，而损害中国的利益。”

这时候，原计划的100分钟会见马上就要结束了，邓小平习惯性地看了一下后面的翻译，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布什说：“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统而言之便是如何保持政局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会落空，即使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希望外国朋友能理解这一点。”

但遗憾的是，不知布什等人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而无法理解邓小平的良苦用心，还是当时压根就没有重视邓小平最后说的这句话。他在会见结束时，只是非常动情地说了一句：“您刚才讲的这段历史对我们十分有益，非常感谢您。”而对“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却没有作任何反应。而且，在中国发生“六·四”事件之后，美国很快便作出了强烈反应，并导致了中美关系急

转直下。如果当时有人认真分析过邓小平的这番话，也许可以避免这次历史性的悲剧。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说，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往往都是这样阴差阳错，让人难以捉摸。

“六·四”风波吹皱一池春水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影响很大的动乱。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中，美国一开始便深陷其中而难于自拔。他们在动乱之初，采取的是静观其变的策略；随着动乱的逐步升级以及后来发生暴乱，美国人已经无所顾忌，决定赤膊上阵，直接干涉中国内政，从而将中美关系推向了新的深渊。可以肯定地说，“六·四”事件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在此后的几年内，这层阴影一直困扰着中美关系发展。

1989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同志逝世后，中国各地相继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一些地方还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当时的布什政府因为顾及到中美关系大局，特别是5月份戈尔巴乔夫访华，如果美国过分挤压中国，可能促使中苏进一步接近，这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国行政当局在学潮初起之时态度较为克制，并没有直接表明其立场。

然而，在中国政府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局势趋于好转时，美国政府便开始站出来发表评论。

4月28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就中国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发表谈话。他说：“（布什）总统所相信的首先是这些原则——言论自由、集会的权利和那里（指北京爆发的学潮——摘译者注）正在要求的诸如此类的原则。美国一直说我们支持和平集会的权利，其中包括和平抗议和表达自由。我——我知道总统也会——希望示威活动保持和平，希望中国当局在对付他们时采取克制态度。”

从菲茨沃特的这番话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介入这场风波，更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对此袖手旁观。其实，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即希望中国的学潮能促成他们所期望的“和平演变”，使中国走上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之路”。

1989年5月5日，美国白宫前面人头攒动，布什总统也开始对中国局势发表评论。

“我本人当然赞成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而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也赞成参加学生们所提出的要求。从1975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我对中国的某些变化感到高兴……但他们还有根长一段路要走……我希望鼓励中国，或者苏联，或者其他集权主义国家在民主的道路上尽快地往前走。”这番话便很耐人寻味。

由于美国政府不便于亲自出马干涉中国内政，于是，美国的新闻媒体，

特别是臭名昭著的“美国之音”便充当了反华鼓噪的急先锋。他们在动乱之初，即连篇累牍地报道学潮的最新动态或者由他们自己撰写的新闻评论。但不久之后便觉得这样做似乎意犹未尽，从5月份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台便加开了七个短波频道，广播时间由下午7时到次日凌晨1时连续不断地播出；他们还开设了一个中波频道，目的是“使所有中国人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由于“美国之音”的推波助澜，各种谣言和谎话便随着他们的电波铺天盖地向中国飞来。

与此同时，由美国反华势力组成的“红光摄影队”也开始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他们手里拿着精密的摄像器材来往奔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搜寻可供选择的反华素材。随后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利用现代摄像技术进行一番切割重组，并通过卫星随时向美国传送。美国各种新闻媒体利用“红光摄影队”提供的有关材料，发表了大量反华言论。同时利用各种现代化通讯手段，将这些材料送回中国，以期将中国局势搞乱。

5月19日，也就是中国宣布实行戒严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派出军队对付北京学生请愿表示遗憾”。声明还要求中国政府继续与学生进行对话，努力采取克制态度，尊重诸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白宫发言人甚至反复要求中国政府“在日益严重的危机面前保持克制”。从而走出了这段时期干涉中国内政的第一步。

5月21日，布什与来访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会谈时也讨论了中国当时的局势，随后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们支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我要敦促中国政府尽可能顺应民心。因此，我希望中国学生以和平方式继续为信仰而战。”

5月24日，美国众议院口头通过了由纽约州民主党议员索拉兹提出的一个议案，赞扬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有意义的运动之一”。这份议案还呼吁中国政府尽量避免使用武力来解决危机，而应该与学生进行对话。决议还进一步要求中国政府结束戒严，停止拘捕、监禁、起诉或者用其他别的方式惩罚参加这次“民主运动”的成员。

后来，索拉兹在解释这项议案时说，他之所以提出这项议案，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要让中国领导人知道，如果对参加示威的群众采取暴力镇压或大规模拘捕则会给中美关系带来“非同小可”的影响。他还说：“只要把自由的巨人放出了压迫它的瓶子，再把它关起来就不容易了。”真是一语道破天机，美国政府以支持中国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作借口，实际上是想让“自由的巨人释放巨大能量”，实现中国局势的和平演变，这才是其真正目的。

6月4日，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强制行动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美国国内到处都充斥着“红光摄影队”提供的大量关于“中国政府镇压学生的”的各类图像和文字资料。这些材料既有不顾客观事实的猜测臆断，也有别有用心者的讽刺与评论，而且都带有明显的偏见，具有极强的煽动性。美国舆论不仅大肆渲染中国军队“血洗天安门”的所谓“事实真相”，还多次制造谣言，

声称中国领导或死或逃，甚至说中国军队内部发生严重哗变，各部队之间直接发生冲突等等。在这些报道的误导下，许多不明真相的美国人群情激愤，美国政府也为此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

“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当即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政府“非常关注”中国军队“镇压人民的这起不幸事件”。美国民主党议员索拉兹还要求美国政府召回其驻华大使，停止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不再进行商业往来。他还威胁说，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国会将单方面采取行动。参议员赫尔姆斯也表示应该停止与中国的一切合作，同时对中国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

6月5日，正在缅因州休假的布什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残酷镇压和平示威的行动”。

“作为民主运动的支持者，美国将奋力反对这种残暴。”布什语调激昂在表示，“美国政府不能原谅暴力攻击的行为，不能无视这种行为给中美关系造成的后果。”

他还当场宣布了一系列制裁中国的措施：

- 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
- 暂停美中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 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关于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
- 通过红十字会向那些受伤者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
- 根据中国事态的发展，重新研究中美双边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

6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100票对零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布什总统对中国政府进行国际制裁，这项议案的具体内容包括：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审查资助与中国贸易情况；强烈要求美国负责放宽输入中国产品的机构在作出决定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要求“美国之音”立即增设华语节目。随后，美国众议院也通过了同一决议。

根据美国国会的这项决议。“美国之音”于6月9日首次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两颗国际通讯卫星向中国发射电视信号，直播所谓“天安门事件真相”。他们还声称，这些信号可以覆盖整个中国境内的2000多个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而且这些地面设施大多由军队控制，所以他们的行动也是对中国军队进行策反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美国政府又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多次交涉，给予策划和制造这次动乱的首要人物方励之、李淑娴夫妇以所谓的“政治避难”，布什总统在解释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时还辩称，“当他（指方励之——引者注）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把他挡回去是十分困难的。”

6月20日，美国政府宣布采取对华进一步制裁措施：美国将寻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推迟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中止美中两国政府高级官员之间的所有高层接触。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解释美国政府为何要采取这些新的制裁措施时说，“这一行动是针对中

国当局为反对那些要求民主的人士所采取的暴力和报复浪潮而采取的。”“美国希望中国目前的悲剧能得到和平的结束，以及对话将代替那种猜疑和报复的气氛。”

针对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6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中国方面希望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任何一方面都不要做损害两国关系的事。

但是，美国方面的制裁行动并没有到此结束。6月29日，美国众议院再次以418票对零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份修正案除了继续使用极为尖锐的语言对中国进行攻击之外，还宣布要对中国采取一些制裁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将布什政府原来宣布的制裁措施法律化；把武器出售的禁令扩大到用于治安目的的装备；禁止向中国运送原定由中国发射的一颗美国卫星；暂停一项有关在中国促进投资与贸易机会的计划；禁止向中国出售核设备和核燃料；反对政府提高向中国出售的技术水平；建立一个特别小组讨论决定帮助留在美国没有资金来源的中国学生。

7月14日，美国参议院也以81票对1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的修正案，这份修正案除了部分重复众议院的有关内容之外，还采取了一些进一步行动：海外私人公司暂停办理贸易与保险；暂停使用美国资金支持对华贸易六个月。除此之外，这份修正案还通过了一系列不具约束力的建议，要求对中美各方面合作进行重新审查。

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美国还策划了一系列反华行动，如给阴谋分裂祖国、破坏国家统一的达赖喇嘛颁发美国国会的第一个人权奖“沃伦伯格奖”，并称美国国会为达赖喇嘛“争取人权斗争”的最有力支持者。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华势力还阴谋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方面发难，从而不断给已经非常困难的中美关系火上浇油。

7月15日，美国政府在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又鼓动策划这七个国家发表了的政治宣言对中国进行无理攻击。中国政府当然对此表示了“极大遗憾和不满”。

7月19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发表声明，对美国国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22日，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国会的有关决议。

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首次交锋

“六·四”事件后，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华势力不断给中美关系制造新的麻烦，其中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便是他们手中的一张重要王牌。

美国政府出于维护其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考虑，从1979年中

美两国正式建交后，即决定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

1979年7月7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规定双方在关税等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贸易待遇，即双方都向对方的商号、公司等贸易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等知识产权，允许对方在本国领土内建立金融机构。同时，两国商业机构还可以根据最惠国贸易待遇的相关原则开展各项业务，协商解决双边贸易纠纷等。同年10月23日，卡特总统发表公告，确认了中国符合最惠国贸易待遇的条件。次年2月1日，《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正式生效。

但是，“六·四”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华势力推出所谓制裁措施失效后，马上提出关于最惠国贸易待遇的问题，企图以此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重要筹码和政治工具，特别是在美国国会，最惠国待遇更是被这些反华势力炒得沸沸扬扬。

1990年5月24日上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大事务小组在国会大厅举行了一场中等规模的听证会，就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辩论。在这个委员会里麇集了美国国会中的一些死硬的反华分子，所以，这次听证会刚刚开始，马上便可以闻到浓浓的火药味。

按照惯例，这次听证会首先由政府方面陈述他们的立场。于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助理国务卿所罗门首先站了起来。

“布什总统认为，中国已经符合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有关移民问题的规定，因此，应该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所罗门一上来，马上便亮出了行政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将产生许多非常严重的后果。”所罗门非常肯定地说。接着，他从文件包中取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开始列举取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或者给这一问题附加条件可能产生的种种恶果。

“首先，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美国工商界将受到严重伤害。”所罗门有意提高了说话声调，“尊敬的议员先生们，你们应该知道，美国目前在中国有40多亿美元的投资，1989年向中国出口的商品达60亿美元。如果我们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势必会提高这些产品的关税进行报复，这将使我们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失去竞争力。

“其次，取消最惠国待遇将直接打击中国的改革派，而使那些强硬派找到新的借口，从而促使中国退回到十几年前的老路，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是极为不利的。”所罗门越说越激动，“而且，一旦取消了最惠国待遇，我们将失去一个可能对中国局势施加影响的重要筹码。

“一还有，香港的公司还可能在这场贸易战中也会受到意外的伤害，对此，我们也不能不予以考虑。”

所罗门刚刚讲到这里，坐在前排的民主党众议员兰托斯和共和党众议员波待便迫不及待地打断了所罗门的发言。兰托斯手里还拿着一份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的提案，大声叫嚷道：

“我必须提醒诸位注意的是，80年代初期，波兰共产党政权也曾实行过军管，正是因为我们取消了他们的最惠国贸易待遇，这才促成了他们的和平演变，此时此刻，我们为何舍近求远，不好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呢？”

这个时候，波特也接过话题，在听证会上大叫起来：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物资主要是玩具和纺织品，不从中国进口，照样可以从别的国家采购到；因此，一旦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受害最深的将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波特说到这里，整个听证会场出现了一阵小的骚动，许多人开始议论起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可能造成的得失。这些议员们都以攻击中国作为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会场气氛好不热闹。

这个时候，坐在大厅后面的民主党参议员佩尔也不甘寂寞。他眼睁睁地看着兰托斯和波特一唱一和，威风八面的样子，也不禁跃跃欲试。好不容易逮着了一个发言机会，他于是口若悬河，全面阐述了他的主张。

“依我看，我国政府应该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佩尔话音刚落，会场内马上嘘声四起。

“诸位别急，我说的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要附加一些条件的。”佩尔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方案，开始照本宣科，“我认为这些条件起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政府必须释放方励之夫妇，并允许他们安全离开中国；其次，中国政府应该释放全部在押的政治犯，包括一批‘民运人士，和争取西藏独立的那些人。另外，中国政府还必须停止骚扰目前还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并保证不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

佩尔的发言马上引起了一些反华势力的一阵喝彩。

此后，美国参众两院经过协商与酝酿，分别在5月底通过了这份“联合决议案”：即不批准布什提出的延长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的提案，同时又通过了有条件延长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及相关的四项修正案。

美国国会的这一法案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和不满。10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美国众议院决定取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将对双边关系及经贸合作产生破坏性影响。声明同时希望美国政府从中美关系的全面的长远利益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明智的选择。

根据法律程序，美国众议院通过这一决议后，必须再经参议院批准，并经总统签字方能生效。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总统出于对美国长远利益的考虑，多次找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多尔做工作，而美国商会和香港的美国商会也提出报告，强烈反对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或者对此附加任何条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美国参议院后来终于没有讨论相关议案。因此在101届国会闭会后，这一议案也就自动失效了。

1990年有关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的争论至此也就告一段落。但是，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并没有就此善罢干休。他们仍在四处活动，积蓄力量以图卷土重来。

1991年新年伊始，美国国会内的一些反华势力便开始上窜下跳，再次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向中国方面发难。

1月24日，纽约州参议院莫尼汉便向美国参议院财经委员会提出了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他在参议院的发言还指责中国政府不仅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而且不断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在对美贸易时也存在大量顺差。

3月12日，以克兰斯顿为首的十三名参议员提出了一份“共同决议案”，敦促美国政府警告中国方面“继续侵犯人权可能对最惠国待遇产生负效应”。3月19日，这一议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15票对零票获得通过。

4月11日，民主党众议员南西·佩洛西发表谈话，攻击中国政府“继续使用暴力压制持不同政见者，有计划地判处民主运动的领导人长期徒刑。”她还要求国会“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保护那些“高举民主火炬的年轻人”。为此，她还提出必须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一些条件：包括“释放所有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政治犯；停止宗教迫害；停止限制新闻自由；恪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等等。

进入5月份以后，这些势力更加活跃。1991年5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臭名昭著的共和党强硬派代表人物赫尔姆斯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文章，除了继续使用极为尖刻和恶毒的语言对中国进行攻击之外，还提出了应该立即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在这篇文章中，赫尔姆斯写道：“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府显然违反了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及民主标准，美国政府和人民有义务担负起中止这种野蛮行动的领导责任。而美国国会可以用拒绝延长对华最惠国贸易待遇的方式，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迫使中国就范。”

赫尔姆斯接着说：“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中国违反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有关移民自由的规定。大家不妨想一想，成千上万被不公正地关押在劳改营中的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这种移民自由”；

接着，赫尔姆斯还指责中国方面“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并对美国产品采取歧视性政策。不过，赫尔姆斯也非常无奈地表示：“由于中国拥有核武器，以及由于其他别的原因，美国不能对中国使用军事力量。但是，美国确实可以用其巨大而又开放的市场作为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因为中国越来越依赖美国市场以赚取维持政权所必须的硬通货。”

在此之前，赫尔姆斯还于1991年5月9日在美国参议院提出了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他提出的条件包括：承诺不输出核武器，立即参加核不扩散条约；释放全部政治犯；与达赖及其代表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尊重国际人权标准；停止向红色高棉输送武器等等。

7月10日，美国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了两项决议，反对布什总统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有关决定。其中一项议案是投票反对布什的无条件延长决定；另一项议案则附加了一些政治条件。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一议案立即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反对，7月11日，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众议院阻挠通过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

7月23日，参议院在推迟几天后仍然对这一议案进行了表决。结果以55票赞成，44票反对通过了有条件延长最惠国待遇的议案。随后，布什总统否决了这项议案，而参议院最终也没有凑足2/3多数再次推翻布什的否决，从而使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自动生效。

美国国会中的反华势力经过了这两次失败后并不甘心。他们随后继续在这一问题上不断发难。

1991年11月26日，美国众议院再次以409票赞成，21票反对的压倒优势通过了有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议案。这些新附加的条件是：中国政府必须释放那些以非暴力方式表达政治信仰而被拘留、控告以及判刑者作出说明；必须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否则，美国将于1992年7月4日起停止延长最惠国待遇。

此后，参议院也于1992年2月25日通过了这一提案。

在参议院通过这决议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92年3月2日，布什总统综合权衡了各方面利弊得失之后，派他的新闻秘书正式通知国会，再次否决了国会的这一提案。

此后，美国国会的反华势力还想再次进行反扑。但因为无法凑够推翻布什总统否决的2/3多数，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经过了三年风风雨雨，终于延续下来。

贝克的破冰之旅

90年代不仅是中美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而且在这段时期，中国国内形势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国际上看，1991年“8·19事件”使盛极一时的苏联顷刻之间便灰飞烟灭了，这样不仅使原来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荡然无存，而且在苏联瓦解后，代之而起的俄罗斯政府奉行了一种向西方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样便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失去了来自原苏联集团这个最大的心腹之患。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与分歧更加明显，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不断在人权、最惠国贸易待遇以及诸如军备控制、核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布什政府在这些强大压力下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在经贸问题上，布什总统虽然坚持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他同时也提出要根据美国的一些法律向中国政府的“不公平贸易”进行报复。

1991年4月，美国以中国方面没能有效保护美国在华的知识产权为由，宣布依据“超级301条款”将中国列为“重点国家”，并将进行为期半年的调查。美国方面还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没有为此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国将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大规模报复。

同年9月5日，美国海关总署采取突击行动，查封了中国驻美的二十五家贸易公司和驻美代表机构。

10月7日，美国助理贸易代表梅西宣称中国的贸易壁垒和没能有效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是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主要问题；随后便宣布要就“中国对美国进口和实行贸易壁垒一事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1991年8月，布什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台湾。布什在这份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国同台湾保持着有力的非官方的实质性关系。台湾正在进行迅速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我们的目标之一是促使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形成能够进行建设性的和平的交流环境。”

据亲台湾的《世界日报》分析，布什总统在这份《国家安全报告》中首次提到台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今后美国在制定对台政策时，不会再有满脑子的中共压力了。”

同年9月，“美国——中华民国经济委员会”在盐湖城开会时，美国政府派出了运输部长斯金纳，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德温斯基参加了有关活动。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甚至公开宣称，美国被“中美三个联公报捆住手脚的时间太长了”，认为美国今后在处理对华关系或者与台湾关系时也必须有“新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依靠这些老政策”。

另外，美国政府还不断利用西藏问题向中国政府大打“西藏牌”。1991年4月16日，布什总统以“私人身份”会见了正在美国访问的达赖喇嘛，并且和达赖讨论了“西藏的一般情况”，从而改变了美国政府官员不直接与达赖接触的传统政策。

4月1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支持“西藏自由和人权”的决议。10月28日，由布什签署的《国务院授权法》也谈到了西藏问题。这份法案竟然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称其真正代表是达赖及其“流亡政府”，并称“西藏一直保持着不同于中国的主权、文化和宗教特性”。这份《国务院授权法》甚至诬称中国为“一个非法占领者”。这种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

但是，中国在经历了“六·四”风波及随后苏联东欧集团瓦解的风风雨雨后，不仅没有出现美国人所期望的那种“和平演变”，相反，几年来，中国政局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这也使美国当权者逐步认识到，通过施加压力来促使中国“和平演变”，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而保持外交接触才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1991年6月，布什在写给民主党参议员鲍卡斯的信中便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美国政府的这一观点。他说，美国将继续保持和加强与中国在外交部长和其他副部级官员之间的接触，以“向中国施加更强大的压力”。于是，从1991年下半年起，美国高层也开始酝酿贝克国务卿的访华行动。

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

与日俱增。在亚大地区，中国与印尼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与新加坡、文莱及韩国也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日本关系也完全恢复了正常；在欧洲，包括英国和意大利在内的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了中国，欧共体与中国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原来本想孤立中国，没想到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反而被国际社会所孤立。

1991年11月15日下午，贝克率领美国国务院的一批高级官员，包括副国务卿罗伯特·朱利克、雷金纳德·巴塞洛缪、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以及国务院发言人塔特怀勒等来到北京。

初冬的北京已经寒气逼人，贝克等人顾不上舟车劳顿，当即驱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与等候在那里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进行会谈。但随着两人的会谈切入中美关系中十分敏感的话题，会谈气氛也开始紧张起来。

钱其琛首先指出：“尽管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美两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仍然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大局势的稳定。中美两国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从战略高度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说到这里，钱其琛的表情更为严肃，他在历数美国在“六·四”事件之后处理对华关系时的种种不友好行为后，非常严肃地对贝克说：“制裁使中美关系受到了严重伤害，美国应当取消对中国的制裁。”

贝克心里当然知道，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目前这种局面，主要是美国方面的制裁行动所造成的。但他的谈话一直想绕过这一话题。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国内现在有很多人主张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布什总统在这一问题上处境非常孤立，希望中国方面能理解美国政府的这一难处。”贝克利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不停地旁敲侧击。

当然，他知道，他此次中国之行还有求于中国，如在海湾危机、柬埔寨问题以及军备控制和如何推动亚大地区经济合作等问题上期望中国方面能给予支持。因此，不想一开始便把会谈气氛搞僵。在会谈过程中，分歧较大的人权问题，基本上是各自阐述自己的立场。

11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先后会见了贝克及其一行。三位领导人都谈到了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与压迫，因此特别珍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但他们也同时强调，中国非常重视中美关系，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两国高层往来。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更需要两国领导人之间高瞻远瞩，着眼于国际战略大局，经常交换意见，从而推进双方关系的正常发展。

当天晚上，贝克一行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到了他此次中国之行的意义和影响。

“这次不带先决条件的访问证明了美国决心改善中美两国之间的气

氛”，贝克说，“我同中国领导人共进行了十八小时的会谈，会谈范围从双边关系到地区问题，再到国际形势，范围十分广泛，这些会谈虽然有些困难，但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因此，这次访问表明美国愿意进行高级接触，从而努力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努力保持和恢复两国之间的关系。”

同一天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称“这次访问是成功的，有助于中美关系恢复与发展。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在一些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增进了互相了解。”

正是由于贝克此次中国之行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 1991 年底，两国关系终于出现了明显改善。

1992 年大选与中美关系

贝克国务卿 1991 年 11 月对中国的访问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因此，在 1992 年初两国关系出现“良好开端”。在这一年时间里，中美两国就知识产权问题最后达成了协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了会晤，这是自 1989 年以来中美两国政府首脑首次会晤。另外，这一年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有了发展。但由于这一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中美关系也因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而受到了新的伤害。

随着 1992 年 11 月 3 日大选日期的日益临近，共和、民主两党力争夺政府及国会大权而展开了殊死角逐。两党候选人虽然主要争论的都是其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这个时候前苏联已经垮台，他们失去了这样一个集中火力进行攻击的绝好机会。于是，两党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便展开了激烈争论。特别是以克林顿为首的民主党人更是紧抓住着布什的对华政策不放。他们指责布什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漠不关心”，要求布什政府彻底改变其对华政策。中国也成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1991 年 10 月 3 日，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为了在这次大选中出奇制胜，克林顿的谋士们提出：集中火力炮轰布什的对华政策，这才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克林顿得到了这一锦囊妙计之后，马上便付诸行动。1991 年 12 月 12 日，克林顿第三次来到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并在那里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他在这篇题为《保证美国安全的新誓约》的演说中，对布什的对华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

“行政当局继续娇惯中国，尽管它继续镇压民主改革，野蛮征服西藏，不负责任地输出核技术与导弹技术，在柬埔寨支持嗜杀成性的红色高棉，并且滥用贸易惯例。”克林顿声嘶力竭地喊道，“如果说在冷战期间，当中国还是一支对抗苏联实力的一个抗衡力量时，我国政府如此克制尚属情有可原的话，可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退出了这场角逐，再打中国牌也就毫无意义

了。”

随后，克林顿又提出：“美国政府应该用对华最惠国贸易待遇作武器，促使中国的政治自由化和对国际行为负责，同时要建立亚洲自由电台把消息与希望送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去。”

1992年4月，克林顿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演讲时再次攻击布什的对华政策是“对那些不加掩饰地蔑视民主、人权和控制危险武器技术扩散的必要性的年迈统治者百般娇惯。”

同年7月16日，克林顿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为了衬托民主党人对华政策的独特性，大会主办者特意请来了中国的“民运精英”李录和柴玲，并让他们发表反对中国政府的演说。克林顿本人在接受提名时发表的演说再次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攻击，他许诺说，民主党人一旦入主白宫，便一定要建立一个“不迁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的”美国。他严厉指责布什总统“照常同在天安门广场抑杀自由的人做生意”。

在此后发表的另一次演说中，克林顿攻击布什“放纵”中国领导人，没有支持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的示威者。他说，将来美国政府必须“勇敢地面对”中国领导人，坚持必须在扩大政治开放和改善人权的情况下才能继续给予最惠国贸易待遇。在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竞选纲领也指责布什政府对中国的“民主潮流”支持不力。宣称今后美国在延长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时一定在附加“尊重中国和西藏的人权、扩大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市场以及负责处理武器扩散”等三项条件。

1992年9月14日，当美国参议院再次通过了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时，克林顿迅速发表声明，对这一决议赞不绝口。他称赞这一议案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经过精心设计的、能促使中国走上正确道路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并称赞参议院决议“将促进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并将加速中国的自由、民主化进程。”

在这份声明中，克林顿用非常严厉的措词，再次攻击布什政府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三年时间内“奉行了一种同中国年迈领导人保持建设性接触的不明智而且不成功的政策。”

1992年10月11日，克林顿与布什及佩罗举行首次电视辩论中再次对中国进行了猛烈抨击。

由于这是三位总统候选人的首次电视辩论，辩论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们在这次总统选举战中的命运。因此，当夜幕刚刚降临的时候，布什、克林顿和佩罗便携妻带子早早来到了设在华盛顿大学综合体育馆的辩论现场。这座能容纳数千观众的体育馆也早已座无虚席，而通过电视转播看到这次辩论实况的人数则将近一亿人。

三位候选人就各自的从政经验、国内经济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看法之后，主持人洛瑞尔便将话题转到国际问题，并要求三位候选人分别阐述一下他们的对华政策。

由于在前几回合的辩论中，克林顿始终强调自己“代表了变革的真正希望”，其演讲风格也非常自然、朴实，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共鸣。因此，当他谈及中国问题时便显得更加踌躇满志、得意洋洋。

“我认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我们并不想孤立中国。但是，我认为，在那些年轻人把自由女神雕像运到天安门广场上时，我们若像本届政府那样做就是错误的。”当主持人提及“中国问题”时，克林顿便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他谋划已久的对华政策主张。

当然，仅仅亮出自己的招式还是不够的，克林顿藉此问题还对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进行了猛烈攻击：

“布什先生派了两个人秘密去中国，为中国领导人祝酒，这基本上是告诉他们不必为此担心，而他们却以同伊朗开始进行转让核技术的谈判来奖赏他，这就是他们对这种行动的答复。”

克林顿将所谓的对华政策失误全部推给布什以后，也忘不了要为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邀功请赏：

“由于国会和全国人民坚持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国采取行动，请看所发生的情况：中国终于同意停止向我国输出犯人生产的产品，不是因为我们纵容他们，而是因为政府被迫采取了一定行动。最近，中国宣布他们将降低一些对我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他们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同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有1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所有贸易顺差国中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

克林顿对自己的这番表演非常得意，为了增加其演说效果，他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迅步走向观众席，高声向他的听众们喊道：“我将会坚定不移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些要求。我会说，‘如果你们想不仅让你们的私有企业而且让国有企业也继续享受最惠国待遇，今后请注重人权。开放你们的社会。承认那些竖立自由雕像的年轻人的合法性。’如果我们能坚持我们的经济利益，我们应能推动中国人民的民主利益。”

面对克林顿咄咄逼人的攻势，布什再也沉不住气了。在这次电视辩论活动中，年近7旬的布什已经被年轻气盛的克林顿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这次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又由克林顿占尽了先机。为了挽回不利局面，布什也只得借力使力，加强了对中国的攻击。

“本届政府是第一个起来反对天安门广场侵犯人权行为的大国。是我们达成了有关犯人产品的协议。是我们通过卡拉·希尔斯的谈判降低了对我们产品的关税。是我说过‘让我们维持最惠国待遇’，因为诸位都看到中国正在向自由市场经济发展。”

说到这里，布什有意看了一眼克林顿，但这位对手似乎有点漫不经心，这不禁使布什有些愠火。

“如果按国会和克林顿州长建议的去做，将会孤立和损害盾港。他们正在取得一些进展对我们来说还很不够。我们是首先对他们实行制裁的国家，我们现在在某些项目上仍对他们实行制裁。但是，克林顿州长的哲学是孤立

他们。他说不愿孤立中国，但是他阐述的对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和那种羞辱他们的政策是不会取得我们正在取得的那种进展的，我曾同这些人打过交道，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如何去做才显得强有力，它在前进；尽管不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快。但是，如果孤立中国，使他们封闭，那我们就会大错特错。我不会这样做，我必须说服许多主张人权的人。我们已经实施了制裁，并一直在这样做。”

布什由于过分激动，语调都有些变样，他指着克林顿说：“你可以侮辱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但我要说，他们去那里不是去讨好和表示纵容，他去那里是为了说明他们必须做出让步……”

看着克林顿与布什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另一位总统候选人佩罗却优闲自得地坐在一旁坐山观虎斗。

“中国是一个划分成许多省份的大国，它的一些年迈的领导人将不会在位太久。资本主义正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发展、繁荣”，佩罗似乎想给他的两位对手上一堂有关中国的地理和经济发展课。“亚洲是我们将来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一种发展中的、不断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要通过一段需要小心谨慎的、极其危险的路程，以保证我们不会低三下四地讨好那些独裁者，保证不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压制他们的人民。但是，从最坏的情况说，在那里，时间是我们的朋友，因为用不了多少年，他们的领导人就会发生变化，更何况他们的国家现在正取得很大的进步。”

如果说，上述言论尚停留在口头上的话，那么，在 1992 年中美关系最严重的一次伤害也是因为这次大选的缘故。这起事件不仅使刚刚出现缓和的中美关系再次陷入低谷，而且也标志着美国对华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

美国售台武器风波始末

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1992 年年初中美关系由于双方达成保护知识产权协议，使中美关系发展出现了积极因素。但随着 1992 年大选的全面展开，中美关系便遇到了非常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布什 9 月 2 日宣布美将售台 150 架 F—16 战斗机就是中美关系发展中所遇到的重大挫折，一些美国报纸认为这一行动使中美关系“滑向低潮”，“陷入恶化的境地”。

希什作出售台武器的决定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把他的这一决定与美国下半年通过香港政策法案等对中国不友好的事件联系起来便可以看出，布什这一决定不仅是为了向民主党显示他对中国“强硬”，向选民讨好以赢得选票，而且表明了在前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盖尔布在他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布什的决定“是一个表明其政策改变的重要迹象”。

布什在这个时候作出售台武器决定，首先当然是他这次大选的需要。

布什总统在 1990 年的海湾战争中因为其独特而且非常出色的表现广获

赞誉，一直到 1991 年底，他在各项民意测验中依然获得了美国选民的广泛支持。但是，海湾战争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幻影，它无法阻止美国经济的下滑之势，当然也就无法使美国选民继续对布什无条件地支持。随着 1992 年 11 月 3 日大选日期的日益临近，布什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在 1992 年 7 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布什的支持率竟落后于克林顿二十四个百分点。此后，布什和共和党虽然不断进行努力，但在 8 月份的民意测验中，克林顿仍然领先十四一十七个百分点。而且即使这种局面也没有维持多久，在佛罗里达州发生特大飓风之后，布什的声望再次严重受挫，他与克林顿的差距也重新达二十多个百分点。这种竞选形势使布什一班人忧心忡忡。1992 年 8 月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布什在德克萨斯州的支持率也落后于克林顿十四个百分点。而且在这个时候，各项民意测验已经表明，不管布什采取什么手段，他在美国最大的一个州加利福尼亚州已经毫无取胜希望。布什之所以由海湾战争的英雄很快便沦落到这种极不受欢迎的地步，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美国经济的疲软乏力，特别是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更是伤透了美国人的心。据统计，1992 年 6 月，美国失业率达 7.8%，这是从 1984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特别是军工企业，失业问题更为严重。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开始削减其军事预算，这些军工企业每年的订货都在减少 12% 左右，因此这一行业失业问题最为严重。仅仅在 1992 年 7 月，美国军工企业便解雇了 17000 多人。而位于美国西部德克萨斯州的著名军工企业通用动力公司本来有职工两万多名，可是因为定货减少，他们不得不宣布要在 1994 年以前减少员工 5800 人，占全部工人的近 30%。这些工人对布什及其共和党政府心怀不满也就势所必然了。

在这种情况下，布什谋士开始向他进言：

“总统，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向台湾出售 F—16 战斗机的问题。通过这一行动能减少通用动力公司的裁员，可以争取这家公司的数万名工人及其家属的支持，以保住我们在德克萨斯这个‘共和党堡垒’的地位，并改变目前这种不利局面。”

与此同时，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乔·巴顿等人也不断进出布什总统的办公室，向布什游说：“现在看来，只有批准向台湾出售这批 F—16 战斗机，我们才能保住德克萨斯州的领先地位。我们的命运全部操纵在您的手里，您就看着办吧！”

8 月 14 日，八名国会议员集体来到白宫，向布什当面提交了一封由他们亲笔签名的信件，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布什网开一面。

此后，一百多名众议员又联合签名，向布什总统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布什解除向台湾销售战斗机的禁令。他们声言：“向台湾出售一批 F—16 战斗机，不仅可以给美国提供一万多个就业机会，而且有助于美国进一步研制新型的 F—22 型战斗机，更何况中国已经向俄罗斯购买了苏—27 型战斗机，为了保持海峡两岸实力平衡，也有必要向台湾出售这批武器。”

面对着竞选中的不利形势，加上国会议员的双重压力，布什也开始改变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8月上旬，布什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商业部组织一个专门工作组，重点研究向台湾出售战斗机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向布什提出专门报告。专门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当时中国有求于美国，而且中国也明知道这是布什为了大选需要而作出的决定，因此有可能咽下这枚苦果。在这种背景下，布什终于不顾他的外交信誉，在1992年9月2日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

台湾当局向美国购买F—16战斗机的要求早在1981年即已提出，但由于当时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府一直对此要求置之不理。而到了1992年，布什政府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确实寓意深刻。其实，布什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还有另一层国际战略方面的考虑。美国政府一直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作为对付苏联威胁的作用已经大大下降。相反，由于在意识形态、及经济贸易等问题上的摩擦越来越多，美国国内甚至弥漫着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情绪，他们在惊恐之余，纷纷向政府建议扛出“台湾牌”，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这也成为美国新的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一政策调整也与台湾当局“务实外交”一拍即合。

布什的这一决定显然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件极为严重的事件。一方面，由于美国的撑腰打气，台湾当局的“形统实独”的气焰更为嚣张，几年后，李登辉之流利用其雄厚的外汇储备在国际上大肆开展“银弹外交”、“务实外交”和“度假外交”等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使本来已经趋于缓和的海峡两岸关系又趋紧张。而且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方其他国家的军火商也在蠢蠢欲动，伺机向台湾方面出售大笔军火，这也给中国的统一事业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另一方面，布什总统的决定还反映了美国政府在冷战结束后正在逐步调整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对华关系方面大打“台湾牌”，以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发展。他们有意将《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上，这也使中美关系增加了新的复杂因素。

第二节 步入泥沼

在 1992 年大选期间，克林顿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曾集中炮火猛烈抨击布什的对华政策。他正式出任总统后，又延纳了一大批“人权卫士”进入他的内阁，这无疑使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但强调重振美国经济的克林顿又如何能舍弃中国这个十二亿人口巨大市场的诱惑？作为一国之君，克林顿既要维护美国人的价值标准，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想在中国这个诱人的市场上分一杯羹；既要利用中国的影响实现其“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梦想，又要时刻记着“遏制中国”，要从这些矛盾中权衡利弊得失，找出一条终南捷径，这种艰难的“游戏原则”使克林顿苦不堪言。中美关系到底何去何从？美国人玩完了“人权牌”、“台湾牌”和“西藏牌”之后，还会打出什么稀奇古怪的牌呢……

人权卫士今又来

1992 年大选期间，克林顿由于竞选需要，在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上说过许多过头话。他甚至将中国与伊拉克相提并论，声称他当政后一定要对中国实行更为严厉的政策。但是，随着后来大选形势的日益明朗，特别是在他正式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他又必须理智地面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并作出明确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仍然坚持要在人权、武器销售等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之外，有关中国的讲话语调已经明显缓和下来。

1992 年 11 月 19 日，克林顿与国会两党领导人在华盛顿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全面阐述其国内外政策，这也是他当选总统后首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当记者问及克林顿新政府今后将采取什么对华政策时，这位年轻的“白宫新贵”当即表示，他“赞成在（中国的）人权和贸易方面没有出现一些变化之前对中国享有的贸易最惠国地位施加一些限制”。

但刚刚说了这么一句，克林顿已经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在与布什争夺总统主座，他还必须为今后的对华外交留下一条后路。因此，他有意停顿了一会，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我满意地注意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当布什政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出于政治气候变化的原因，对用监狱劳动力制造的产品和对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采取较为强硬的方针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在这些事情上有点收敛了。”

克林顿说到这里，又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与我们的贸易中有一百五十亿美元的顺差……我们的对华贸易虽然我们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但是他们得到一百五十亿美元的顺差。这对他们来说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未了，克林顿还急急忙忙补充一句：“不孤立中国，确保中国继续发展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为了准备正式入主白宫。克林顿于 1992 年 11 月又回到了他的发迹地阿肯色州。

1992 年 12 月 22 日，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市政大厅里挤满了来自美国各主要新闻单位的记者。大约 10 时许，克林顿满面笑容出现在市政大厅，并马上引起了人们的一阵骚动。他首先宣布了新政府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候选人名单，接着便谈到他的对华政策：

“关于中国，我的态度一直是简明和坦率的。我支持在卡特总统任职时克里斯托弗参与的那些行动。我要设法向中国伸出双手，把他们带入国际社会。我对该国走向市场经济感到鼓舞。”

接着，他又重弹了一番要向中国施加压力的老调：“我不支持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看到的镇压。我不支持使用劳改犯制造产品向我国和其他国家出口。我不支持出于经济和其他目的而违反国际武器条约和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我将尽力与中国进行谈判，保持坚定目标，往前走。”

这些讲话实际上向人们勾划出克林顿政府今后对华政策的大体轮廓：即坚持在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但也不要孤立中国，要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大家庭”。

克林顿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发生的变化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本人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一些智囊机构也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克林顿当选总统后，颇有影响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公布了一项文件，要求美国新政府尽早安排美国内阁阁员访问香港、北京和其他重要的亚洲国家首都，以表明美国对亚太地区仍有兴趣。文件还要求美国国会尽早派共和、民主两党联合代表团访问北京，以表明美国打算在对华政策上虽然持强硬态度，但也愿意与中方会谈，并听取中方人士的意见。该研究中心的文件警告说，美国新政府不应把建立一个由美国资助、旨在促进中国的民主的自由亚洲电台一事作为第一块政策试金石。文件说，这样做势必引起北京“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出过度强烈的反应”。设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公布的另一项文件说，美国国内需要重新制订亚洲政策，特别是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本政策上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美国大西洋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委员会在 1992 年底也完成了对华政策建议报告，这份报告称中国迅猛发展势头是美今后十年不应忽视的事情，中国的变化将是美国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对中国采取消极政策是错误的，应保持积极的充分交往的关系。这份报告还建议美国支持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同中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不应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也不能在这一问题上附加条件。美国还应该加强中美高层官员会谈，恢复两国高级官员军事交往，增加贸易和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另外，在这时候，还有一家颇具影响的智囊机构亚洲基金会也提出了一份全新的亚洲战略报告，要求克林顿政府在集中精力于国内问题的时候，也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亚洲。在谈到中国问题时，报告说，美国“应该采取

接触政策，即支持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开放。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反对的时候就坚决反对。”报告敦促美国不要以取消最惠国贸易待遇以惩罚其侵犯人权行为威胁中国，而应该采取“有的放矢的办法，针对中国的某个受到广泛的国际指责的行动或政策采取制裁措施”。

但是，由于克林顿在竞选期间发表了大量措词强硬的言论，加之美国许多强硬的反华分子在这次选举中再次被选进国会，例如带头设法为美中贸易加上人权条件的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不断进行反华鼓噪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约翰·波特，鼓吹美国应更多地卷入香港事务，并通过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的的共和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和乔·巴顿都重新当选。另外，克林顿在建立他的内阁班子时，也延纳了大批以反华姿态著称的“强硬派”人物，其中包括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副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因而对华关系中的人权成分就被突显出来。

沃伦·克里斯托弗本来是一位专业律师，一直到60年代才开始进入政界，后来他曾经在卡特总统任期内担任过副国务卿一职，当时主管的就是人权及裁军事务。克里斯托弗本人对中国问题知之甚少。他唯一一次与中国问题打交道便是在1979年中美建交后，曾代表美国政府赴台湾宣布与台断绝外交关系，所以他对中国问题实际上不可能有多大发言权。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将由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一手操办。

温斯顿·洛德，出生于1937年8月，他不仅是一位职业外交家，而且也是美国国务院内有名的“中国通”。他从1962年起便一直在国务院任职。1972年，当中美关系出现历史性转折时，洛德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的特别助理直接参与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他作为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顾问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1985年11月5日，洛德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一直到1989年“六·四”之前才离任。从以上履历可以看出，洛德的政治生活绝大部分时间与中国问题有关，加之他的夫人包柏漪也是一位精通中国文化的美国华人，因此，洛德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

但是，“六·四”事件发生后，洛德背离了基辛格等人定下的对华路线，并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洛德声称布什派遣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为“摇尾乞怜的使者”。他还于1989年12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强烈谴责布什政府“在谴责（天安门镇压事件）和（同中国人）联系之间搞平衡”。他强调说，斯考克罗夫特对中国的访问“既打消了官方假装表示的愤慨而且也削弱了中美关系的真正基础”。洛德在这篇文章中还抱怨说，布什更感兴趣的是欧洲的人权而不是中国的人权问题。他后来一再重复这一指责。他写道：“我们在这里表现的不只是双重标准，而且是文化上——如果不是种族上——的偏见……中国人与欧洲人不同，他们从来没有自由而且也享受不起自由。”洛德在鼓吹建立自由亚洲电台时也驳斥了布什政府反对这件事的理由。他在1992年4月的讲话中说，“依我看，使中国当局不

安根本不是反对建立这个电台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说明其潜在价值的明显证据。它将对他们压迫性的统治、对传播媒介的控制和憎恨外国人的情绪构成了威胁。”

与此同时，洛德也是将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与人权问题挂钩的最积极鼓吹者。1992年7月，洛德在国会作证时明确表示，他支持对延长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规定有限条件的立法，他建议美国政府应该“保持仅次于内阁部长级的对话……而不是通过高级官员互访和摄影留念的机会使这个政权合法化”。他还说，美国应该“与台湾保持我们的密切、非正式的联系”。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非常混乱，而且问题成堆，这一任命的得失也就不言自明了。

最惠国待遇问题再起波澜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正式入主白宫。作为一国总统，他的讲话当然不可能像竞选时那么随便和放纵。因此，他当选总统后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说的调门有所改变。但是，在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的同时附加一些条件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2月28日，克林顿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他就职以后的首次对外贸易政策演讲时，其中也谈到了中国问题：

“美国现在正在对中国经济呈现出令人惊叹的新活力作出贡献。中国现在的年增长率为10%，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极大的比例。美国想要继续保持这种伙伴关系，但是美国也有权期望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方面的进展，因为我们支持这种进展。”克林顿仍然肯定地说。

在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白宫发言人斯特凡诺普洛斯在解释克林顿的这番讲话时也说，美国政府在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总统认为，在延长最惠国贸易地位问题上，美国可以进一步附加一些条件，即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和中国对民主的尊重。”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确认他的任命的听证会上说，“我们的政策将谋求促进中国实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和平演变。”

随后不久。克里斯托弗又于2月28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会见报界”节目记者采访，并表示：“克林顿总统支持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要视中国在人权、西藏和贸易等方面的进展而定。”

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上的倒行逆施马上招致了中国方面的坚决反对。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佟志广说：“中国对此必将作出强烈反应，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方面还表示，如果美国在最惠国问题上提出条件，对中美两国贸易关系发展将产生重大危害。

在美国国内，克林顿政府的这种政策也遭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在克林顿上台后不久，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便向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一项

对华政策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极为严肃地指出，美国政府企图利用中国的最惠国地位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大棒”是不明智的。

与此同时，由前副国务卿约翰·怀特黑德和前世界银行行长巴伯·科纳布尔共同担任主席的一个七十四人的研究小组也给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一份政策报告，要求克林顿政府不要撤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也不要附加条件。

这个报告说，一旦在对华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上附加条件将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损害中国经济中最生气勃勃的部门，使美国企业在中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怀特黑德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研究小组得出结论是“在这个阶段，通过对话要比通过制裁更能实现改善中国的人权。”这个小组建议在人权问题上同中国高级领导人进行“强有力的悄悄的对话”和同中国军方恢复现在中断的高级交往。

1993年2月8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学者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接受了《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迈克尔·理查德森的采访，当记者请他谈一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看法时，这位教授非常明确地表示：

“美国政府使用贸易杠杆来促进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业是非常错误的。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和政治开放的进展有其法律上的考虑，这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同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应从经济的角度来辩论。在这个领域插入人权问题将使美国最终和它所有的亚洲朋友分手。没有一个亚洲国家会跟着走这条道路。”

斯卡拉皮诺接着说：“美国应该与中国政府保持最大范围的接触。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华盛顿不应该玩遏制中国的把戏，阻止它成为亚洲主流的一部分。只有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主流，才会有中国政治上的更加开放。”

为了试探中国政府对中美最惠国贸易问题的看法，同时进一步与中国方面讨论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和美国进入中国市场问题。1993年3月1日，克林顿总统派遣了以美国助理贸易代表道格拉斯·纽柯克为团长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前往中国。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纽柯克此行并没有改变克林顿政府在最惠国贸易问题上的立场。

3月25日，克里斯托弗率领他的一帮助手来到国会山，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对外行动小组委员会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听证会。克里斯托弗放出的风声依然没有脱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老调：

“同中国打交道时，最惠国待遇是极为重要的工具，它既有实际意义，又有象征作用。如果美国政府不再把最惠国贸易待遇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那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在克林顿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米切尔和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南希·佩洛西分别在1993年上半年向国会提出了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的议案。两个法案虽然措词有所不同，但其宗旨如出一辙：

即只有当中国在改善人权，降低贸易壁垒和停止向某些激烈国家出售武器方面作出重大让步之后才能延长最惠国贸易待遇。

克林顿此时的如意算盘是：既要通过强大的压力使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向美国屈服，又要成功地延长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

但此时此刻，克林顿本人对这种鱼和熊掌两者兼得的美妙幻想是否能变成现实心里也没有底。为了试探中国政府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立场。克林顿决定委派温斯顿·洛德率团出访中国。

1993年5月10日，温斯顿·洛德一行风风火火来到中国，这也是克林顿就任总统后出访中国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洛德在华期间，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就人权、武器扩散及最惠国贸易待遇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双方对中美关系采取了“积极和向前看的态度”。但洛德等人提出的人权说教也被中国方面顽强地顶了回去。

洛德回国之后，马上就他此次中国之行向克林顿作了汇报。并添油加醋地向克林顿说：“从目前情况看，中国领导人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依然十分强硬，看来只有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能将中国人让步。”

克林顿在听完洛德等人的汇报之后，当即表示：“看来将最惠国贸易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已势在必行”。因此，不久之后，洛德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附加某些条件是有必要的”。

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主动向美国方面伸出了友谊之手。

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有线电视台的采访。江泽民主席重申了中国方面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中国方面希望最惠国贸易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美国方面取消给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双方都将遭到重大损失。对美国来说，至少损失十几万个就业机会，消费者则要花更多的钱。”江泽民胸有成竹地表示，“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固然重要，中国这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市场对美国的对外贸易恐怕也是不可或缺的。”

就在江主席讲话的同一天，美国制造商协会也致函克林顿，敦促他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内的一些反华势力也在加紧进行活动，以便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

5月27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透露了美国政府决定延长对华最惠国贸易待遇，并将附加一些条件。克林顿说：“我基本上决定延长最惠国贸易待遇一年，因为我希望支持中国的现代化，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说到这里，克林顿又补充道：“我要向他们明确指出，在人权及劳改产品问题上必须取得某些进展。至于我们之间的贸易争端，我要从中抽出来，

直接同他们谈判。”

美国政府于 1993 年 5 月 28 日发表了《关于 1994 年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件行政命令》（以下简称《命令》）。

《命令》声称：“鉴于国会和美国人民对无条件延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惠国贸易地位是否适当深表关注；……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人权记录、核不扩散和贸易问题感到关注；”

“鉴于我已仔细地考虑了给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附加条件作为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的一个手段的可取性；”

因此发布以下命令：美国国务卿将于 1993 年 7 月 3 日开始的十二个月时间里就是否再次延长最惠国贸易地位向总统提出建议。这些需要考虑的条件包括两方面内容：

首先，国务卿不应提出延长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建议，除非他确信：
——延长对华最惠国贸易将大大促进贸易法 402 条的自由移民的目标；

——中国正在遵守中美两国 1992 年达成的有关犯人劳动的双边协定；

其次，国务卿在提出这项建议时还必须确定，中国是否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全面的重大的进步；

——采取步骤开始遵守《世界人权宣言》；

——释放那些因为非暴力活动而遭监禁的中国人，并对他们的情况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保证犯人的人道待遇，例如允许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组织进入监狱视察；

——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遗产；——允许国际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对中国广播；

白宫发言人当天还发布了《关于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声明》。这份声明虽然也承认美中关系非常重要，但又说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核心便是“坚决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重大进展。声明还说，克林顿决定延长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十二个月，明年是否再延长则要看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否有重大改进。

由于克林顿这次颁布的《命令》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此《命令》发表后马上便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5 月 29 日，也就是在《命令》发布后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便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将贸易问题政治化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声明还指出，如果美国方面一意孤行，只能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经贸合作，最终损害美国自身的重大利益。

克林顿政府这次就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问题颁发的这道行政命令虽然满足了美国一些反华势力的政治愿望，但其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策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广泛反对，而且也招来了美国许多盟国的一片批评声音，克林顿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无异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由于有了这道《命令》，美国政府在 1993 年下半年到 1994 年上半年的对华外交便一直围绕人权问题而进行，这既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也给美国带来了难以言表的痛苦和损失。

在克林顿颁布这项《命令》之后不久，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便通过决议，反对北京承办 2000 年奥运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宣布将于 6 月 15 日建立“亚洲民主电台”。这些事件接连出现使中美关系受到了严重干扰和伤害。

到了 7 月初，温斯顿·洛德在一份秘密文件中不得不非常痛苦地承认，中美关系正在呈“螺旋式下降”。他敦促政府采取全新的对华战略，迅速恢复与北京广泛接触，用鼓励代替威胁。

1993 年 7 月 4 日，克林顿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远赴日本东京，出席正在那里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关于对华最惠国贸易待遇依然是记者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和以前的强硬立场相比，克林顿这次的语调似乎缓和了很多，他只是说，美国政府将“借最惠国待遇问题告一段落的时候，开始重新研究对华政策问题。”

他还向记者们透露，美国方面已经将他的这层意思向中国方面作过通报，并打算在他回国后重新制定新的对华战略。

与此同时，1993 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及中国与日本和欧洲国家经济合作关系的不断加强也使美国政府坐立不安。他们深知，如果任由中美关系这样恶化下去，美国人不仅将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而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陷入被动。他们只有采取一些新的行动才能挽救中美关系。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谋划，1993 年 9 月初，克林顿签署了一份对华政策“行政备忘录”，决定恢复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触。

9 月 25 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安东尼·莱克乘飞机直抵美国东部重镇德克萨斯州，与正在那里参加会议的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进行了一次事先没有宣布的秘密会晤。莱克向李道豫通报了美国最新的对华战略，并表示愿意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的接触也有所增加，1993 年 11 月还实现了两国首脑的正式会晤。

但是，在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上，由于美国人提出的人权标准严重干涉了中国的主权，并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根本无法满足，美国的外交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那种成果。

进入 1994 年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召集他的智囊人员讨

论中美关系现状，并研究美国方面今后应该采取的对华政策。

这帮谋士们在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情况之后，不得不非常悲哀地承认，美国方面提出的人权标准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只要中国满足了两个必要条件——保证“持不同政见者”家属的移民问题以及劳改产品输出问题，克里斯托弗就可以建议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其它条件都可以巧妙应付。

为了实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突破性进展”。克里斯托弗决定在 1994 年 3 月到中国进行一次访问。但是，由于在他访华前夕，助理国务卿约翰·沙

特克于2月底在北京会晤了魏京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愤怒，这也注定克里斯托弗的中国之行一事无成。

这个时候，克林顿本人也显得十分着急。当克里斯托弗在中国败走麦城的时候，克林顿甚至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当着助手的面大发雷霆：

“克里斯托弗到底在那儿干什么？”

克林顿总统震怒不仅反映出他对克里斯托弗的失望，而且对那项原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取得成功，实际上却成了一桩外交麻烦的对华政策感到沮丧。

这个时候，克林顿对中美关系现状已经感到特别的失望，但同时也显得无能为力。他在非常悲观失望的时候便想起了前总统卡特。于是克林顿马上拨通了卡特的电话，请求卡特出面帮助他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但电话的那一头，卡特也不愿意惹火上身。他不仅拒绝了克林顿请他出任“人权委员会”主席的要求，而且还毫不客气地告诫克林顿：“将最惠国贸易地位与人权状况挂钩是十分错误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这一

争端的最好办法便是将两者脱钩。”

1994年4月22日，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死结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因患中风而在纽约溘然仙逝。4月27日，美国政府在加利福尼亚的约巴林达为尼克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克林顿总统再次委派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会晤了在那里参加葬礼的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并建议由美国派遣密使前往北京，与中国方面洽商最惠国贸易待遇等问题。李道豫当即接受了这一建议。

不久，克里斯托弗起用了前驻日大使迈克尔·阿马科斯特带着一项新的建议前往中国。美国政府提出的这项新建议是：如果中国在满足克林顿总统行政命令的要求方面作出一些“小小的”姿态，美国政府准备永久性地使贸易和人权问题脱钩。

中国虽然对美国在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上附加条件的做法极为不满，当然也不希望取消这种待遇。为了照顾中美关系的大局，中国政府决定对美国方面的无理要求稍作让步。在阿马科斯特访问北京后不久，中国决定邀请美国一个技术小组讨论停止干扰“美国之音”的广播问题，并答应释放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并给他们的部分家属发了签证。由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同意遵守就禁止劳改产品出口问题同华盛顿达成谅解，便使克林顿有足够的理由对外宣称中国已经达到了行政命令规定的两个“强制性”条件了。

1994年5月23日一清早，克里斯托弗便带着详细的报告材料来到白宫，以向这位年轻的主人提出一份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这份厚厚的报告书声称中国已满足了1993年克林顿提出的两项要求：在停止向美国出口劳改产品方面进行合作和准许某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直系家属离开该国。在向克林顿呈交了这份报告之后，克里斯托弗又非常无奈地对克林顿说：

“关于您提出的其他五个问题，中国既有进步也有退步。但总的来说，中国方面的行动基本上符合了行政命令提出的有关要求，因此，您看看是不是可以继续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

克里斯托弗的报告实际上为克林顿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就这样，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反复，美国政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宣布再次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同时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与人权问题脱钩。

同一天，克林顿在白宫前面的草坪上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回答了记者们就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提问。

克林顿说：“延长最惠国贸易地位可以避免孤立中国，而且可以使我们保持同中国的接触，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接触，而且还有文化、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接触，并且促使他们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做出积极的努力。我认为，这样做会使中国更有可能在国内和国外发挥负责任的作用。”

“在过去一年内，这种联系是建设性的，但是根据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内同中国人进行的积极的接触，我认为，我们已经不需要那项政策，现在是采取新的途径来实现我们的一贯目标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关系置于更大和更有成果的框架之内。”

说到这里，有位记者打断了克林顿的叙说，并要求他回答一下，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突然出现巨大改变。这个时候，克林顿表情开始变得很不自然，他说：

“对那些认为由于中国侵犯人权而应该取消最惠国待遇的人，我要问你们一个我一直在自问的问题：就我们方面而言，如果采取孤立中国的措施，或者采取加强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和接触的行动，哪一种情况对促进人权事业更有帮助？”

这几句话真可谓肺腑之言，反映出美国政府在新的形势下对最惠国待遇问题的重新认识，实际上也是对克林顿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立场的全面否定，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那样，“在今天这个不同寻常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先生似乎一字不差地引用了布什先生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

当然，克林顿作出这一决策不仅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且也出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一位政治分析家说，通观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对外政策历来是一个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混杂的矛盾体；前者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的价值观，后者则认为对外政策的重心应放在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上。面对要么损害美中之间广泛的经济关系，要么在人权问题上自食苦果的选择，克林顿选择了前者。美国舆论界普遍认为，克林顿的这一选择等于承认他以往的对华政策的失败。同时也等于公开宣称：“一个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良身利益，而不是原则。”

“银河号”货轮上空的刀光剑影

1993年的中美关系始终充满了沟沟坎坎。美国人在关于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问题上的态度蛮横、劲头正足的时候，他们似乎觉得意犹未尽，并

刻意再次向中方提出挑衅。就在克林顿颁布有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行政命令不到两个月时间，美国人又诬称中国的货轮“银河号”载有化学武器原料，再次向中国发难，从而将中美两国关系推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1993年7月23日，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提出要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国际司负责人，宣称美国政府最近从有关方面获得一份情报，发现中国的“银河号”货轮装载着制造化学武器前体（即原料）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他们声称，7月15日，这艘货轮已经驶出大连港，目前正前往伊朗的阿巴斯港。这位官员还说，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方面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否则美国将依据其国内有关法律对中国进行制裁。

美国方面的这一“准确情报”简直就是平地惊雷，使中国官员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疑惑。稍有一些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硫二甘醇是一种类似糖浆的无色透明液体，主要用于制造防腐剂、杀虫剂、除草剂和棉纺织品的染色剂，有时也可以用来制作圆珠笔油。亚硫酰氯也是一种无色或略呈淡黄色的透明液体，大多用于有机合成农药和医药制造的化学制剂。但也

有一些国家利用这两种化学药剂制造一些诸如芥子气之类的化学武器。由于这些化学原料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因此在1993年1月联合国制定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便明确指出，应该限制这类化学原料的销售或转让。

中国政府早在1990年便明令禁止制造和销售这两种化学原料的政策措施，因此根本不可能有大批量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出口的事。但本着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中国外交部官员还是强压下满腔的怒火，答应美国方面一定要认真核查，并尽快将真相公诸于世。

经过两个星期的调查核实，中国方面发现美国的所谓情报竟然漏洞百出，疑点特别多。

首先，美国方面坚持认为这艘货轮是从中国大连港出发的，但经过中国方面核实，“银河号”货轮属于中国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一条集装箱货轮，这是一艘行驶于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固定班轮，其航行路线为天津—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迪拜—达曼，其终点站是科威特。这次出发点是天津新港，而不是大连；出发时间是7月7日，也不是美国方面所说的7月15日；而目的地也不是美国方面坚称的伊朗阿巴斯港，此其一；其次，经过中国与伊朗方面核实，阿巴斯港根本就不是集装箱码头，那里没有装卸集装箱货物的机械设备，因此“银河号”如果驶往这一港口，根本就不可能在那里装卸货物；再次，“银河号”上所装载的三十箱货物本来是通过迪拜港进行转口运输，这些运往伊朗的货物包括文具、小五金以及一些机械设备，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

然而，在中国政府已经就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随之向美国方面通报了调查结果的情况下，美国方面仍然一意孤行，单方面采取行动。

8月1日，美国政府派出两艘军舰开始尾随在“银河号”货轮周围两海里的范围内，对其进行跟踪和骚扰。他们还出动直升机不停地在“银河号”

航行的范围内盘旋、拍照。8月3日，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再次到中国外交部进行交涉。他们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号”立即返回出发地；或者允许美国人登船进行检查，以查明这艘船上是否装载有他们所说的化学品；或者干脆停在某个港口，等候美国方面的发落。这种粗暴践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词拒绝。

由于美国军舰及直升机的骚扰，“银河号”被迫在8月3日停止了正常的航行，并且在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十几海里的公海上抛锚。这个时候“银河号”已经在公海上航行了二十多天，原来准备的淡水和燃油开始严重短缺，船员们的生活相当困难。为了中国船员的生命需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关方面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决定向“银河号”提供淡水和燃油各六十吨，但这一行动又被嗅觉“灵敏”的美国人发现，他们一方面诬称伊朗船只正在向“银河号”靠拢，另一方面则威胁说，如果“银河号”靠近伊朗有关口岸，美国方面将采取断然措施。

8月4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向美国驻华使馆通报了中国方面对“银河号”的调查结果，指出美国的所谓“情报”严重失实，中方对此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负责人还指出，中国对化学品的进出口一直实行严格管理和控制政策，从来都没有出口过用于制造化学武器为目的的原料、技术或设备。美国方面无端指责“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了两种化学原料，并不断骚扰该船的正常商业航行，是毫无道理的。中国方面还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停止一切干扰活动，并确保“银河号”进入有关港口卸货。

面对中国方面的调查结果，美国方面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对“银河号”进行跟踪和骚扰。中国船员的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威胁和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在8月7日又奉命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国对“银河号”采取的霸权主义行为提出严重抗议。秦华孙说，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依照莫须有的情报对另一个国家采取行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方面在“银河号”问题上向中国政府发难严重破坏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干扰了中国船只的正常航运，破坏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和贸易往来，给中方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而且也给中方船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并给中美关系投下了阴影。中方强烈要求美方立即采取措施，确保“银河号”顺利按原计划靠港卸货；要求美方对其无理作法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进行赔偿和承担责任，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但是，在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之后，美国政府依然紧抱着其所谓的“情报”不放。直到8月12日，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仍然坚称，“我们有可靠的情报，证明（‘银河号’）船上载有化学武器，我们决心对该船进行检查。”

为了用事实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揭露美国方面在“银河号”事件上的阴谋，尽快解决“银河号”受阻问题，避免中方及“银河号”货主蒙受更大

的经济损失，中方决定由第三国与中方一起对“银河号”有关货物进行检查。

经过紧张的外交努力，8月25日，“银河号”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天的漂泊生涯，抵达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等候检查。

8月26日，中国、美国及沙特阿拉伯三方的检查人员先后到达达曼港附近的朱科勒海军基地，由东道主沙特阿拉伯代表伊卜拉辛准将主持进行三方首轮谈判。经过近九个小时的艰苦谈判，三方代表终于达成以下协议：审查“银河号”所有货运清单，找出运往伊朗的货物，进行外观检查；对有疑问的货箱，可以随时卸下进行开箱检查；检查结束后，三方代表将在检查结果上签字，并及时公诸于世。

8月28日清晨，中、美、沙三方代表一齐来到达曼港码头。10时许，检查正式开始。美国人自信他们的“情报”非常准确，因此，他们上船检查人员也如临大敌。只见这些平日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美国政府官员全部穿上了迷彩服，头戴防毒面具，手里拿着探测器，脸上则多少挂着一丝常人已难以觉察的冷笑。看他们的架势，似乎马上就可以证示“银河号”上载有他们所需要的化学原料。

这时，运往伊朗的第一个集装箱打开了，美国人从里面拿出了一个铅封黑漆罐，他们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可是当这个罐子打开之后，却发现里面全是一些五颜六色的染料。

随后，美国人又急不可耐地相继打开了其他运往伊朗的二十三个集装箱，但里面装的货物都是中方已经公诸于世的文具、机构零件和小五金。

这回真的该轮到美国失望了。他们的脸上虽然已经挂满了难以掩饰的尴尬和难堪，但他们绝不想就此罢休。因为他们到这个时候仍然确信自己的“情报”万元一失，因此蛮横地喊道：

“我们必须扩大检查范围，必须对从香港转口到伊朗的六个集箱也要进行检查。”

中国方面为了揭露美国人的霸权主义行径，并对之进行有力的斗争，因此，美方人员提出上述要求后，中方代表还是表示：

“你们的要求是毫无道理的，但既然你们要检查，我们还是乐意奉陪。”然而，检查结果再次令他们大失所望。

于是，美国人又提出，凡是从中国运出来的货物，均应该接受检查——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本该死心了。但他们索性要破罐子破摔，一直要蛮干到底，竟然又提出了一项更为无理的要求：“我们还要对船上所有货物进行检查，其中包括来自日本和新加坡的货物，如果不允许检查所有货物，我们将不承认最后检查结果。”

面对美国方面的步步紧逼，中国方面已经忍无可忍。9月1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紧急约见了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对美国得寸进尺，背信弃义的行为提出严正交涉，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干涉来自第三国货物的立场，并且提出，

如果进行这一项检查，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单独承担。外交部负责人还提出：一，美方对迄今所取得的检查结果必须予以书面承认，即所有发来自中国的四十九箱货物没有美方所称的化学原料；二，承诺在三方代表检查“银河号”所有货物之后，共同签署检查结果报告。

为了避免美国方面再次滋生事端，中方检查组负责人要求三方代表每进行一项检查都及时签字承认验货记录。此后，在每检查一项货物时，美国代表都不得不在“硫二甘醇”和“亚硫酸氯”两个栏目上写下一连串的“无”，并签上各方代表的大名。

至9月4日，中、美、沙三方代表彻底检查了“银河号”上装载的所有七百八十二个货箱，结果仍然一无所获。至此，美方企图利用“银河号”事件败坏中国政府形象的图谋也彻底破产了。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是何等霸道和蛮不讲理，美国政府的这种以强凌弱，胡作非为的行径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并让人们再次看清了美国人的本来面目。

克里斯托弗魂断北京城

克林顿上台后，由于美国政府执意在人权及武器销售等一系列问题上向中国政府发难，中美关系始终处于紧张对峙状况。这不仅不利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给亚太地区稳定带来严重威胁，从而直接损害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因此，随着1994年的到来，美国政府也有意派出高级官员访问中国，以缓解中美两国非常紧张的关系。

1994年1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聚会法国巴黎，出席正在那里举行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当时钱其琛便发出邀请，希望克里斯托弗在近期内出访中国。中国政府此时向克里斯托弗发出邀请，实际上也是摸清了美国人的脉络：他们在进行了一系列反华鼓噪之后毫无所获，因此急于恢复和加强与中国方面的高层联系，以便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为其经济发展提供后劲。特别是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美国人正在努力寻找台阶，以便为他们延长最惠国贸易待遇铺平道路。因此，当钱其琛向克里斯托弗发出邀请后不久，克里斯托弗便致函钱其琛，表示他拟于3月份出访中国，并决定先派出主管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沙特克打第一站。

2月27日上午，沙特克来到北京。他到北京的第一件事不是与中国外交部官员商讨有关克里斯托弗访华的具体安排，而是让人把不久前刚刚假释出狱的魏京生接到他下榻的宾馆，与其会谈了足足三个多小时。

沙特克的这一行为马上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因为根据中国刑法第75条，犯罪分子在假释期间是没有公民权的，因此沙特克与魏京生的会谈纯属非法，也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就在沙特克与魏京生谈话后不久，中国有关方面依法传唤了魏京生，并对他的违法行为提出了严重警告；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也向沙特克等人提出了交涉。但由于当时距克里

斯托弗来访只有两个星期，中国政府不想破坏双方会谈的气氛，因此除了在私下对美国方面的行动提出批评之外，并没有抓住这一问题大做文章，中国的新闻舆论也没有就这一事件发布任何消息。

但是，沙特克与魏京生会谈及由此引发的风波马上通过电波传到了美国，美国舆论纷纷就此发表评论，对中国政府的行动提出质疑和批评，有人甚至主张取消克里斯托弗的中国之行。当然，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府显然是作贼心虚，他们虽然希望中国方面按照他们的舞曲与他们共舞，但发党中方并没有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温顺听话时，他们又觉得决不能就此不欢而散，因为对他们而言，通过高层接触逼中方就范才是他们最理想的结果。所以，面对着美国国内舆论界的一片反华叫嚣，克里斯托弗仍然坚称，尽管中美关系面临很多困难，但越是这样，他就越应该出访中国。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在不同场合不断放出风声，认为克里斯托弗此行将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这也给他的此次中国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

3月3日，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在美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克里斯托弗此次中国之行将给中国带去克林顿的两项信息，一是中美关系极其重要，而且还会越来越重要，美国希望同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二是美国要求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取得进展。他表示，中国必须在满足克林顿总统的行政命令方面采取重大行动，“我们期待的是行动，而不是保证”。他还说：“也许在某些领域，坚定的意向或者坚决的承诺是非常有益和重要的，但是显然必须有具体的行动。”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外交行动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回答议员提问时也说：“如果要再次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就必须达到某些检验标准。我想，如果中国要在人权问题上显示出那种使我们能够继续延长贸易最惠国待遇的那种进步，那么我想将来许多事情就有可能办到。”正是由于克里斯托弗等人满脑子里装的都是“人权”、“持不同政见者”等词汇，他后来在北京的访问便显得极为被动和难堪。

1994年3月11日傍晚，克里斯托弗一行来到了中国，随行人员包括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主管安全与裁军事务的副国务卿戴维斯（女），以及不久前刚刚在中国闹出一场风波的主管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沙特克。另外，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魏斯纳也同机到达。

由于在此前中美两国已经就人权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克里斯托弗到北京后的会谈气氛也显得特别紧张。他到北京后，本来由中美双方商定要在首都机场举行一场记者招待会，但满脸冰霜的克里斯托弗走出飞机后便宣布取消这次记者招待会，随即走向机场贵宾室，并甩开中方陪同人员，驱车前往中国大饭店。

次日上午10时许，钱其琛与克里斯托弗开始举行会谈。

钱其琛在发表了欢迎克里斯托弗来访的开场白之后，马上谈到了不久前

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他说：“在国务卿先生来访之前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们深感失望。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来华为国务卿访华作准备时，竟然置中国的法律于不顾，采取了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此后，美国舆论界又就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肆渲染，美国的官方人士也多次发表谈话对中国进行指责。这种做法显然与克林顿总统在去年西雅图会议上所强调的美国支持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中国的说法背道而驰，也是对国务卿先生这次访问的干扰。”

克里斯托弗此时自知理亏，因此，他除了重复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外，也只得挥舞起对华最惠国贸易待遇这一武器来吓唬中国人。

“克林顿总统已经在1993年5月颁了一道行政命令，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如果在未来几个月内中国方面不在人权问题上采取重大行动，最惠国贸易地位将不复存在。”克里斯托弗昂着头，还非常傲慢地威胁说。

但是，对克里斯托弗这一手，钱其深已胸有成竹，他神情严肃地说道：“我们愿意改善中美关系，但是对话需要双方都有诚意，需要有良好的气氛。我希望与国务卿先生能够在互相尊重的气氛中进行坦诚谈话，以增进双方的了解，减少麻烦，不搞对抗，使我们的对话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钱其琛稍作停顿，继续正色说道：“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中国的事情要按有关法律来处理。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只适合美国，管不了中国。中国坚决反对将最惠国贸易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做法。”

当天下午4时左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克里斯托弗一行。会谈一开始，克里斯托弗依然盛气凌人地向中国方面表示：“你们不要有一种错觉，认为美国到时候一定自动将最惠国贸易地位给予你们。你们必须在人权方面有重大的、全面性进展，否则，将会失去最惠国贸易地位。”

克里斯托弗讲这番话的语调就像一位小学老师训斥他的学生，这是对堂堂中国总理人格尊严的一种极大冒犯，因此，李鹏总理对此也感到异常恼火。只见他强忍着心中的愤怒，一字一句地向这位不可一世的美国客人说道：“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只能通过平等协商求得解决，单方面施加压力的想法只会使问题复杂化。”

说到这里，李鹏有意识地停了一下，过了一会才说，“中美两国存在着不同的人权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人权标准，中国绝对不会接受美国方面提出的人权标准。”

李鹏更加坚定地说：“用最明确的语言对我说了这些话，我也要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你，你们美国也不要有一种错觉，以为中国人就害怕失去最惠国贸易待遇。中国当然不愿意失去最惠国待遇，但我们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中国人有根强的生存能力，我们发展经济主要是靠国内市场。相反，你们美国却可能因此而失去中国这个大市场。”

紧接着，李鹏谈起了中美经贸关系，他列举了近年来中美经贸发展的良好趋势，并严肃地对克里斯托弗说：“你们一直强调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200亿美元，其实这些钱都是被你们美国人设在中国的合资公司赚去了。”李鹏最后说：“你们跑到中国来谈人权，其实你们美国的种族歧视也很厉害啊，谁来为你们的少数民族呼吁呢？”

李鹏的这一席话使克里斯托弗等人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刚进门的那种傲气。当李鹏谈到美国国内也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时，克里斯托弗也只得快快地说：“美国的人权记录并非十全十美。”继而又非常无奈地说：“希望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论不要影响最惠国待遇。”

3月12日，克里斯托弗等人忙碌了一整天，但除了自讨没有趣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难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里非常沮丧地向记者们介绍说：“我们绝对不能说会谈取得了任何成果。”洛德也向记者耸了耸肩，表示，“李鹏已经说过，没有最惠国待遇，中国照样要生存下去。”

美国著名的《华尔街日报》在评论当天的会谈时，也讥讽克里斯托弗“看上去就像作家梅尔·布鲁克斯笔下的地方治安官员，他拿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大喊：‘住手，否则我就开枪了’”。其他美国报纸也纷纷报道说，克里斯托弗被中国人施展的“外交手腕”搞得不知所措。

根据原来排好的日程表，3月13日上午克里斯托弗一行在中国大饭店会见了在华从事经贸工作的美国各大公司代表。

会见刚刚开始，这些公司代表就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将人权与最惠国贸易待遇挂钩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严厉警告克里斯托弗说，如果不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受打击更大的将是美国经济，而不是中国经济。

美国商会会长比尔·卡迈克尔指着克里斯托弗的鼻子对他说：“如果不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不仅会阻碍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进展，因为美国投资者将减少在中国的活动，因而无法把西方的价值观带入中国，这势必会对美国商业产生灾难性后果。”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驻中国代表威廉·沃里克也站起来，情绪非常激动地向克里斯托弗喊道：“你明不明白，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公司若不能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竞争，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将因此而在长时期内成为大输家。”他还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这个正脱颖而出的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何况它在世界舞台上是有竞争力的。”说到这里，沃里克向克里斯托弗递交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一份材料，并告诉克里斯托弗：“如果美国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招致中国进行报复的话，我们公司将在今后十年中损失数百亿美元。”

也许是克里斯托弗们的嚣张气焰受到了中国方面的严厉打击，也许是由于美国企业家们施加了强大压力的缘故，3月13日上午10时45分，中国国

家主席江泽民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克里斯托弗一行时，克里斯托弗们的谈话口气已经显得温和多了。他首先向江泽民主席递交了一封克林顿总统致江主席的亲笔信。接着，他也非常谦恭地对江泽民说：“克林顿总统决定在美中之间建立一种更广泛的、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希望美中双方要抓住机遇，采取积极行动，将中美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既然克里斯托弗等人语调已经逐步变得和缓，江泽民主席当然欢迎。他也很温和地向克里斯托弗等人说：“中美关系应当放在世界范围内和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来考虑。”江泽民强调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主权国家，有分歧可以讨论，但要平等，相互尊重，而不能干涉对方内政。中美两国应当好起来，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

3月14日上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克里斯托弗进行了最后一轮会谈。由于最为敏感，也是最为棘手的人权问题已经讨论完毕，在此后的其他问题上，双方都采取了较为务实的立场，所以双方会谈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在他们两人会谈结束后，钱其琛列举了两人会谈的几大成果：双方都同意继续保持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往来与接触，在这次克里斯托弗访华后不久，中国将派出国务委员宋健及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吴仪出访美国出席中美科技、商贸混合委员会会议；美国方面再次重申了支持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的立场；双方同意恢复军事交流与合作；双方签署了关于执行劳动产品备忘录合作声明。但是，在最重要的人权问题上，两国分歧特别明显，因而也没有达成任何一致。

3月14日下午，克里斯托弗一行离开北京回国。他在离开北京之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三天人权问题会谈中，“我们开始缩小分歧，但我不会称之为‘突破’。”“显然需要多做一些工作。”但他也暗示，美国政府将会重新考虑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脱钩。他说：“人们可以设想总统将下达一项不像现在这样详细的命令，也许人权问题可能成为一个一般性条件，而不再附带许多具体条件。”

但是，由于克里斯托弗此行并没有在人权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这使克林顿大失所望。就在克里斯托弗结束中国之行的同一天，正在底特律出席关于就业问题的有关会议的克林顿在记者招待会上称，他“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并说，“我们的政策照旧不变。我们只好等着瞧一瞧，从现在起到6月份这段时间内出现什么情况。我将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判断。”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多难历程

在90年代，经济问题正在逐步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双方除了在最惠国贸易待遇问题上进行过激烈交锋之外，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斗争也异常惨烈和惊心动魄。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众多知识产权的大国，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常常居于优

势和主导地位。美国的版权工业、药品工业、计算机软件及音像制品不但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而且也是美国经济发展及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因此，如何将这些产品打入别国市场，并保护其知识产权不受别国侵犯一直是美国朝野非常关注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开始合作始于 1979 年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时，与美国方面共同签署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此后，随着双方贸易额的大幅度增加以及美国科技、文化产品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也日益突出。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美中两国围绕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艰难谈判。由于美国人无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双方谈判长期没有结果，一直到 1991 年 1 月 17 日，双方才达成一致意见，并在华盛顿签署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一直相安无事。但是，到了 1994 年 2 月，美国政府再次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侵权行为失控”为由，向中国方面提出知识产权问题，并威胁说要对中国进行报复。知识产权问题的争论再次趋于激烈。

为了解决双方存在的分歧，1994 年 2 月 24—25 日，中美两国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谈判在北京举行。美国政府派出了贸易代表处中蒙处处长李森智为首席谈判代表。其他成员还包括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务院及司法部的官员；而中国方面则由对外经济贸易部条法司副司长张月姣女士为团长，成员中除了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外，国务院法制局、国家科委、中国专利局等单位也派人出席了这次谈判。

24 日上午 9 点整，中美双方谈判代表表情严肃地坐到了谈判桌前。会议厅里没有代表们的谈笑，只有双方非常冷淡的握手和寒暄。张月姣副司长首先代表中国方面致词。她说：“中国政府历来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从 1992 年以来，中国已经修改了《专利法》，重点是扩大保护范围，延长保护期限；修改了《商标法》，特别增加了刑事处罚条款，并增加了保护服务商标的有关内容；与此同时，中国还加入了包括《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等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国际组织或条约。应该说，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说到这里，张副司长从手提包里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一堆文件，交给了美国首席代表李森智。接着说道：“中国政府为了保护美国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甚至付出了极大的经济代价，希望美国方面能对此作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至于制止侵权行为问题，希望美国方面给予合作，一旦发现有关侵权企业，中国方面将立即予以查处。”

但是张副司长的一番话并没有打动李森智，只见他手里拿着张副司长交给他的材料，非常不屑地对中方代表说：

“在政策方面你可以给我一大堆材料，但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材料，我

们需要的是行动，是你们打击侵权行为的表现。”

李森智站起来，向中国代表继续说道：

“你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制止任何侵权行为，尤其是版权方面的严重盗版行为，关闭你们的 CD 盘生产厂，关闭那些出售盗版书的书店；你们还必须在立法和行动措施方面取得具体进展，并列出一份执行这一计划的具体时间表：你们还必须分阶段取消对音像制品的进口配额及相应降低部分关税。”

面对着李森智等人的无理指责，特别是对他们超出本次谈判内容的一些无理要求，中国代表已经忍无可忍。一位来自国家版权局的代表也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对美国代表说：

“我们仅用了几年时间就走过了你们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我们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完善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你们对此却视而不见；对我们作出的解释，你们也充耳不闻。你们到底要我们干什么？”“我们没有时间来听你们苍白的说教，我们需要的是行动，你们懂不懂？”美国代表已经顾不上外交礼仪，大声向中国代表喊道。

由于中美双方在这几个问题立场相距甚远，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同年 6 月，中美两国代表又在华盛顿举行过一轮谈判，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

1994 年 10 月 12—13 日，中美两国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第五轮谈判在北京举行。

双方代表正式落座，这个时候已经由中蒙处处长提升为贸易代表助理帮办的美方首席代表李森智更显得踌躇满志。他还没有顾得上寒暄，便向中国代表团团长张月姣递交了一份《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中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及一份附件，并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向张副司长说：“中美双方今天必须签署这份书面协议，否则我们便不得不根据美国的有关法律对你们进行制裁了。”

张副司长接过这份文件，非常迷惑地向李森智看了看，真不知这个美国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随后，她非常快捷地翻了翻这份文件，只见上面列出了非常详细的协议内容。

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一切侵权行为。包括在三十天内，对中国的每个大城市和其他知识产权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建立起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协调力量，着手解决具体侵权行为；从 1995 年 1 月起，中国政府每季度向美国政府呈报有关打击侵权行为的进展情况；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通过新闻媒介进行广泛宣传；

要求中国建立具体的实施制度。包括修改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案；巩固国务院知识产权会议制度；以法令形式确定中国版权局是中国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唯一主管部门，专利局是唯一的专利保护部门；

关于知识产权的市场准入。中国政府应该为知识产权及服务提供公平和开放的市场准入。

“简直是岂有此理！”张副司长看到这里，愤愤地嘀咕了一句。她将中国代表们召集在一起，临时研究了一下应变方略。

中方代表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备忘录》的许多内容超出了乌拉圭回合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有关规定，中国方面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些无理要求。

“帮办先生，您提出的这些要求实在是太过份了，我们认为是无法接受的。”张副司长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当即向李森智表示：“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水平越来越高，而你们美国政府对美国施加的压力却越来越大，特别是你们将中国的复关问题与知识产权保护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接不接受是你们的事，我们已经奉坎特大使的命令，如果你们不签署这份协议，我们便要根据美国的法律对你们进行制裁。”李森智又搬出了他们的“大棒政策”。

美国代表的傲慢无礼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代表的心。一位年轻的中国代表马上站起来向李森智说道。

“你们也不要老拿制裁进行威胁。说句老实话，我们根本就不怕你们的制裁！如果你们真的要进行报复，我们也将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按照我们的有关法律进行报复。我奉劝你们还是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处理知识产权问题。如果进行制裁，我们将奉陪到底！”

就这样，这次谈判又不欢而散。

时间在一天一天过去，离美国方面宣布要对华进行制裁的最后期限也越来越近。此时的中美双方都已经意识到，谁也无法打赢这场艰难的贸易战争。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然没有松动，贸易战的危险依然是一触即发。

12月15日，中美两国代表在北京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再次进行谈判。美方谈判代表错误地认为，由于离美国宣布的调查期限越来越近，中国人因为害怕制裁，肯定要在这一期限之前作出让步。因此，会谈刚刚开始，美方代表便连珠炮似的向中国代表发起了一阵接一阵的攻击：

“这些搞盗版的企业不都是你们的国有企业吗？你们政府为什么不下令统统关闭呢？”这是美方首席代表李森智的声音。

“你们的司法制度根本就不可信。”另一位美国代表也在一边帮腔。

“你们的市场完全失控，而且平时执法也不严格，你们应该尽快建立起统一的执法机构。”另一位美国代表甚至咆哮起来。

美国人当然不知道，在这次谈判之前，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已经指示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我们可以作出让步，但美国人如果想利用知识产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绝对办不到。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中国代表的腰杆子也硬朗了许多。但从维护中美关系这个大局出发，中方还是始终保持着克制，并向美国方面提交了一份根据中国国务院知识产权问题办公会议精神起草的《联合声明》（草案）。

这份《联合声明》（草案）重申了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所作的种种努力，同时根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要求美国方面承诺按 TRIPS 要求修改他们的专利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而且按照美国人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美国也应该承诺在本国建立起著作权认可制度，在海关对出口产品实施保护知识产权的边境保护措施。

“NO，NO！你们的这一文本将激怒我们的坎特大使，也是美国社会各界所无法接受的。”李森智想不到中国人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他看到这一文件后，神色为之大变。

“既然你们接受不了我们的协议，我们也不可能接受你们这种凌驾于我们之上的决议。”中国代表明确表示了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由于双方立场都很强硬，第一天谈判很快便出现了僵局。

这个时候，李森智等人也开始着急起来。本来，通过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方面作出让步才是美国人的真正目的，而一旦谈判破裂，他们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这场贸易战所造成的后果。

“你们的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不是制定过一个《实施要点》吗？能不能在这个《实施要点》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一些要求，然后通过交换文件的方式结束这场谈判呢？”李森智试探地问一句。“当然可以，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事先声明，我们不同意市场准入问题在知识产权范围内进行磋商。另外，关于立法问题，最好是以你们提出建议的形式来处理。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张月姣再次将球踢给了美国人。李森智和他的助手们商榷了一会，终于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由于前一天晚上双方的协商已经出现了良好势头，第二天上午开始会谈时双方代表也露出了近几天少有的笑容。不料会谈正式开始后，马上便风云突变。美国人不仅将他们在前几轮谈判中所列出的无理要求全部写进了《实施要点》增补草案，而且还出尔反尔，在这份协议文本中写上了市场准入必须与知识产权问题同步进行的有关内容。

“美国人太不讲信用了。”中方代表看到美国人递上来的《修改草案》，心里这样想着。但为了不使谈判破裂，中方代表还是表示可以用最大努力，再次对这一文本进行修改，并争取在 12 月 16 日上午提出正式修改文本。接着，双方代表分别返回各自的住所，对有关文件进行最后润色，并与美国代表相约在当日下午 3 点整继续会谈。

12 月 15 日下午 2 点多，中国代表如约陆续来到了外经贸部会议大厅，等待着美方代表的到来。但是，到了下午 3 点钟，依然见不到美国代表的踪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几名中国代表在一起议论起来。

“我们给美国驻华使馆打电话问问吧！是不是美国人还有什么别的安排？”一位中国代表提议到。但是，几分钟之后，美国驻华使馆给中国代表的答复不禁使他们目瞪口呆：“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李森智已于当天下午 1 点

半乘飞机去了香港，然后再赴日内瓦参加中国的复关问题谈判。”

“真是欺人太甚！连个招呼也不打，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中国代表接到这个电话后，马上便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中国代表团官员当即将电话打到美国驻华使馆，将他们的经济参赞召到对外经济贸易部会议大厅。面对着中国代表们的严厉质询，这位参赞大人的回答同样让人哭笑不得：

“李森智目前还在香港，如果我们的谈判能取得进展，他还是可以考虑再回到北京主持这次谈判。”

这位参赞话刚出口，中国代表更加怒不可遏：“李森智本人是否愿意回北京继续谈判，这是他本人的事。他回来继续谈，我们欢迎；如果以后再谈，我们也愿意奉陪！”

事实上，美国驻华使馆的这位参赞所说的这番话只是一些官样文章，而李森智本人在到达香港之后，早已宣布这次谈判破裂：

“现在已经到了作出决定的时刻了。”李森智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态度傲慢地表示，“目前离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只剩下两周时间了，如果中国不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话，势必要遭受美国方面的严厉制裁，并危及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前景。坎特大使将在12月31日之前作出决定，是否对中国大量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贸易制裁。”李森智向记者们抛下这句话，随即乘飞机直飞日内瓦。

由于美方首席代表李森智突然不辞而别，致使原定于当月12—18日在中国举行的磋商中断。12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对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断一事表示遗憾。并表示，中美谈判的大门是继续敞开的，但必须是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解决双方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以制裁相威胁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12月31日，美国政府以所谓中国侵犯其知识产权为由单方面宣布，如果中方不能在1995年2月4日之前满足美方提出的要求，美方将对中国进行贸易报复。当日，美贸易代表坎特公布了对华贸易报复清单，其中包括电子、发电机、自行车、鞋、玩具、箱包等中国出口商品，总价值约28亿美元。报复措施生效后，美方将对上述商品征收100%的关税。

美国政府采取的这些行动无疑再次给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火上浇油，中国对此也作出了强硬反应。就在美国方面宣布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同一天，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发言人也指出，中美知识产权问题谈判破裂责任在美方，希望美国纠正对华贸易报复的做法。同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也公布了对美贸易反报复清单，其中包括对进口美国的游戏机、游戏卡、激光唱盘、烟、酒、化妆品加收100%的关税；暂停进口产于美国的电影片、电视片、录像、激光唱盘等。当已中国国家版权局发言人指出，中国在版权保护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美国方面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此时此刻，中美贸易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贸易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

是，中美双方这个时候也都深知，一旦爆发贸易战，势必造成两败俱伤，对谁也没有好处。因此，尽管两国政府在公共场合都表现出异常强硬，但谁也没有关上谈判大门。1995年1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保护知识产权态度坚决，并愿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作出自己的努力。这实际上向美国方面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中方并没有关上谈判大门，希望两国通过谈判化解这种紧张关系。

但是，在1995年1月18—28日，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谈判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双方关系更趋紧张。同年1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说，他已邀请中方派人来华盛顿继续就两国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会谈，以便为在2月4日前达成协议作最后努力。坎特同时又威胁说，如果在2月4日前美中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按原定计划对中国实行贸易报复。1月28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发言人指出，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的责任在美方，中国对此表示遗憾并希望美方重新考虑其立场。这位发言人同时表示，一旦美国实施对华报复措施，中方将迅速实行反报复。

在中国政府提出对美贸易报复清单之后，美国政府也开始害怕事态进一步发展可能对其经济利益产生伤害，于是他们在2月4日重新公布了一份报复清单，涉及报复的产品总价值由28亿美元减少到10.8亿，报复时间也由原来规定的2月4日推迟到2月26日，而且涉及到贸易报复的商品也都是与美国消费者影响较少的非重点商品。

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中国方面当然胸有成竹。就在美国方面重新宣布报复清单的同一天，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也公布中国对美国的反报复清单，其中包括对原产于美国的各种游戏机、游戏卡、录音带、激光唱盘、烟、酒、化妆品、照相胶卷、程控电话交换机加收100%关税，暂停进口产于美国的电影片、电视片及录像、激光视盘等。

2月5日，中国人刚刚度过了传统节日——春节，并开始陆续恢复上班。当天上午7时50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吴仪乘车来到东长安街二号，中国对外经济部办公大楼。当她刚刚从小轿车里探出个头，马上便被一大批守候在这里的记者们团团围住。

“美国已经决定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你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回应美国方面的制裁？”

“你们今后是不是还会进行谈判？”

记者们发出了一连串提问。

吴仪这位有着“中国铁娘子”美誉的女部长对记者们的“围攻”早已不是第一次。因此，她使劲从车里钻出来，不慌不忙地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美国人的制裁没有什么了不起！”吴仪果然出言不凡，“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施反报复措施，这一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市场已经完全实现了多元化。美国的制裁措施对我们的影响实在算不了什么。我想别的国家也许更加高兴，因为他们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在中国进行贸易。”

“今后是否会重新开始谈判，必须由中美双方进行磋商才能确定。”

“在目前这种气氛下，我本人肯定不会赴华盛顿进行谈判。”吴仪语调坚定地说，“至于是否派代表团赴美国继续谈判，我们还没有最后确定。”

但是，此时的中美双方都完全明白，真正打一场贸易战，双方都将受到严重损失。据统计，1994 年中美双方的贸易额已达 354 亿美元，比 1993 年增加了 28%。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况且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既快且稳，特别是中国所拥有的潜在市场更使美国人怦然心动。因此，即使在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时，美国方面仍对谈判解决这一争端存在一线希望。

1 月 28 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破裂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美国人也开始坐立不安起来。

2 月 4 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致信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邀请中国派团去华盛顿恢复谈判，并建议 2 月 13 日进行两国知识产权磋商。

2 月 5 日，吴仪复函坎特，同意美方建议，并提出在北京举行磋商。

2 月 6 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言人在北京宣布，中国方面已经接受了美国方面提出的恢复谈判的建议，只是在谈判时间和地点问题上，还有待于中美双方进一步磋商决定。

同一天，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发言人朱敏才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美国的这一新的立场，但只有等到美国方面的正式邀请，我们才能作出回答。”

2 月 15 日，由李森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终于出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但几天的谈判情况表明，这场艰难的谈判看来很难取得突破，特别是李森智本人的顽固立场更是成为这次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最后一轮谈判的破裂，中国代表团提议，在最后几天的谈判，将会谈级别由司局级提高到副部级，希望通过更高层次的接触来打破这种僵局。随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孙振宇向美国贸易副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发出了访华邀请，希望由她出面主持谈判。美国方面随即致电孙振宇，表示巴尔舍夫斯基将接受邀请。

2 月 21 日，美国副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抵达北京，与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共同主持两国知识产权问题磋商。果然，在会谈的最后关头，双方都表现出了谈判的诚意，谈判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最后在 2 月 26 日达成协议，从而避免了一场贸易战。

这次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中国将用六个月时间，组织“特别行动组”广泛突击检查有盗版嫌疑的工厂，并将检查情况向美国通报；中国将在全国各地设立“知识产权会议工作组”，并加强实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特别是加强海关检查及执法力度；允许美国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公司在中国开设合资企业，推销其产品，不对美国音像制品的进口规定配额，为美国版权所

有者提供更多的进入中国的机会，而美国方面则放弃要求中国修改现行法律制度等无理要求。可以说，这是一个互谅互让，实现“双赢”的较为理想的结果。

同一天，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和美国副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共同草签了两国政府换函。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出席了草签仪式。

这一协议的签署在中美两国都引起了良好反应。比尔·克林顿总统当天赞扬中美就版权问题达成的新协议。他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协议”。“它意味着美国人在一些主要行业中获得数以千计的新就业机会，包括计算机软件、药品、农产品和化学制品、书籍和刊物以及用于出口的视听产品。”国际舆论也大都称赞这一协议“避免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贸易战”，“为中美双方避免最后摊牌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李登辉访美闹剧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反华势力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便不断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他们在玩弄“人权牌”、“经贸牌”失败后，又相继祭出了“台湾牌”、“西藏牌”，企图为霸权主义的亡灵招魂。美国反华势力的这种图谋与李登辉形统实独的“务实外交”

一拍即合。几年来，这两股势力一直在眉来眼去，过从甚密。1995年6月，李登辉终于踏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美国土地。这一行动理所当然引起所有炎黄子孙的强烈愤慨和猛烈抨击，中国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中美关系再次步入泥沼……

对台政策的悄然变化

被称为“恶魔帝国”的苏联解体后，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对中国没有步苏联后尘总感到于心不甘。于是，他们便处心积虑，要利用各种机会来整中国。而所谓“走上了民主主义道路并彻底实行市场经济”的台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了。事实上，在布什当政的时候，美国的对台政策便开始发生变化。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曾于1992年11月30日访问过台湾，成为中美建交以来，美国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官员。

克林顿上台后不久，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便围绕美国对台政策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双方的焦点不是要不要与台湾搞好关系，而是如何搞好关系，有人主张奉行现在这种“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明确反对“台独”，认为这样既可以确保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又能避免中美关系破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应该明确支持台湾独立，他们鼓吹“台湾是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一个重要杠杆”，美国应该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甚至有人提出美国应该立即与台湾“建交”。但最后讨论的结果，主张奉行现行对台政策的一方明显占了上风。引人瞩目的是，即使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也都主张改善与台湾的关系。

1993年，中美两国在经历了“银河号”事件，对华最惠国贸易待遇等问题的激烈交锋之后，两国关系更为严峻。因此，美国国内要求提升对台关系，并以此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重要筹码的呼声也日益强烈。

1994年初，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会同国务院、国防部以及美国参众两院主管外交事务的负责人，联合撰写了《东亚地区战略调整》的调研报告。《报告》的对华政策部分特别谈到了中国拥有原子弹、氢弹；加之近年来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海军实力也在迅速壮大，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将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及时调整其东亚战略，伸使其在亚洲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这些人为美国设

计的亚洲战略是：

首先，继续保持美国在亚大地区的军事存在，即通过美韩及美日安全条约维持美国在亚大地区的 10 万驻军；

其次，继续利用民主、人权及贸易手段“推动中国的和平演变”，“引导中国从政策上变成（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再次，搞好与中国的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时通过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从这三个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份报告写道：“美国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在经济方面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努力通过贸易手段促成中国局势的演变。与此同时，在台湾、西藏、甚至南沙问题上支持和煽动分离主义倾向。”报告最后还说：“美国政府应该立即调整对台政策，以便将‘台湾牌，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对台政策便在不断升级。

1994 年 9 月 7 日上午 11 时，美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约见了台湾驻美代表丁懋时。洛德当即向丁懋时表示，美国已经同意将台湾驻美国的代表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国办事处”更名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同时他还宣布了美国对台的新政策：美国政府将与台湾当局进行更高层次的接触；美国愿意与台湾进行内阁部长级的经济对话；允许美国和台湾的官员在除白宫和美国国务院以外的机构进行会晤；除必要的过境外，美国将不允许台湾的高级领导人（包括台湾“总统”、“副总统”和“行政院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访问美国，台湾“外交部长”仍然不能到华盛顿，“国防部长”不能赴美国访问；美国允许经济和技术机构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访问台湾。但美国高级领导人，或没有担任经济、技术机构部长级职务的官员也不能访问台湾；美国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并努力促进台湾加入与关贸总协定类似的国际组织，但反对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

就在同一天，洛德还以“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身分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解释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原因。

有记者问：“美国这次调整对台政策是否意味着美国政府已经改变了‘一个中国’政策？”

洛德诡辩道：“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丝毫也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立场的基本承认，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洛德接着说：“美国同台湾当局进行更高层次的接触，目的是为了解决双方关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双边经贸往来的相互需要，任何人都不要误以为这是美国与台湾方面发展官方关系。”

洛德的这番辩解无论如何都显得苍白无力。中美两国政府一起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已经明确地写上了“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条文，白纸黑字，不容否认。但这次政策调整又公然允许台湾的“内阁部长”赴美国进行访问，这是公开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治行动，

因而理所当然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

就在洛德宣布美国政府的这次政策调整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就奉命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向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刘华秋警告说，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关系不仅要停滞，而且还会倒退。

然而，美国政府对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一直置若罔闻。他们声称在此时推出新的对台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其实，早在1993年冬天，美国政府内部就有人要求克林顿调整对台政策，只是考虑到中国方面的反应才拖延下来。但是，在1994年5月份，由于美国政府不准台湾“总统”李登辉在前往中美洲途中在夏威夷停留过夜，这一事件经过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之后，在美国国会和台湾引起了一阵激烈的抗议浪潮。美国的一些所谓的智囊机构开始为克林顿出谋划策，提出了一系列改变对台政策的主张。

受共和党影响的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在1994年9月初公布的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报告书指出：“克林顿政权应为台湾加入联合国和提高国际地位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应在‘不与中国为敌’的情况下加强美台关系。”他们甚至说：“由此导致的中台加强经济关系从长期来讲将削弱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报告书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因为这是“冷战结束的象征”，在资金方面对联合国也有好处。而且采取这一行动还会使要求台湾独立运动的进展速度放慢，缓和中台关系，也会增加中台双方非正式接触和进行协商的机会。

其第二个建议是中台同时加入关贸总协定。其好处是：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可更有效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不均衡及产业保护等悬案，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可削弱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和贸易体制的支配。报告书提出的第三个建议是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以“维持台湾对中国实行军事现代化的抑制力”。报告书指出：“对美国来说，长期的最大利益是台湾对中国国内的企业主阶级的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随着中台间经济联系增多，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和影响将削弱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和政治的统治。”

正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所以中国政府的警告与严正立场并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足够重视，相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还越走越远。就在克林顿政府宣布调整对台政策后不久，美国国会的一些反华势力又在策划邀请李登辉访美的重大行动。

“院外集团”上窜下跳

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各个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就某个问题向国会议员或政府行政官员进行游说活动，这也是法律所允许的。因此，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许多政治势力纷纷对政府各部门及国会议员进行了声势

浩大的游说活动。

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院外活动集团”可谓声名远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即不时派出游说集团到美国进行活动，以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当时的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及其美国朋友可以说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最早的游说势力。

1949年，中国解放后，国民党势力在美国的影响日趋式微，他们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便只好启用其庞大的“院外活动集团”，以寻求美国政府支持。当时著名的出版界巨头亨利·鲁斯及众议员沃尔特·朱迪都是活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著名游说人士。他们曾成立“百万人行动委员会”，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同时支持麦卡锡等人发起了大规模的追究“谁失去中国”运动。在当时海峡两岸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股势力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一度甚嚣尘上，以至60年代历届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无不受其掣肘。

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出于其全球战略考虑，不得不将发展对华关系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尽管台湾当局在美国仍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说，但这些活动终究改变不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当然，他们也不时利用其影响，在中美之间兴风作浪。在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80年代美国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等等重大事件中也都有一些“院外活动集团”的身影。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再次掀起了阵阵风浪。台湾当局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也加紧了院外游说活动，并再次掀起了巨大波澜。

根据美国司法部最近给国会的报告，1991年（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最新的资料），已经在司法部正式登记的为台湾进行游说活动的公司和个人共有五十一个，获得的报酬总额为510多万美元。

从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到9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在美国聘请的游说代理大多是从从事经济方面的游说公司，特别是其“经济部”下属的“国贸局”以及具有官方色彩的对外贸易协会聘请的游说代理公司最多。以1991年为例，代表“国贸局”进行游说活动的公司和个人达十一个，替对外贸易协会进行游说的有十二个。他们在美国的游说经费也最多。在1988—1991年间，“国贸局”的游说经费达382.5万美元，对外贸易协会的游说经费也达419.5万美元，平均每年用于游说活动的经费都在百万美元以上。

进入90年代以后，出于其“务实外交”的目的，台湾当局在美国进行的“政治游说”也日益增强，其出手之阔绰，花销经费之巨大都堪称史无前例。

从1993年开始，李登辉在完成了他所谓的“民主宪政改革”和“台湾政权的本地化”目标后，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以使台湾“获得一个独立的国际人格”。他们以金钱铺路，不断买通各路关系，开始以“度假外交”、“学术外交”等多种形式在世界各地“四处点火”，并频频得手。

1994年元旦和春节期间，台湾“行政院长”连战和“总统”李登辉先后以“度假”形式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泰国，并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1995年4月1—4日，李登辉偕同“经济部长”江丙坤等高级官员又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王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台湾当局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他们深知，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大国小国的影响与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不仅能左右当今国际政治，而且给其他国家的“榜样”和示范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李登辉在不断到亚非一些国家去“度假”之外，还指示他的心腹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早日实现访问美国的愿望。

根据李登辉的指示，台湾的一些党政要员纷纷出马，向美国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他们一方面以570万美元的“公关”费用买通卡西迪公共关系公司，请其代为疏通华盛顿方方面面的关系，另一路是直接进军美国各州政府，力图以“地方压中央”的方式迫使美国政府改变其“一个中国”政策。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台湾当局不惜大规模花费台湾人民的血汗钱。据台湾当局自己公布的预算方案，他们计划在1995年花费28.22亿新台币（约合1.1亿美元）用于“外交公关”活动，其中相当一部分通过各大游说集团而流进了美国人的腰包。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台湾当局向美国提供的百万美元以上的巨款便有：以“李登辉之友”的名义先后向康奈尔大学捐款450万美元，这笔巨款终于使“学术自由”的康奈尔大学拜倒在他们的“银弹攻势”之下；美国乔治敦大学为了实现一项留学生交流计划急需一笔资金，台湾当局又毫不犹豫寄去了100万美元；近年来，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地方政府官员纷纷到台湾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他们在台湾的一切开支也大多由台湾当局直接报销。

台湾当局的银弹攻势很快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从1994年以来，美国先后有二十四个州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联邦政府给予台湾当局以特别待遇；而进入1995年以后，一些长期享受台湾恩惠的国会议员更是不断发动宣传攻势，从而最终实现了李登辉访美。

为李登辉访美造势

在台湾当局“银弹外交”推动下，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他们的短期目标是实现李登辉访美，而长期目标则是迫使美国政府公开奉行“两个中国”政策。

尽管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不断表示信守“一个中国”政策，但实际上奉行的却是“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所以从两国建交以来，违犯三个联合公报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特别是台湾高级官员不断访美更是公开的秘密。

据日本时事社驻华盛顿记者透露，台湾“行政院长”连战在1993年2月就任现职后已经两度访美。“外交部长”钱复大约每年都要去美国，访问波士顿和科罗拉多州等。另外，前“行政院长”俞国华也在1984年到1989年担任“院长”时期数次访问美国，去过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地。这些人都是以“私人身份”进行的非正式访问。但是，这些“政府官员”和这次的李登辉访美一样，都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正式的旅游签证。并且在美国逗留期间同美国国务院官员进行了会谈。而且李登辉本人也在担任“副总统”期间的1985年访问过美国，在纽约同当时的助理国务卿李洁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进行了会谈。他当时还参观了纽约州西点陆军军官学校，被作为要人受到了欢迎。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反华势力觉得这种秘密“访问”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反华需要，他们需要给李登辉一个“名分”，要大张旗鼓为李登辉的“访问”造势。当然，这种图谋始终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1994年5月，李登辉“出访”尼加拉瓜时曾有意到夏威夷“加油”，但因为中国政府事先得悉情况，并马上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这一图谋没有得逞。当李登辉来到夏威夷停留时，他接到美国国务院的通知，不得不呆在他停在柏油碎石停机坪上的座机里。除了美国对台协会华盛顿办事处负责人纳特·贝洛基（白乐崎）之外，美国外交官或官员没有一人前去迎接。

李登辉这次“闯关”失败使美国一些反华势力大为光火，他们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介大肆攻击美国政府在中国人面前“屈膝投降”，另一方面则四处活动，力图通过其他手段达到邀请李登辉访美的目的。

1994年8月12日，由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国际经济政策小组主席葛简生领衔的三十七位美国国会两党众议员联名致函李登辉，邀请他正式访问美国。葛简生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他们的这一举动时指出：

“我们知道此事并非一夕可成，我们不断提出这件事情所要表达的正是，美国对台湾政策必需改弦易辙了。”

他们还说：“我们之所以要联名致函邀请李登辉访美，不但是因为我们与七十六位参议员一样，要藉此表达对李登辉的‘友好情谊’。而且我们都曾访问过台湾，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美国与中华民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

当然，美国的反华势力也深知，李登辉的任何访美行动都将遇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因此必须找到合适的借口，甚至通过某种特别法令才能做到“名正言顺”，而这个时候要修改《与台湾关系法》可能引起的震荡太大，因此只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经过几个月密谋策划，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便是通过《移民法》修正案，以便为李登辉访美找寻法律依据。

1994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包含有下列文字的移民及国籍技术修订法案。这项条文原始提案人为参议员布朗（共和党），该条文内容如后：

“台湾的总统或其他高层官员，为了与美国联邦或州政府官员讨论下列

事项而申请访美时，应获准进入美国，除非该官员为移民法所禁止入境：

- 一、与台湾贸易或商务交流将减少美国对台贸易赤字；
- 二、防止核子扩散；
- 三、对美国国家安全之威胁；
- 四、保护全球环境；
- 五、保护濒临绝种生物；
- 六、区域灾害。”

本来美国的外交主导权掌握在总统手中，而这项条文又说如果为移民法所禁止入境，台湾的高层官员仍将不得其门而入。而且《移民法》还有一条特别规定，如果美国政府基于外交政策的需要，并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某外籍人士的入境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严重不利之后果，便可禁止其入境。所以如果美国政府真正有意阻止李登辉访问美国时，完全可以不受“三权分立”影响。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美国调整对台政策酝酿已久，而且这一政策也得到了共和、民主两党的全力支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总统与国会的意见是一致的，因此克林顿总统在10月25日正式签署这一法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克林顿作为一国总统，他的一言一行还不能完全像国会议员那么放纵，他虽然希望提升对台关系，但也不能不考虑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应。因此，他在批准这个法案的时候，也指示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考虑台湾官员访美事情时，务必特别审慎衡量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这些利益包括：维持海峡两岸的稳定与繁荣，美国对台及对华关系全局，努力在这些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说法的一个潜台词就是，只要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利，美国将批准李登辉访美。在此后一段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仍然不断变化，最后居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批准李登辉的美国之行。

随着《移民法》修正案在美国国会的通过，李登辉访美已经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了。不过，李登辉访美既然属于“私访”，总得找到一个邀请和接待者，而且还要找出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让美国政府“难以拒绝”。而这个时候，另一位所谓的“中国通”、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跑到台湾，为李登辉访美献出了“绝妙”的一计。

李洁明献计刘泰英公关

李洁明在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前，还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北站站长，当时便与李登辉等人打得火热。

1994年2月，李洁明应邀出访台北，自然而然要与“老朋友”李登辉见上一面。两人从数年前在台北的交往，谈到近年来中美关系，及美国对台关系的发展。这时李登辉面露难色地说：

“要打开美国对台政策的缺口，看来还得进行高层接触才行。但我们之

间现在没有外交关系，如何才能打开这个缺口呢？”

李洁明果然是一位情报专家，略微思考了一会，随即凑到李登辉的耳边说出了他的“锦囊妙计”：

“如果您愿意近期内访美，可由您的母校、著名的康奈尔大学向您授予荣誉博士称号。这样既可以找到接待单位，又可以使美国政府‘无法拒绝’。”

经过李洁明这一点拨，李登辉终于茅塞顿开。他紧紧地握着李洁明的手，连称：“这样好，这样好！”他当即指示坐在身边的心腹密友、台湾国民党党营事业委员会主任刘泰英出面促成此事。

提起刘泰英这个人，这里不得不重点交待一下。这位祖籍台湾的政坛显贵，出生于一个贫苦人家庭，他依靠其姐姐的帮助勉强进入了台湾大学学习，并结识了当时在那里任教的李登辉，两人当时言谈颇为投合，并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60年代，李登辉和刘泰英先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两人又由师生变为同学，来往也更为密切。李登辉回台湾飞黄腾达后，刘泰英也得到这位“良师益友”的重用与提携。到目前为止，刘泰英担任的职务除了掌握财政大权的国民党党营事业委员会主任之外，他还兼任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他的公开身份是学者，但后来所从事的却都是“惊天动地”的事业。1994年春节前后，李登辉赴菲律宾、印尼、泰国等地“度假”便是刘泰英一手策划，也是他从事“银弹外交”的第一篇“杰作”。这次李登辉想实现访美这种既高度机密，又与“党国”关系重大的事理所当然又得由刘泰英亲自出马了。

刘泰英接获“师友”的命令后，当即乘飞机直奔美国，并马上找到了著名的公共关系公司——卡西迪公共关系公司，与这家公司洽商李登辉访美事宜。经过几天的谈判，卡西迪公共关系公司终于同意为李登辉访美进行游说，当然，他们获得的报酬是非常丰厚的：刘泰英以“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身份每年向该公司提供200万美金，条件是该公司必须为李登辉访美打通各种环节，特别是争取国会参众两院的全力支持。

在与卡西迪公共关系公司的谈判取得成功之后，刘泰英又马不停蹄，跑到康奈尔大学拜会了罗茨校长。

当时，这位校长大人正在为学校经费紧张之事劳心伤神，看到这位台湾客人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马上两眼发亮。他知道，这位台湾客人是李登辉身边的红人，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刘泰英此行肯定负有特殊使命。以罗茨校长那种尊贵的身分，当然不好随便向这位客人倾吐心中的苦闷。但刘泰英似乎与他心有灵犀，所以两人交谈了一会，刘泰英就从口袋里缓慢地拿出一张支票，交给了罗茨校长：

“校长先生，这是250万美元的支票，我想在贵校设立一个‘李登辉之友基金会’，不知是否合适？”

“O.K, O.K, 有李总统这样杰出的校友，这是康奈尔大学的光荣。”罗茨校长毫不客气地收下了这张支票。

“这里还有 200 万美元，我想在贵校建立一个‘李登辉国际事务讲座’，能不能请您协助玉成此事？”刘泰英又拿出一张支票放在罗茨校长面前“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但不知道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

“李登辉总统最近一直在想打开通往贵国的大门，但苦干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您看……”说到这里，刘泰英欲言又止，他既然已经下饵，当然要等鱼儿自己上钩。

“没有问题，我可以康奈尔大学的名义向李总统发一封邀请信，至于这边的有关环节，我们也可以帮助想点办法。”罗茨拍着胸脯对刘泰英说。

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果然在刘泰英“银弹外交”的强大威力下，一个又一个美国政界及学术界的“正人君子”很快便拜倒在他的脚下。

在刘泰英的积极活动和努力下，康奈尔大学校长罗茨先后两次赴台湾与李登辉及其同党见面，洽商有关李登辉访美事宜。罗茨还在各种公共场合言必赞李：左一个李登辉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型政治家”，右一个他是“一位带领台湾经济起飞及政治民主化的卓越领导人”。

罗茨还不断向新闻界介绍说，邀请李登辉访美仅仅是对他几十年来所取得成就的恰当鼓励，并以“旅行自由”和“学术自由”向社会各界兜售他的邀请李登辉访美主张。

锣鼓震天闹剧开场

进入 1995 年，台湾当局在美国的“银弹攻势”愈演愈烈，美国国会为台湾当局摇旗呐喊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 1994 年底美国参众两院换届选举后，大批具有强烈反共色彩的保守派共和党人进入国会，他们在国会内掀起了一阵接一阵的反华风浪。

1994 年 12 月 9—10 日，一次题为“美国——台湾政策 1994 年研讨会”在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举行，这次会议主办者是著名的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而参加者不仅有美国各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也有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外交官，甚至还有台湾当局派出的“立法委员”，这些都显示了整个会议浓厚的官方色彩。

这次会议的成果最后以《民主进程中的政策趋势：走向 21 世纪的美国——中华民国的关系》为题于 1995 年 3 月底正式付梓出版。在这本小册子的前言部分，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亚洲委员会副主任克里斯托弗·西古尔开宗明义指出，该委员会举行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以非官方的方式重新考虑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政策”，以便对“中华民国的政治前途及美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李登辉访美作最后的理论准备。

1995 年 2 月初，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许水德率领一个庞大代表团访问美国，会见了包括克林顿总统及美国参、众两院领袖在内的美国众多高级官员。许水德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向这些美国高级领导人推销其“民主

改革”成果，并为争取李登辉访美进行最后游说活动。果然，在他的大肆活动下，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开始改变。

1995年2月9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举行了一次关于台湾问题的听证会，并邀请了国务院亚洲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前来作证。在这次听证会上，洛德寓意深刻地说：“美国虽然不会彻底改变其对台政策，但克林顿总统正授权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全面权衡美国外交利益，认真考虑李登辉访美的问题。”

受洛德讲话的鼓舞，美国国会内的一些亲台势力便开始酝酿采取具体行动以促成李登辉访美。

1995年3月6日，美国参议院三十六名议员联合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克林顿总统批准李登辉访问美国；

3月18日，代表对台贸易及投资者利益的“美中经济委员会”宣布，他们已经决定邀请李登辉出席定于9月22日举行的美台经济合作年会；

3月23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再次通过决议，敦促克林顿立即批准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作“私人访问”，并欢迎李登辉到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过境停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通过这一决议后，还发表声明，如果克林顿政府再次漠视他们的声音，他们就可能修改《移民法》，并重新检讨《与台湾关系法》，以促使美国对台政策的“全面改变”；

3月下旬，康奈尔大学的一些亲台势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台湾有话要说”活动。他们不仅在康奈尔大学征集教职员工的签名，而且还不断派要员赴美国各地进行宣传鼓动，以促成李登辉早日访美；

4月5日上午，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行政当局允许李登辉访美；下午，这些议员又进一步提出了《与台湾关系法修正案》，要求美国国务院不得以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不利为理由，禁止台湾的“民选领袖”到美国进行访问，和上午通过的决议相比，他们提出的这一议案将具有正式法律效力，因此可能产生的后果更为恶劣；

1995年5月2日，美国众议院以396票对零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邀请李登辉访美的决定，一个星期之后，参议院也以97票对一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类似的决定。

从5月中旬开始，美国的主要报刊杂志似乎得风气之先，马上群起为李登辉访美鼓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分别在5月10日、12日和22日发表社论，鼓吹美国政府应该解除对李登辉访美的禁令。

可以说，到1995年上半年，美国国内已经就实现李登辉访美一事基本上作好了准备。但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官员仍在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国绝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例如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2月16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明确表示，美国不想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不希望与台湾发生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因此，“如果前往他地而想在美国过境，

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以‘总统’身分来访则与美台非官方关系不符。”

3月10日，也就是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行政当局允许李登辉访美之后，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谢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将不会给李登辉颁发“延长过境签证”。

3月11日，助理国务卿洛德也发表了一份特别简报，声称“基于安全、方便和舒适的理由”，美国将允许李登辉“延长过境访问”，“但不是决议案中列举的那种访问”。他还说，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或出席美台经济协会年会都“违背了美国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的承诺。”

即使5月下旬，美国政府高层已经达成主张李登辉访美的共识之后，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仍然在一系列公开场合表示，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允许李登辉到美国访问。例如在5月9日，美国参议院表决支持李登辉访美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奥塔还说，如果允许李登辉访美，那将“给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严重后果”。

其实，美国政府的这套说词不过是掩人耳目的烟幕弹。在李登辉及美国国会中一些反华势力策划李登辉访美行动的同时，美国行政当局已经在认真研究李登辉访美可能引发的后果。

5月1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将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等一批“中国通”召集到他的办公室，讨论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允许李登辉访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美国政府拒绝李登辉访美，必将引起国会参、众两院的强烈反抗，美国民主党政府在政治方面将遭受重重打击；而如果批准李登辉访问美国，中国方面可能作出的反应是：召回驻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但不会采取断交或更为强烈的措施。他们认为，美国走这步棋虽然冒着很大风险，但不妨一试。进入5月份以后，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决定允许李登辉访美，只是在李登辉访美究竟采取“过境停留”还是“私人访问”的形式上，美国国务院和白宫之间产生一些意见分歧。最后，白宫否定了国务院提出的要求李登辉以“过境停留”形式进行访问的意见，而直接使用“私人访问”。随后，美国白宫便开始放出可能允许李登辉访美的信息。5月19日，美国白宫发言人麦科里和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麦科里明确表示，李登辉的过境问题“正在考虑之中”。其实，这边麦科里和伯恩斯只是在为“是否允许李登辉访美”制造一些烟幕，而那一边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重大行动。就在麦科里与伯恩斯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官员即前往台湾驻北美事务代表处拜会了台湾方面代表鲁肇忠，告知美国方面已经同意李登辉访美。同时还说，由于康奈尔大学“校友会活动”不久将开始，希望台湾方面马上作出答复。

美国方面的这一立场改变不禁使鲁肇忠等人欣喜若狂。他们当即用电传向台北方面报告了这一“喜讯”，台北方面也当即复电：“一切行动均已就绪。”

5月20日，鲁肇忠专程赴美国国务院拜会了副国务卿韦德曼，告知美国

方面，李登辉已经决定近期赴美，希望美国方面早作准备。

5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公布了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的最后决定，“允许李登辉以纯私人身分访问美国，但不得从事任何官方活动”；同意李登辉参加6月份在康奈尔大学举行的校友会，并在该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放宽对台湾高层官员访美的限制；美国政府行政官员将不与李登辉进行接触，但国会议员是否与会并与李登辉等人进行会见则“悉听尊便”。

克林顿批准李登辉访美的决定实际上是全面推翻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甚至比1994年美国调整对台政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1994年政策规定，台湾“总统”、“副总统”、以及“行政院正副院长”都只能在美国“过境”，而不能进行“私人访问”，而新政策却规定，台湾高层人士的访美要求将按“个案处理”。只要这些访问属于“私人性质”，美国将对此采取“开放政策”。也就是说，不仅这次李登辉能够顺利成行，而且绝对不会“下不为例”，这类活动将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发生。

由于李登辉的特殊身分，不管他以什么身分访美，都改变不了这种访问的官方色彩，这显然违背了美国政府不与台湾当局发展官方关系的承诺，这一点美国政府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在5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得支吾其词。现在请听听他们的精彩对话：

问：“早在几个月之前，助理国务卿洛德曾前往北京，首先是解释——应该是向中国人重申，美国没有重新考虑这一立场。你能否告诉我，国务院已经采取什么措施向中国政府解释为什么改变这一立场？”

答：“这个……正如我刚才对你们所说的，作出这个决定考虑了许多因素……我想……我真的不能指出一个具体因素，但是我只想，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政府采取这一行动，作出这一决定。”

“外交政策不像混凝土，数十年可以一成不变。我们的政策当然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问：“不过，当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显然打算同李登辉会晤时，你怎么能强调说它是非官方的？”

答：“我们只能根据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行动来指导自己。从日常的外交来看，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实际上是行政部门行动的基础。”……“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一位国会议员说：他或她应当或者不应当会晤李总统。那是必须由国会议员自己作出的决定，我们真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示态度。”……“鉴于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基础——即三项联合公报——的理解，我们确实负有责任。我们确实有承诺要确保我们有关台湾当局的联系活动要符合同中国的关系，意思是说不会有官方接触……不会同美国政府官员进行接触。”

“台独分子”的丑恶表演

克林顿政府决定让李登辉赴康奈尔大学进行“校友外交”后，李登辉等人便粉墨登场，开始了他的“独台”表演。

1995年6月7日，李登辉带着他的老婆孩子，以及包括新闻局长胡志强在内的一班高级官员启程前往美国。

李登辉等人包乘一架编号为B164航班的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经过在洛杉矶短暂停留之后直飞纽约。

6月的纽约正值盛夏时节，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整个机场就像一个大蒸笼，让人喘不过气来。但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纽约州参议员托马斯和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穆考尔斯基为代表的欢迎队伍仍然冒着近37度的高温一直恭候在候机大楼。6月8日下午4时30分，李登辉乘坐的专机降落在纽约的雪城国际机场，飞机刚刚停稳，早已守候在一旁的机场工作人员迅速铺好了红地毯。为了表示对这位“总统”的尊敬，纽约市市长柏拉迪和台湾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子丹登上李登辉乘坐的专机迎接。

机舱门打开了，身著深蓝色西服的李登辉在柏拉迪等人簇拥下出现在舷梯上。尽管他满脸倦容，但依然强打起精神向站在候机楼里的人群挥手致意。赫尔姆斯等人迅速走上前去，与李登辉紧紧握手，并把李登辉领到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欢迎现场”。

“我们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口袋里装着李登辉赠送的450万元铺路钱的康奈尔大学校长罗茨首先致欢迎词。“我们为有李总统这样杰出的政治领袖而感到骄傲。”罗茨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句肉麻的欢迎词。

纽约州参议员托马斯是作为东道主来欢迎李登辉的，他的欢迎词当然得有点主人的味道：

“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在李登辉先生的一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台湾在李总统的领导下，成为世界上进步的强有力的推动者。台湾对公平选举和自由市场的执著应该受到表扬。”

轮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致词了。这位素有“冷战骑士”之称的参议员近年来颇感失落。由于苏联集团的崩溃，他实际上已经无事可做。而李登辉访美总算给他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武之地。他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我们来到了锡拉丘兹，我希望很快就会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最后，由李登辉粉墨登场，抛出了他的“心里话”：

“我和内人此次康大之行，亦如一次长途旅行的上坡攀行。当我终于到达顶峰时，放眼优美的景色，才感到确实不虚此行。”李登辉神气活现地说道。

“我一直深信，只要有决心和毅力，一个人就可以实现他的梦想。”

说到这里，李登辉更是得意洋洋，一句积攒多年的英语也就脱口而出：

“BE REALISTIC DEMAND, DOING THE IMPOSSIBLE。”（面对现实，向

不可能的事物提出挑战)。

这句话一出口，李登辉便想到，自己作为“一国元首”，行为不能太放肆，因此，他又改用中文继续宣示他的决心：

“有人说，我们不可能参加联合国，我们就是要向‘不可能，挑战，突破这个‘不可能’。若我们不面对此挑战，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便没有对子孙后代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

在罗茨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当天晚上，李登辉和赫尔姆斯等人又是共进晚餐，又是开怀叙旧，折腾了很久很久。当罗茨等人将李登辉送到他们租住的宾馆时，时针已经指向了12点30分。

李登辉这时候已经感到十分疲倦，但心绪却无法平静下来。想到明天就要在著名的“欧林讲座”上发表他精心炮制的演说，他便更加亢奋起来。他从行李箱中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讲稿，然后拉上窗帘，一个人在宾馆内手舞足蹈，预演了一番。

“不行，这个讲稿就像我在台北的施政演讲，太过于刻板，美国人可能不吃我这一套。”李登辉看了看这份讲稿，自言自语道。接着，他将讲稿放到了一边。本来他想到外面走一走，但这时候，美国空军派出的两架直升机正在他住宿的宾馆上空盘旋，再说门外面到处都是美国政府派来保护他的特工人员，这么晚了再出去也不大妥当。于是，他只好从门口退了回来，并在屋内来回不停地走动起来。

“有了！美国人不是喜欢幽默吗？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李登辉拍了拍自己的脑门，终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6月9日下午3时，李登辉在罗茨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康奈尔大学的亚伯宁体育馆。这座能容纳3000名观众的建筑里早已坐满了罗茨等人精心挑选的“康大校友”。李登辉整了整领带，走上了演讲台。

“本人酷爱高尔夫球，今天到美国来，最高兴的一件事是参加U.S OPEN”。李登辉一开始便抛出了他昨天晚上冥思苦想出来的幽默。U.S OPEN在这里既可以理解为“美国公开赛”，又可说成是“美国对台湾的开放”。这种一语双关的修饰语正是标准的美国幽默。果然，李登辉话音刚落，体育馆内便爆发出了一阵哄堂大笑。

“看来今天的开场白还不错。”李登辉不禁为自己的幽默而暗自得意起来，他的演讲信心也开始大增。

“登辉能在母校的欧林讲座上发表演说，深感荣幸。这一趟返校之行，可以说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不过，内子与本人得以重回康大美丽校园，心中确是颇为愉快。”李登辉从口袋里拿出他的演讲稿，开始照本宣科。

“此次来美参加康奈尔大学校友返校盛会，不仅是登辉个人的殊荣，更重要的，这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2100万同胞共同的荣幸。事实上，此次康奈尔大学邀请本人来访，就是对我国人民过去数十年来，致力国家建设所获成就的一项肯定。”因此，他毫不掩饰地说道，“本人今日所要谈到的主体，

也就是我国的人民。”所谓“私人访问”的实质昭然若揭。

此时此刻，李登辉当然忘不了要谈谈他本人非常得意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和“务实外交”。果然，他在谈论了一番“宪政改革”之后，马上将主题切入了如何拓展国际空间的问题：

“台湾已在和平的过程中，转化为民主政治，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并在亚太地区的国际社会，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中华民国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外交承认，台湾经验在国际上的重大意义，也因此而被低估。……坦白而言，我们的民众，并不满意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地位。我们认为，现今的国际关系不能只限于传统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正式运作。因为事实上，国家之间也有许多活动。仍然受到‘半官方’与‘非官方’规范的制约。所以，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实质贡献，即使是在非官方活动范畴中的表现，也应受到重视。”

说到这里，李登辉显得异常激动，他再也顾不上“总统”的身分，声嘶力竭地喊道：

“过去四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极端务实，盱衡未来而不眷恋过去，辛勤工作而不怨天尤人，因此也创造了我们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我们很诚恳地希望世界各国以公平合理的态度对我，不要忽视我们所代表的意义、价值与功能。”他还咬牙切齿地说道：“有人说我们不可能打破外交上的孤立，但是我们会尽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本人确信，这个世界终将了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友善且具实力的发展伙伴。”

由于李登辉太过激动，加之当时的亚伯宁体育馆又显得异常闷热，所以，讲到这里，李登辉已经是汗流浹背了。他不由自主地将手伸向内衣口袋，相找点东西擦一擦脑门上的汗珠。但大庭广众之下，这似乎又有点失体面。于是，李登辉又将手放到了演讲台上，向他的听众们说道：

“我要再次对返回母校之行表达感谢之意。我不但感激母校的培育，也要感谢美国。……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初期，美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多方援助，极具贡献。我们不会忘记这一分‘雪中送炭’的温暖，也因此对美国有一分特别的感情。”

“今天，我们是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达 424 亿美元，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公债的第二购买国。”

“我们已为强化两国关系作好准备，因此殷切期盼此次访问再为两国的合作开创新机。”

李登辉的这篇演说，是他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思想的全面暴露。在这篇演说中，李登辉竟然使用了十六次“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字样。由此，人们也可以看出，由美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所谓的“私人访问”到底是什么货色。

一石双鸟还是鸡飞蛋打？

美国政府自食其言，全面推翻他们对台湾问题的承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而理所当然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感与严正抗议。

5月23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紧急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

钱其琛副总理说：“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只是在美国政府就台湾问题作出明确承诺后，中美两国才实现建交。中美建交十六年来，美国历届政府都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处理台湾问题。”

钱副总理接着指出：“每当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违反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时，中美关系就发生困难，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美方不顾中方的一再交涉，在提升美台关系方面越走越远，现在竟然发展到允许李登辉访美的程度。鉴于李登辉的身分，不管他以什么名义和方式访美，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都改变不了美国纵容和支持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实。”

钱其琛最后指出：“美国政府在几天前还郑重重申不允许李登辉访美，现在却背弃自己的承诺，采取了破坏中美关系基础的行动，后果将是严重的。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统一大业，牵动着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任何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动，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是坚决不能答应的。”钱其琛说：“美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后果，立即纠正错误。我们虽然珍视中美关系，但局势的发展将迫使我们作出强烈反应，其责任应全部由美方承担。”

5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允许李登辉访美。声明指出：“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比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更加重要。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实现祖国的统一，中国政府和人民准备面对任何挑战！”

此后，中国政府一直就李登辉访美一事与美国方面进行严正交涉，并愤而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

中国政府在得知美国方面允许李登辉访美消息后，当即指示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中止他的美国之行，并决定取消和推迟原定与美国进行的双边交流计划，包括取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对美国的访问，推迟中美两国关于“导弹及其控制制度”会谈及和平利用核能的专家磋商活动；美国军控及裁军事务官员原定对中国的访问也临时取消。6月17日，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也奉召回国。由于在此之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已经任期届满离开了中国。因此，在此后一段时期，中美两国出现了在对方没有大使的局面，这也是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的第一次。

所有这些都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一手策划李登辉访美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俗话说得好，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

到，通通都报！美国当权者虽然想利用“台湾牌”达到其牵制中国的目的，但“台湾牌”同样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玩火者必将自焚，这是美国当权者始料所不及的。

第四节 何处是归程

国际政治从来都是受各种利益所驱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人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同样奉行这种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美国当权者为了其霸权主义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他们打出一连串牌无效后，又抛出了早已被历史唾弃了的“遏制”和“孤立”政策，其目的便是阻扰中国统一，阻挡中国进一步强大。但是，当前国际形势表明，美国人机关算尽，到头来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中国要发展，中华民族要强盛，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然而，美国人会甘心认输吗？他们还有什么牌可打呢

吴弘达事件

李登辉访美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从6月份以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而在这个时候，吴弘达事件的出现更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

1995年6月19日，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霍尔果斯口岸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来自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个方面的游客分别从两边有条不紊地进入这个口岸。大约上午10时许，一位戴着眼镜，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从哈萨克斯坦方向走进了中国边防检查站，并递上了他的证件。中国边防检查人员打量了一下这位拿着美国护照的黄种人，心里不禁一怔。这个亚裔美国人为什么会选择霍尔果斯这个边境小镇进入中国，再说这个面孔怎么显得如此熟悉呢？这位边防检查人员想到这里，便再次拿起了这位美国公民的护照，反复看了一下，只见上面写着：PETER H. WU（彼特·H·吴），果然是一位美籍华人，这就更增加了这位边防检查人员心中的疑虑。

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这位边防检查人员索性放下彼特·H·吴的护照，与身边的另一位边防检查人员交换了一下意见。两人琢磨了一会，终于想起了几个月前，组织上曾传达过一个通知，近年来有一位名叫吴弘达的美国人经常化名潜入我国境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难道真的是他？”这位边防检查人员心里也没有底，为了慎重起见，他做了一个非常优雅的手势，将这位彼特·H·吴先生请进了值班室，经过一番询问，证明此人果然就是吴弘达。

那么吴弘达究竟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的出现会引起中国边防检查人员如此强烈的关注呢？

吴弘达原来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原籍中国江苏省无锡市，1937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小工商业者家庭。他父亲在50年代因为抗拒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而被捕入狱，并在一劳改营自杀身亡。而吴弘达本人也自幼对社会主义新中国一直心存不满，因此在其上大学期间多次策划偷越边界，企图从此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但后来终因东窗事发而挡锭入狱。从1961年5月至

1964年5月，他先后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三年。

1964年，吴弘达刑满释放后，随即赴山西省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任教，不久又调到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经过多年苦心努力，他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美国籍，自此之后，吴弘达认贼作父、为虎作帐，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反华生涯。

从80年代以来，吴弘达为了迎合某些西方政客的需要，就中国“人权”问题和劳改问题不断向中国发难，并因此取得了其洋主子的欢心，他不仅当上了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中国课课长，而且还兼任“劳改基金会主任”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等职，可谓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吴弘达定居美国后，曾写作了两本纪实体小说：《昨夜雨疏风骤》和《劳改营：中国的古拉格》，用极其恶毒和肮脏的语言对中国政府进行猛烈攻击。为了在中国境内窃取、刺探用来诬陷和攻击中国政府的材料，吴弘达曾在1991—1994年间，先后以吴弘达、亨利·吴及彼特·吴等名字，以访友、旅游、经商等名义进入中国境内，从事非法活动。

1991年夏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了配合其反华宣传活动，有意制作一期关于中国劳改营问题的节目，吴弘达自告奋勇，充当他们的马前卒，带领一支摄像队潜入中国境内。他们先后在6月16日和7月29日潜入山西省霍州监狱和阳泉第二监狱，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等一系电视“特技手段”偷拍了大量有关这些监狱里劳改犯人生活的影片。随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制作了一期60分钟的节目在全国放映，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这次偷拍得逞后，吴弘达更是得寸进尺，多次潜入中国境内从事犯罪活动。他先后在1991年8月和1993年3月两次潜入中国的青海和江浙等省市，偷拍有关监狱生活的影片，并提供给国外新闻机构。

1994年4月，吴弘达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指使，偕同该台一名女记者进入中国境内。他们携带微型摄像器材，以考察中国丝绸之路为名，先后到中国新疆和四川等地，偷拍了一些所谓中国出口劳改产品和移植出售死刑犯内脏器官的画面，并将这些伪造的材料提供给英国广播公司，由该公司向全世界反复播放，其恶劣影响比他们在1991年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专题片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弘达为了拍摄制作这些所谓的“劳改营专题片”，采取了一系列极为卑鄙恶劣的手段，特别是他们制作所谓的中国移植、销售死刑犯内脏器官的画面时更是将他们所有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吴弘达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女记者于1994年进入中国后，随即以夫妻名义来到成都市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科。吴弘达向当时值班的医生说，他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他的舅舅得了慢性肾功能衰竭，需要做肾移植手术。他还说，他早就听说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有很高的医学水平，希望能拍一些有关中国肾移植方面的专题材料，以便回去向“舅舅”有个交待。

为了取得这位医生的信任，吴弘达当场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关于其“舅舅”病情的假证明材料。由于他伪装巧妙，言词恳切，医生们对他也放松了警惕，并破例让他进入该医院第十五手术室观看当时进行的胸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二尖瓣膜置换手术。但是，正当吴弘达与医生进行交谈时，他的“妻子”却偷偷拍下了这次手术的全过程，这个镜头后来便成了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中国移植死刑犯肾脏器官”的特写镜头。

在吴弘达与英国广播公司女记者拍摄的这部专题片还有一个镜头，在新疆的一所监狱外面有一条繁华街道，那里正在出售琳琅满目的商品。当时播出这个电视画面时，还加上了一段解说词：“新疆商店里有1/3的商品是由监狱生产的，其产品占新疆出口商品的一半左右。”那么，这组镜头又是如何拍摄的呢？根据吴弘达本人供认，他先是来到新疆第二监狱，拍下了一些有关当地警戒设备的镜头，然而，再来到乌鲁木齐市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拍下了一系列商品的镜头，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监狱标志贴到某个商品，用特写镜头拍下这个商品，于是，他们觉得非常理想的画面也就出来了。

尽管吴弘达本人自以为他的所作所为神不知鬼不觉，因此每次得逞后便更加肆无忌惮，其实他的这一切行动早已在我公安部门的掌握之中。1995年6月19日，当吴弘达再次试图通过化名从新疆边境潜入中国境内时被中国边防人员当场抓获。6月30日，武汉市公安局决定对吴弘达进行监视居住。7月8日，经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正式将吴弘达逮捕。

吴弘达被捕本来完全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因此由中国将其逮捕法办，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权力范围内的事，但由于吴弘达被捕正好发生在中美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而且美国政界及舆论界的反华势力又乘机利用吴弘达事件大作文章，一时间浊浪滔天，真假难辨，致使中美关系再次出现新的波澜。

吴弘达在中国被捕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美国政府当即指使其驻华使馆官员向中国政府了解有关情况。由于当时中国有关部门仍在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取证，所以没有马上给予答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驻华使馆官员便按捺不住，他们背着中国政府开始私自寻访吴弘达。

6月30日，美国驻华领事官员查尔斯·帕里什从北京搭乘中国民航飞机到达乌鲁木齐，随后他又转乘出租车行程560公里，用了十二小时来到新疆西部的克拉玛依。帕里什到达克拉玛依之后，即径直前往吴弘达曾经留滞的宾馆。

“您能不能告诉我，吴弘达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帕里什不停地向宾馆工作人员打听有关情况。

“我们没有看见过吴弘达这个人。”宾馆工作人员非常茫然地告诉他。就这样，帕里什折腾了两天，最后只得带着满腹的遗憾回到乌鲁木齐。

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居然还指责中国方面不与他们配合！中国处理吴弘达违法犯罪案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美国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

还要求中国方面提供合作，简直是岂有此理！

事实上，帕里什私自前往克拉玛依，也违犯了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根据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若前往距离使馆 24 英里（约合 38 公里）的地方进行活动时，必须事先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当然，条约还规定，如果搭乘飞机离开北京，则不受 24 英里的约束。帕里什正是利用这一规定的漏洞，没有征得中国政府同意便擅自远赴新疆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帕里什到新疆后又乘了 560 公里的出租车，这显然违犯了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那么中国政府没有对帕里什采取措施已经是很客气的了，而此时此刻又怎么可能再给他提供任何帮助呢？

除了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赤膊上阵，直接到中国各地进行活动之外，美国政府也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方面施加强大的压力。

7 月 1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中国政府履行它对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允许我们立即见到吴先生。”并表示要继续努力与中国方面接触，争取让中国早日释放吴弘达。

如果说，美国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较温文尔雅且较为克制的话，美国的一些“人权”组织和国会中的反华势力则是恼羞成怒、气极败坏。

6 月 30 日，美国参议院在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的策划下通过了一项决议，严厉谴责中国政府逮捕吴弘达的行动，并要求克林顿总统“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交手段”确保吴弘达安全回国。参议员罗尔巴克称中国政府的这一行动是“再糟糕不过的了。”另一位参议员史密斯更是露骨地以最惠国待遇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他说，中国的行动将“损害最惠国贸易地位”。

7 月 8 日，也就是中国政府正式宣布逮捕吴弘达后，美国“亚洲人权观察”发言人罗宾·芒罗也气急败坏地声称，中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实际上是在人权问题上向美国宣战”，他还说，“华盛顿需要对北京此举作出最坚定、最严厉的反应。”

7 月 14 日，美国参议院六十名议员又联名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再次要求释放吴弘达。

吴弘达的所作所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因而理所当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是考虑到吴弘达已经加入了美国籍，因此根据中美领事条约，中国政府于 6 月 23 日扣留吴弘达后不久即向美方通报了有关情况。

经过武汉公安局近一个月的侦查，1995 年 8 月，中国司法部门已经掌握了吴弘达的犯罪事实。因此，武汉市公安局于 1995 年 8 月 6 日正式将此案移交给武汉市人民检察院。

吴弘达本人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他罪孽深重，为了换取中国司法机关对他的宽大处理，他于 8 月 9 日向中国司法机关呈交了一份亲笔签名的《悔罪书》，并供认了他的一些犯罪事实。

“经过思考及反省，本人真诚表示如下，归纳一下，有以下一些事实，是由我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中国政府及人民，并违犯了中国的法律。”吴弘达

的《悔罪书》一开始便这样写道。紧接着他又交待了他的一些犯罪事实：

“1991年夏天，积极地参与并协助美国 CBS 公司制作了反华的电视片，影响极坏，两次回国，其中主要的违法行为如：

“假称做生意，骗取信任，混入一些劳改单位拍录像，窃取文件；“利用故旧关系及本人经历，去一些劳改单位拍录像，并提供给 CBS；

“将录像、照片及文字材料给美国国会出示作证，并在各种场合下，包括报纸、杂志、公众集会加以宣传；

“1994年夏天，又在 BBC 怂恿下再次回国，引领 BBC 人员到新疆、四川等地劳改单位偷拍录像”，“参与制作所谓‘死囚器官’的反华电视片”等等。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以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有关规定，于同年8月12日向武汉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武汉市人民法院于8月23日进行正式审判，美国驻华使馆的一秘兼领事彭达到庭旁听了审判活动的全过程。

8月23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了合议庭，依法对吴弘达犯罪案件进行审理。上午9时，审判正式开始。审判长庄严地宣布：“将被告吴弘达带上法庭！”

这时只见两位法警将垂头丧气的吴弘达带进了法庭。这位曾经在美国国会山和各大电视媒体上威风八面的美国公民此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他耷拉着脑袋，像一只斗败的公鸡，无精打彩地等等着法律的庄严宣判。

“现在由原告宣读公诉状。”审判长一声令下，法庭讯问便开始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正式宣读了公诉状，其中列举了吴弘达多年来违犯中国有关法律的种种事实。

接着，检察人员在法庭上放映了一段录像，镜头上显示新疆第二监狱外面有一条繁华街道，那里正在出售所谓的劳改产品。放到这里，审判长开始审问吴弘达：

“你制作这部电视片有何依据？”

此时的吴弘达早已失去了几年前在美国国会作证时的那种志得意满的神气劲了，只见他摇了摇头，神情沮丧地答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这种说法不对”；

“这歪曲了事实”；

接着，检察人员又放映了一段录像，镜头上出现了一片乱坟和一些墓碑，画外音则称这是所谓死刑犯的坟墓。

审判长又问吴弘达：“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坟墓？”

吴弘达回答说：“我在拍摄这些录像的时候就知道这是老百姓的坟地。”

检察人员还放映了一段吴弘达为 BBC 公司拍摄的所谓“出售肾脏器官”的录像镜头。吴弘达在回答审判人员的提问时也不得不承认：他压根就没有舅舅，他当时手里拿的病历也是伪造出来的；他还交代说：“没有一位医生

告诉过我，这些肾脏是死囚犯的。”

至此，吴弘达事件的真相也就大白于天下了。法院方面认定，吴弘达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的补充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6条，因此理应予以严惩，只是考虑到吴弘达本人认罪态度较好，且其犯罪有受人利用等情节，法院方面对此作出了从轻判决。

8月24日正式将吴弘达驱逐出境。当天晚上，武汉市公安局派警察将吴弘达押送到北京，经由首都机场遣送回美国。

一条走狗的表演到此也就收场了。

阳光下的梦：遏制中国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与疑虑却与日俱增。在他们看来，俯首贴耳，甘愿受他们的支使才是中国人必须作出的选择。如果中国方面与他们据理抗争，那就是“中国威胁论”的典型表现。于是，在中国对李登辉访美事件作出强烈反应之后，他们纷纷抛出了“遏制”中国和“颠覆”中国等奇谈怪论。

“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隶属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刊物《政策研究》。1992年9月17日，《政策研究》秋季号刊登曾任驻北京和香港的驻外记者、现任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新亚洲计划协调员罗斯·H·芒罗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正在觉醒的龙》，副标题为《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

这篇文章在回顾了拿破仑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后这样写道：“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起步失误后，看来中国终于坚实地走上了一条经济腾飞之路，军事上也开始锋芒毕露，这也引起了亚洲及世界的震惊与强烈反响。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所造成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文章接着说：“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扩大，而且中国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国家。现在虽然还不能断定中国将取代前苏联而成为美国的‘新敌人’，可是，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文章还说，“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将既不是人权问题、也不是双边贸易问题，而是两国安全利益之间的基本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关系必将经历艰难、复杂和危险的时期。”

《政策研究》的这篇奇文发表后马上引起了连锁反映，西方国家议论纷纷发表文章，附和这一观点，特别是1995年6月以来，各种“遏制”或“颠覆”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1995年6月2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题为《擦去东南亚条约组织宪章上的灰尘，备好待用》。这篇文章一开始便提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命题：恢复东南亚条约组织，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

接着，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也不甘寂寞，跳出来为美国人帮腔和出谋划策。1995年7月29日，他们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发表了一篇文章，其题目便十分露骨：《遏制中国》。两天后，美国影响很大的《时代》周刊也发表了类似的一篇奇文。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叫《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作者是美国小有名气的查尔斯·克劳特哈默。

8月26日，《纽约时报》再次发表克劳斯的文章，这篇以《民族孤立主义使中国成为世界祸源》的专栏文章，鼓吹美国 and 亚洲国家不能对中国姑息迁就。叫嚷“如果美国现在不能行动起来，与亚洲国家领导人一起遏制中国，势必发生战略性失误。”

除了以上这些言论之外，美国《华盛顿邮报》、《商业周刊》等一些报刊也发表了类似评论，这些文章一方面对待中国的崛起感到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也只能求助于早已失效的“遏制”政策。

在美国传媒发出一阵接一阵反华鼓噪时，美国政府采取的几项外交行动也特别耐人寻味。

1995年2月27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便明确指出；今后美国将不再从亚洲撤军，而应该继续保持目前这种强大的军事存在，以此作为“亚太安全和世界战略的基础”；当菲律宾蓄意在美济礁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美国人也开始为其撑腰打气。5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声明，声称美国“对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有持久的兴趣”。并表示愿意向南中国海问题提出过领土要求的国家提供帮助。

1995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不顾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强烈反对，迫不及待地与曾经是“不共戴天的宿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一位参议员说得最明白不过了，他在克林顿总统宣布与越南复交后不久便表示，“美国在亚洲需要一个强大的越南，以抗衡中国令人不安的行动。”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除了这些行动外，美国还努力通过东盟地区安全论坛及一些重要双边外交行动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1995年7—8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加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会议时便不断游说东盟国家建立起地区安全机制，其用意不言而喻；随后，克里斯托弗作为美国现任内阁成员首次访问越南，成为数十年来访问越南的最高级别的美国人；10月下旬，美国还藉印尼总统苏哈托访问美国之机宣布要向印尼出售一些非常先进的F—16战斗机，其意图

也十分清楚。

“遏制”中国的梦想诚然美丽，但问题是，好梦能否成真？

有道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首先，除了极个别国家之外，美国的绝大多数盟国都不会随着美国的指挥棒起舞。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正在美国少数反华势力鼓吹要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同时，欧盟却公布了以‘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合作及政治交流为主

要内容的新的对华政策，欧盟执委会主席布里但甚至明确表示，欧盟不会加入美国的反华大合唱，欧盟需要的是务实而友好的对华政策。至于亚洲国家，由于历史上深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奴役和剥削，加之近年来他们都在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而一旦加入这种所谓的“遏制”圈，势必中止其经济发展进程，对他们本身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将十分巨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指望得到东南亚国家的支持实际上纯属痴心妄想。事实上，就在西方国家一再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时候，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尼等东盟国家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先后发表言论，表示他们不相信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亚太地区稳定，相反，中国的繁荣与稳定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非常良好的影响。

其次，实行“遏制”政策对美国本身也是弊大于利。众所周知，早在本世纪 40 年代，美国便对前苏联采取过这种“遏制”政策，他们期望通过这种政策促进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并防止他们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苏联、东欧集团真正实现了美国人所期望的那种“和平演变”，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到底又从这种演变中得到了多大好处呢？对于这一点，作为“遏制”政策的总设计师乔治·凯南也曾作出过深刻的反省。1992 年 10 月 23 日，也就是在前苏联宣布解体，而西方国家“大获全胜”的时候，乔治·凯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个人赢得了这场冷战。这是一场漫长而且付出了惨痛代价的政治游戏。双方都错误地估计了对方，并因此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和精神。因此，从整体上看，“遏制”政策完全得不偿失。

正因为“遏制”政策不得人心，而且也严重影响到美国国家利益，因此这些奇谈怪论一出现，马上便招来了美国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的严正反驳。

1995 年 9 月 4 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文章《美国与中国：消除不信任，恢复对话》。在这篇文章中，基辛格批评那种认为中美关系在冷战时期非常重要，而冷战结束后已经无关宏旨的观点。他认为，由于目前日本大规模增加其军事预算，而且在 21 世纪还有可能实现核计划，而其他亚洲国家相互之间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便显得特别重要。

基辛格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美中两国广泛的共同利益，包括保持亚太地区稳定、防止核扩散、以及诸如人权及环境保护等问题都需要美中两国的合作。他特别指出，“在目前状况下，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是白日做梦……对中国的遏制，很可能会使过去二十年的历史遭到否定。”基辛格指出，为了尽快解决中美分歧和矛盾，两国领导人应加快政治对话，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正是在基辛格等人的积极推动下，美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举行美中首脑会晤的可能。而且从 8 月初中美两国外交部长在文莱进行会晤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却一波三折，没能取得预期的进展。

首脑互访一波三折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的四年时间内，中美两国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都没有正式访问，这和中美两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的外交关系是不相称的。因此，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两国外交界人士便围绕实现两国领导人正式互访一直在寻找新的契机。从1993年起，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虽然在各种国际场合进行过三次会晤，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实现正式互访却一波三折，始终未如能如愿。

1993年克林顿就任总统以后，中美关系经历了一阵接一阵风波。特别是在“银河号”事件和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后，两国关系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中美关系的这种发展态势不仅引起美国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关心和忧虑，而且美国的一些亚洲盟国，例如韩国和日本也对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深表关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高层也开始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制止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机会终于出现在中美两国政府面前。

1993年下半年，克林顿总统提出在美国召开第一次亚大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一倡议很快便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绝大多数成员的积极响应。这也成为当时条件下，两国高层领导人会晤的理想途径。

9月25日，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和助理国务卿洛德在白宫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李大使刚刚落座，莱克和洛德便轮番向李大使解释了美国政府刚刚结束的对华政策研究的结果。并建议1993年下半年中美双方举行一系列高层会晤，包括克林顿和江泽民借亚大经济合作组织召开年会之机举行会晤。在两人作了这番说明之后，莱克站了起来，将一封克林顿致江泽民的信交给了李道豫。克林顿在信中这样写道：美国致力于推进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同时邀请江泽民出席西雅图会议，并阐述了美国对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新想法。

随后，洛德也向中国客人递交了一份详细说明美国意图的外交密件。据一位当时参与会谈的美国国务院人士透露，这份文件还谈到美国支持中国“统一”问题。

十天之后，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借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机，再次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并和克里斯托弗一起为一系列高层访问作了安排，其中包括一位国务院人权官员和两位美国内阁成员访华，美中四年来的第一次高级军事接触以及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的会晤。

与此同时，中国也明确表示了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几次重大外交场合都重申了对美关系的十六字政策，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由于双方都希望促进中美贸易和维护两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在经济和武

器扩散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机会增加了。人权问题解决起来要困难一些。在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方面，双方

也表现出了一定胸灵活性，1993年11月初，美国总统克林顿再次给江泽民主席写了一封“非常机密”的信件，重申了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努力给双方首脑会晤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1993年11月7日，克林顿还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一直很好，支持他们的经济进步。美国“不能孤立像中国那样强大，像中国那样对世界前途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一直努力寻找适当的折衷办法，我认为我们确实这样做了。”

1993年11月17日，江泽民主席乘坐的飞机从北京出发，途经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然后前往西雅图参加亚大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离开北京之前，江泽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发表谈话，为这次首脑会晤定下了一个良好的基调：

“中美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了分歧。我希望美中首脑会晤能寻找共同点，多发展共同利益，求同存异，尽早结束过去的纠葛，恢复和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中美关系的未来。”

11月18日下午3时25分，江泽民主席在曾庆红、杨德中等人陪同下，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大型波音747客机顺利抵达西雅图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西雅图位于美国大陆的西北角。这里由于受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气候特点是冬暖夏凉，加之这里降水非常充沛。因此，放眼整个城市，到处都是苍松翠柏，郁郁葱葱。西雅图因此也有“翡翠城”的美誉。

江泽民一行来到西雅图的时候，正值时令的初冬季节。西雅图市区到处都是金黄色的枫叶点缀其间，令人目不暇接。看到眼前这美好的景色，江泽民一行更是觉得心旷神怡。江泽民主席在机场再次发出了友好的呼唤：

“今天抵达素有‘通向东方大门’之称的西雅图，感到非常高兴。我愿意借此机会，转达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希望同美国人民扩大往来，加深了解，增强友谊，发展合作。我祝愿中美两国人民千秋万代友好下去，共同为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经济发展的美好世界而努力，以造福于全人类。”

11月19日，西雅图市雨过天晴，这在温和多雨的西雅图，确实是难得的好天气。看来这是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吉祥之兆。下午1时许，江泽民主席在外交部长钱其琛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著名的雷尼尔俱乐部，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克林顿和克里斯托弗等人进行会晤。

克林顿作为东道主，首先发表了一通欢迎词：“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并有光明的未来，我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

克林顿接着表示：“美国政府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所体现的各项原则。”

听到克林顿说起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江泽民马上接过了这一话题。

“我非常赞赏美国政府的这一原则立场。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颇具影响的大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只要增加信任，完全可以在国际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两国领导人说了这一通皆大欢喜的开场白之后，马上便围绕人权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

“我们注意到中国目前还存在较为严重的侵犯人权的情况，这是我们两国建立起‘正常、完全和建设性关系’的最大障碍。”克林顿首先向江泽民打出了一张“人权牌”。

对于克林顿的这一招，江泽民自然早在准备，但他却并没有直接谈论人权问题：

“地球上有一千多个民族，约二百多个国家和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世界的丰富多彩是一件好事，并不是一件坏事。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之间应当相互交流，共同享受人类的文明的成果。但这种交流只能在人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江泽民的这番话使克林顿不得不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冷战结束后，现在的关键是发展经济，国际经济现在这种不景气状况持续下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江泽民接着说道：“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中美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分歧，但经过开诚布公的对话，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而实现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便是解决这些分歧的理想途径。”

说到这里，江泽民转向克林顿：“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总统先生在今后方便的时候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非常有益的。”

听到江泽民发出的邀请，克林顿心头也为之一震：“我期待着今后有机会到贵国进行访问，这是我从孩提时便开始萌发的意愿。”

但是，实现克林顿这种“从孩提时便萌发的意愿”却颇费心机。在此后的一年里，中美之间关系虽然有所改善，特别是高层往来有所增加，但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双方依然出现了严重分歧。特别是1994年2月，中美两国围绕人权问题更是争得不可开交。同年3月，克里斯托弗出访北京再次铩羽而归。这样，克林顿的访华意愿便难以实现了。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中美两国领导人不得不再次借助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首脑会议进行会晤。

1994年11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分别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附近的卫星城市茂物，并于11月14日再次举行了会晤。

“通过这种场合再次与你见面，我感到很高兴。”江泽民首先发表了欢迎词，“去年我们在西雅图的会晤，通过坦诚、深入的讨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并指导中美关系走上了一条改善与发展的轨道。我希望并表示相信，我们这次会晤将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的进展。”

听着江泽民主席说的话，克林顿也不停地点头称是。他扳着手指头，列

举了一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事例：我们已经实现了高层互访，两国的经贸关系也有所改善，两国军事交流也开始恢复。“现在中美关系比一年前更加密切了，我们有信心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展望下个世纪，中美两国有着成为良好伙伴的美好前景。我将继续作出努力。使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

和一年前相比，克林顿在这次首脑会晤中表现得非常低调，他的讲话总是停留在一些大问题，而对双方一些根本分歧反而不想过多地涉及。两人的会晤眼看就要结束了，江泽民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些实质建议。“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同美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不搞军备竞赛，不搞军事集团，不对外进行扩张，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任何威胁。相反，我们希望同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江泽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府奉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中美之间应该，并且完全可能建立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我们可以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共同确立以下几条原则：第一，双方要着眼于世界大局和 21 世纪，要从更广泛的范围和长远的观点来发展两国关系；第二，相互尊重彼此的国情和选择，摆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以友好精神处理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第三，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进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第四，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磋商与合作，在解决世界热点问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以及环保、缉毒、打击恐怖主义、走私等社会问题上开展合作；第五，增进互相间的来往和交流，特别是高层互访和接触。”听了江泽民的这一席话，克林顿也表示理解和赞成。但他只承诺积极发展经贸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合作来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以友好的精神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高级官员强调这“是一次友好的会谈”。这次会谈与 1993 年两雅图会谈相比，两位首脑在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时，表情似乎轻松了。但是，在非常关键的克林顿是否将应邀访华问题却没有列入本次首脑会晤的议事日程。美国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 11 月 20 日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表示：“克林顿总统希望访问中国大陆，但是双方关系应有更多进展，他的访问才会实现”。洛德说，“这就是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当然，克林顿访问北京将具重大象征意义。”

在此后几个月内，中美关系又经过了一系列风风雨雨。1994 年底，中美两国围绕知识产权问题和中国的复关问题再次发生严重分歧，两国贸易大战危机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特别是 1995 年 5 月，美国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更使中美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有关中美首脑会晤的话题也就不再被人们经常提及。

中美关系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但两国毕竟有许多共同利益，如果任凭中美关系这样恶化下去对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也是极为不利的。正因为如此，在李登辉访美及中国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后，美国政府的决

策层也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断透过新闻界表示愿意与中国恢复高层接触和对话。美国政府的一些智囊机构甚至提出了尽快实现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以此打开两国关系中出现的这种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从维护中美关系这个大局出发，决定恢复高层往来。1995年8月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借出席东盟区域安全论坛会议之机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是自李登辉访美以后中美两国最高级别的会见。两位外长除了讨论台湾问题之外，也无意探讨了两国首脑会晤的可能性。

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内，两国关系也开始出现好转：

——8月24日，中国政府宣布判处吴弘达15年徒刑，并立即驱逐出境，从而为解决中美两国分歧铺平了道路；

——8月26日，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利表示她将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

——8月27日，美国国务院第三号人物，副国务卿塔尔诺夫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他称这次会议虽然“没有结果”，但“坦诚”、“开诚布公”，并“富有建设性”，在这次会谈中，塔尔诺夫还向记者透露，中美两国正在商定江泽民主席访美事宜；

——8月28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华盛顿表示，从6月17日被中国政府召回国内的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将回美国任职；同一天，中国广州军区司令员李希林启程前往美国，代表中国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参加太平洋战争结束50周年纪念活动；

——关于克林顿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访美一事也出现了积极的进展，中美双方都同意：江泽民将利用出席联合国50周年庆典之机，顺道访问美国。但是，进入9月份以后，美国方面又对江泽民主席访美的形式提出了一些难题，他们以国内条件不便为理由，坚持江主席的这次访问只能是“工作访问”，而不是“国事访问”，这是中国方面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同时又要照顾到中美关系的大局，最后同意江泽民主席在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时与克林顿进行一次工作会晤。

1995年10月24日下午3时许，江泽民与克林顿在纽约市著名的林肯中心广场大厦的十楼顶层进行会晤。两人原定商谈一个半小时，后来延长了约半个小时。由于在此之前中美关系的对立和紧张状况，世界各国舆论对这次会谈都格外关注，在林肯中心大厦门口，早已聚集了来自全球各主要新闻单位的数百名记者。江泽民和克林顿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很快便引起一阵骚动。

这次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当然仍然是台湾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显然底气不足。这次会晤开始后，克林顿利用他作为东道主的便利，首先便有意地绕过这个话题。

“中美关系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天地，即不只是为中美两国人民，也着眼区域性及全球利益，”克林顿刚刚落座，马上便抛出了这顶大帽子，并提

出两国可以合作的许多问题，如环境保护；双方合作打击国际范围内的犯罪活动，特别是贩毒和黑社会洗钱活动；人权问题，核不扩散问题以及世界经济合作等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转移人们对台湾问题的关注，以避重就轻，回避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的指责。

当然，由于台湾问题非常重要，要想避而不谈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克林顿讲了一通开场白之后，江泽民马上将话题引入了台湾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美国方面不久前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由于台湾问题是一个重要而非常敏感的问题，因此希望美方方面不要在这方面再制造麻烦，千万不要因为台湾问题而干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面对着江泽民的严正立场，克林顿也不得不有所表示。

“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承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也不会跟台湾发展官方关系，也不会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是，在是否允许台湾高级官员访问美国问题上，克林顿却不愿意作出任何承诺。

下午5时许，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正式结束，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11月份举行的亚大地区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大阪非正式会议上再次举行会晤（由于克林顿后来没有出席这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首脑会议，原来商定的中美两国首脑会晤也因此取消——笔者注）。

随后，美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对这次中美两国首脑会晤进行了评价。

“这次会谈不是一次解决问题的会见，我愿意强调这是双方恢复了动力、对话和交往的会见，以便我们能解决诸如环境保护及重大区域和国际问题。”洛德接着说，“我认为两国元首今天都努力营造坦诚的气氛，这样也就更容易化解两国间业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

美国白宫发言人迈克尔·麦科里则援引克林顿的话说，这次会晤“很好，很积极”，是“迄今为止两国首脑会晤中最好的一次。”

在当天晚上7时左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陈健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称这次会晤是“坦诚、友好、积极和有用的”。但是显而易见，由于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中美两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前，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也严厉批评了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行为。

在10月22日，美国政府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了欢迎各国领导人的盛大欢迎宴会，中国政府只委派了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出席，这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国方面所持立场的强烈不满。

中美两国首脑会晤的曲折经历也反映了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由于1996年美国将进行新一轮大选，在中美关系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两国首脑的正式互访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克林顿很可能成为中美正式建交以来唯一一位没有到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

结 语

当人们掩此卷而反思时，虽不免有几分我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后取得胜利的喜悦，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受人欺负、遭人挟制的沉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1946—1949年，美国出钱60亿美元，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有时则亲自出马）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了三年残酷的内战，杀伤了几百万中国人民。最后国民党反动派被中国人民彻底打败，逃到了台湾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美国又纠集十四个国家的军队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我国边境上。在此同时，又派遣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对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形成夹击的态势：妄图将之扼杀于摇篮之中。但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骄狂的美国侵略军，又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打败，被歼灭了109.38万人，其中美军39.75万人（另据联合国在纽约公报上公布的数字：美国所纠合的十四国的所谓“联合国”军队共伤亡147万多人，其中美军14万多人）。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的美国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无奈他说：“美国上将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50年，美国对我台湾岛实行赤裸裸的侵略，阻挠我解放台湾。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还扬言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甚至以原子弹相威胁，对我搞核讹诈。1954年12月，美国又和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声称要同台湾当局“共同行动”来对付中国人民解放本国领土的正义斗争。在此同时，对我实行全面的封锁和禁运，并支持蒋帮不断对我大陆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甚至进行武装窜犯。

从1954年9月始，美国政府又破坏日内瓦协议，派遣大批军事顾问进入越南南方，从60年代初期开始，搞起特种战争。1964年8月，美国又把越南战争扩大到北方，直接威胁我国南疆的和平与安宁。不久，又将战火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对我国的南疆造成更大的威胁，妄图让我停止支持抗击美国的侵略。未了在花去几百亿美元、死亡几万人而一无所得之后，仍然灰溜溜地撤回老家。

在我拥有了原子武器之后，美国再也不能对我搞核讹诈了。我们国家也在美国一手掀起的惊涛骇浪中成长壮大起来，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而美国自己却在侵越战争中搞得元气大伤。于是无奈之下，又对我伸出橄榄枝，并被逼与我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建交之后，它并未忘记给中国制造麻烦。首先在台湾问题上，背弃自己作出的庄严承诺，炮制了一部国内法律《与台湾关系法》，继续维持与台湾的一种“非官方关系”的官方关系，向台湾出售武器，玩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伎俩，破坏我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

在随后的两国交往中，它又不断挑起摩擦。先是在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频频发难。横生事端，然后又在人权问题上屡屡找茬，对我施压，继之又

在纺织品问题上无事生非，制造麻烦，进而又打西藏牌，干涉我内政，在此同时，还鼓噪要对中国实行“遏制”和“孤立”，直至最后精心导演一出李登辉访美丑剧，明目张胆地制造两个中国。这一连串的事情充分表明，美国是如何处心积虑地算计中国的。它想让中国乖乖地听它的摆布，跟着它的曲子跳舞。

斯大林有一句名言，落后要挨打。美国为什么敢如此地对我颐指气使，指手划脚，如此霸道？说白了，就是因为它的经济现在比我发达，它的技术比我先进，一句话，因为它现在的力量还比我强，所以它才敢如此欺负我们。

当今世界，要想昂首挺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想有受人尊敬的国际地位，必须发展经济，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只有这样，说话才有力量，人家才会重视你。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标志，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资本，是潜在的国防能力，是制订国家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迎来了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伟大时代，综合国力一下子增强了好多，对国际事务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大，而庞大的市场更令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垂涎。面对这一切，怀有阴暗心理的美国却既恨又怕，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就处心积虑制造麻烦，妄图阻挠我的发展。面对此一形势，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忧患意识常在。要始终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使我们的综合国力为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让我们国家更加强大。这样，若干年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伦敦战略研究所最新出版物刊载了 1993 年各国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两种初始数据，在假设的条件下，推算出的中、美、日、德、俄、印度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中长期发展前景比较，让我们在此介绍一下。

在 1993 年之前的十四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平均值是 9.4%，美国是 2.1%，日本是 3.7%，德国是 1.9%，俄国是—0.6%（但这里我们假设俄国今后的长期增长率平均为 4%），印度是 5%。购买力平价初值按年均 7% 的增长率推算。这样，按汇率算，2000 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 9518 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8%，日本的 19.6%，德国的 42.2%，俄国的 3.46 倍，印度的 2.28 倍。

2010 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 23374 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5%，日本的 33.5%，德国的 93.9%，俄国的 6.11 倍，印度的 3.45 倍。2020 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 57399 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0.9%，日本的 57.2%，德国的 1.91 倍，俄国的 10.1 倍，印度的 4.9 倍。2030 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 140953 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02 倍，日本的 97.7%，德国的 3.89 倍，俄国的 16.8 倍，印度的 7.18 倍。

若按 1993 年的购买力平价国内生产总值和近年平均增长率推算，2000 年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为 42438 亿美元，是同年美国的 57%，日本的 1.27

倍，德国的 2.21 倍，俄国的 2.78 倍，印度的 2.59 倍。2010 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 83481 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91.1%，日本的 1.74 倍，德国的 3.6 倍，俄国的 3.69 倍，印度的 3.04 倍。

2020 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 164220 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46 倍，日本的 2.37 倍，德国的 5.87 倍，俄国的 4.9 倍，印度的 3.57 倍。2030 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 323046 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33 倍，日本的 3.25 倍，德国的 9.56 倍，俄国的 6.52 倍，印度的 4.18 倍。

总之，不论按汇率还是按购买力平价的国内生产总值推算，中国早则（按购买力平价）可能在 2010 左右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晚则（按汇率或按较低的增长率）在 2030 年前后追上美国。

待我们国家综合国力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时候，那时我们不去欺负任何人，但谁也别再想对我们指手划脚，美国也再不能像现在这样来对待我们，因为那时我们完全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像尼克松所说，中国也可以对美国进行经济制裁，也可以叫美国改善底特律、哈林正、洛杉矶中南部的生活水准，否则中国就要取消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我们努力奋斗，一定会达到那一天。

国内目前出版的有关中美关系的书，都是编年式的将两国交往的件件事实加以编写和评述，使读者对历史和现状有所了解，有所思考。这种手法也是大家普遍采用的写书方式。

《中美较量大写真》一书，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撰写，它只撷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之间较量的史实，用纪实体文学手法，把它向读者展示。而且在这过程中，我们尽量把那些含义隽永、说明问题的花絮性材料收入书中、以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享受中，了解事情的真相，明白是非曲折，从而褒扬正义，鞭答邪恶。

我们写此书的目的是，就是要让广大读者。让中国人民看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是在怎样不断变换手法，制造麻烦，向中国施加强大的压力，从封锁禁运制裁到直接诉诸战争，样样武器都用上了，妄图逼中国就范。但是中国人民就是不信邪，就是要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一次次使美国的如意算盘落空。而通过这些较量，倒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信念。也更让我们中国人记住一条真理：落后就要挨人欺负，我们必须发展强大！

1995 年 10 月 24 日，供职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 Balling Garrett 和 Bonnie Giser 夫妇，曾要求本书主编与他就中美俄的关系作一次交谈。作者当时对他们说，中俄之间现在建立起一种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但双方都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发展友好合作，不针对任何人。美俄之间则是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中国也想与美国发展类似的关系，但是美国不干。不仅如此，美国还不断制造麻烦，横生事端，一会儿弄出这个问题，一会儿

弄出那个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想让中国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可以说这样做是不会有结果的，对中美两国都不利，哪一方也得不到好处，只会弄得中美之间的关系不能顺利发展，我们中国是真心希望与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希望美国也能采取明智的态度，共同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这对美国夫妇对此看法无法提出反对。

本书是采用分头撰写、主编通统的方式来完成的。每一章就是一个年代。赵兴燕撰写第一章，杨明杰撰写第二章，陈锋撰写第三章和前言及结语，黄昭字撰写第四章，袁喜清撰写第五章，由陈锋统编、修改加工全书，以期保证体例的统一，事实的准确，风格的一致，繁简的适宜和语言的流畅。

由于时间急迫，所以尽管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数百种中外文图书、杂志和报纸，以期尽量找到更多的、能说明问题的事件的内幕材料，将之介绍给读者。但可以肯定，书中仍会有不少不如人意、甚至锺谬之处，希望有关的专家学者能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成书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张丽君、崔翔、元明、杨春红、孟习贞等同志的大力帮助，他们为我们查找资料，打印文稿，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在此，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作者

1995年12月5日

主要参考文献：

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外交事务》；
英国《经济学家》；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南华早报》、《亚洲周刊》、《镜报月刊》、
《广角镜月刊》、《文汇报》；台湾《时报周刊》、《中外杂志》；
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星洲日报》；
中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了望周刊》、《新华月报》、《世
界知识》；

38 军传奇	赵忆鸿编著
黑雪、白雪、汉江雪	叶雨蒙著
毛泽东用兵录	黄颇著
新中国外交风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外交 40 年	沈阳出版社
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	光明日报出版社
台海军事冲突纪实（台湾）	沙封著
中美会谈九年回顾	王炳南著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世界知识出版社
周恩来的外交艺术	季明、刘强著
中南海外交见闻录	韩漳编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	
越南战争	雷·邦德斯主编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越南创伤	保罗·凯滕伯格著
越南必胜	威尔福瑞德·G·伯切特著
黑猫中队	翁台生 Chris Pocock 合著
对台作战实录	
西安出版社美国大出兵	阿木编著
潮涨潮落	地久等编著
工商联出版社来自绝密世界的报告	
法律出版社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尼克松回忆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何理主编
中美关系未来十年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对华政策论文集	
环球同此凉热 ——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 ——风云激荡	刘烁 汪闲著

- 当代中国大写意——内幕卷 杜卫东主编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韩素音
- 钓鱼台国事风云 李健编著
- 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
- 中美关系面面观
-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编印
- 中美断交评述 Robert L. Downen
- 台美断交与台湾关系法案（台湾）
- 尼克松政府对华关系大事记
- 中美关系资料选编 冬梅编
- 世界知识年鉴
- 《世界全记录 1901—1990》（台湾版）
- 世界知识大辞典
- 《参考资料》1981—1988
- 《新华月报》1981—1988
- 《人民日报》1981—1988
- 《联合报》（台湾）1981—1988
- 《中华时报》1981—1988
- 里根自传中美外交评论两百篇（上、下）（台湾）马克任著
- 中美关系的轨迹（上、下）（台湾）王景弘著
- 美国历任总统 梅人主编
- 黑格回忆录
- 中美关系十年 中国社科院等编
- 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 杨生茂主编
- 人权问题 徐崇温编
- 世界人权纵横 夏旭东等主编
- 国际风云中的中国外交官 云水著
- 脆弱的关系
- 1972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 哈里·哈丁
- 中美关系的轨迹
- 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刘连第汪大为
- 邓小平新时期重要活动纪略 李红锋著
- 邓小平文选美帝经济侵华史 钦本立著

